

俄国局势真相

列夫·托洛茨基著

(供内部参考)



俄国局势真相

列夫·托洛茨基著

刘 珙 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2 024 1879 4

Leon Trotsky
THE REAL SITUATION
IN RUSSIA
Translated by Max Eastma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London

俄国局势真相

列夫·托洛茨基著

刘 琪 译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资料室編印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一) 定价(七) 0.84 元

出版者說明

本书由美国托派分子麦克斯·伊斯特曼編輯并譯成英文，一九二八年在美國出版，倫敦乔治·艾倫和恩文公司发行。

书中收集了托洛茨基的三篇言論：《反对派政綱》、《托洛茨基关于开除他出中央委员会的提案的发言》、《給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局的信》。此外，还收集了《列宁遺囑》、《越飞遺书》以及托洛茨基等十三人領銜的所謂“老布尔什維克”向共产国际发出的呼吁书等六个文件，作为附录。

一九二七年，以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为首的反对派向联共中央发动了全綫进攻，他們召开秘密會議，制訂反党綱領，私下征收党費，建立秘密印刷所等等，野心勃勃地企图創立第二党。十月，联共中央和監察委员会召开联席全会，决定把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但是他們不知悔改，十月革命节时竟举行反党游行，因而被清除出党。本书的主要材料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写下的。

一九二七年，反对派曾先后起草了几个反党政綱：五月二十五日提出了臭名远揚的《八十四人宣言》（或称《八十四人政綱》），六月二十七日提出《十五人政綱》，进一步發揮《八十四人宣言》中的基本論点。本书所收的《反对派政綱》（原編者題名为《俄国局势的真相和共产党的任务》）据說是由联共十三名反对派中央委員九月

提交給中央，并由反对派秘密印发的。苏联一般党史著作中都沒有提到过这个政綱。这一政綱全面闡述了托派对国内外形势的观点，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建設前途、工农业方針、經濟工作、民族問題、軍事建設、苏維埃、青年团和党的看法，对当时的各項政策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并把所有的毒箭都指向斯大林。这个政綱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他們过去提出的綱領和要求。

至于托洛茨基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給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局的信(原編者題名为《斯大林伪造历史》)，則一方面恬不知耻地自我吹嘘并为自己的錯誤翻案，另一方面則恣意攻击和誣蔑斯大林。如托洛茨基为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錯誤翻案，說他根本沒有犯过什么“社会爱国主义的錯誤”，声称从战争时期的全部工作来看，他“同列宁的分歧是次要的”，他的根本路綫是“革命的”，这条路綫使他“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接近布尔什維主义”。吹嘘自己在十月革命期間和內战中的作用，为了表白自己和列宁的“一致”，列举了很多“例证”以及他所掌握的“文件”。对一些无可抵賴的反对列宁的行为，則不是避重就輕，就是进行狡辯。例如对布列斯特和約及职工会問題，他就一笔帶过，說是被人作了“惊人的夸大”，只是在个别“实际問題”上和列宁有不同意見。

此外，托洛茨基还大事渲染所謂列宁和斯大林的分歧，借此攻击斯大林。托洛茨基利用列宁病后对好多問題的意見用便条傳遞处理这一情况，列举許多据說是列宁給他的便条来攻击斯大林，把列宁患病期間的活动全部归結为反对斯大林的斗争。攻击斯大林支持取消对外貿易壟断制。在民族問題上更是大做文章。并說列宁关于改組工农檢查院和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都是針對“斯大林集团”的。又說什么在他和列宁最后一次談話时，列宁曾建議和他組織一个集团来反对苏維埃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反对斯大林領

导的“官僚主义的发源地”的組織局,等等。

本书的书名以及书中各文的正題都是原編者伊斯特曼另加的。

目 录

序言 俄国問題上的混乱	1
原編者說明	10
害怕我們的政綱	13
俄国局势的真相和共产党的任务	23
第一章 前言	23
第二章 工人阶级和工会的状况	32
第三章 农业問題和社会主义建設	42
第四章 国营工业和建設社会主义	50
第五章 苏維埃	60
第六章 民族問題	64
第七章 党	68
第八章 共产主义青年团	80
第九章 我們的国际环境和战争危險	83
第十章 紅軍和紅海軍	100
第十一章 关于真正的和伪造的分歧	101
第十二章 反对机会主义——維護党的团結	106
斯大林伪造历史	113
第一章 战争和我的到达彼得格勒	113
第二章 拉斯科里尼科夫的两种意見	117
第三章 一九一七年五月到十月	120
第四章 我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作用	124
第五章 “遺失的”文件	127
第六章 雅罗斯拉夫斯基的两种意見	131
第七章 奥里明斯基和卢那察尔斯基的两种意見	133

第八章	关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和职工会問題 的爭論·····	135
第九章	同列宁在共产国际里·····	138
第十章	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农民問題上·····	141
第十一章	我的軍事工作·····	143
第十二章	斯大林分子的最卑鄙的謊言·····	148
第十三章	列宁的空白命令·····	151
第十四章	关于劳动軍事化的謊言·····	152
第十五章	我同列宁在工业工作上的一致·····	154
第十六章	列宁患病以后·····	158
第十七章	国家計划工作·····	163
第十八章	同列宁一起反对斯大林·····	164
第十九章	同列宁一起反对斯大林, 李可夫, 加里宁和布哈林·····	169
第二十章	我和列宁之間的最后談話·····	170
第二十一章	列宁和斯大林最后决裂·····	171
第二十二章	几点結論·····	173

附 录

一	列宁遺囑·····	179
二	阿道尔夫·越飞遺书·····	181
三	斯大林—布哈林和中国革命·····	186
四	法国共产党人对俄国局势的評論·····	190
五	托洛茨基的放逐·····	195
六	俄国反对派給共产国际的呼吁书·····	197

序 言

俄国問題上的混乱

关于引起托洛茨基和斯大林間冲突的那些爭端，目前全世界有思想的人們正陷于一片少有的混乱之中。各国企业界人士和資本主义报刊頗为一致地认为，如果两害相权的話，那么还是斯大林可取。据《紐約时报》的一条电訊說，放逐托洛茨基的消息一經傳來，倫敦市場上的租让工业股票，甚至旧俄政府公債，就都馬上漲价。另一方面，共产党官員及其报刊，繼續在世界各地宣称：托洛茨基是小資產階級“傾向”，也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傾向”的領袖，甚至說他是一个反革命分子；而斯大林則是真正的布尔什維克。有一派中間分子，主要是自由主义的同情者和游历过俄国（或者說游历过共产主义）的知識分子，他們以为这里根本无所谓政治問題，只不过是個人的爭奪权力。托洛茨基被打敗了，却又不肯老老实实。或者說托洛茨基不理會党的紀律。这些游历者中有些更加天真和最近才回来的人，他們确实相信，把托洛茨基、拉可夫斯基、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其他三五十个十月革命的战斗領袖流放西伯利亚，正像把孩子們打发到他們自己的房間里去一样，因为他們在不該說話的时候，偏偏嘮叨不停。当所有成熟严肃的共产党人一心想着使“一国建設社会主义”見諸实行的时候，托洛茨基等人偏要对之进行討論。

这种天真无邪的想法，以及作为其根基的那种混乱，将在你閱讀托洛茨基和反对派的政綱本身之后很快消失。这政綱（我現在把它定名为“俄国局势的真相和共产党的任务”）是被斯大林政权禁止发表并視為非法的。从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反对派为什么

而斗争，他们反对什么人。他们进行斗争是为了“下层”阶级，即普通产业工人、雇农、贫农的切身利益；是为了那种使上述利益在政治上压倒其他阶级的利益的组织形式；是为了关于在一个共产主义社会里实现上述利益和人类最高利益问题的真诚的科学思想。

马克思社会主义的通常定义是：科学和无产阶级相结合。布尔什维主义的定义可以说是：科学通过党、苏维埃、工会组织的某些形式的媒介和无产阶级相结合。托洛茨基和反对派在这个政网中处处所捍卫的，正是科学思想、无产阶级和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形式这三件东西。他们捍卫无产阶级，反对三种反无产阶级分子的明显侵蚀——这三种分子是：耐普曼，即新的资本家；库拉克，即富农；和逐渐形成的政治方面、产业方面、工会方面的官僚阶级（这个官僚阶级必不可免地日益屈从耐普曼和库拉克的影响）。他们捍卫列宁所设想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形式，反对斯大林使之逐渐蜕化为官僚机构、派系统治和个人专制。他们捍卫科学思想，反对不老实的政治大话，煽惑宣传，统计魔术，阴险手段，和一个处心积虑推行的“泛滥全俄和世界的谎言”运动。

每一个熟悉工运斗争的人都知道，这三者并不是互不相关的。俄国共产党内的情况，就其本质说，既是典型的，也是大家所熟悉的。这是一场由来已久的斗争，是头脑清醒、为人真诚、行动彻底的革命者为保卫普通工人和作为一个阶级的无产者的真正利益，为反对日益坚固的党机器，反对无产阶级政客、职业的工运领袖、思想糊涂的社会主义者披上伪装的反动政策、有意无意的伪善言谈、组织上的诡计和残暴行为而进行的斗争。这些无产阶级政客、职业的工运领袖、思想糊涂的社会主义者，同为数众多的、对错误默不作声而自称“讲求实际”的一群人，结成了美满的联盟。在工人运动的历史中，这并不新鲜；对于曾经思索过俄国革命前途的人说来，就其本质看，这也没有什么神秘难解，或者竟然出乎意外之处。

但是俄国当前情况确有某些不同寻常的特点，以至隐蔽了它

的本质，并且使久已熟悉此类情况的人也难于判明真相。在此以前，所有无产阶级组织都是在一個资本主义社会里为夺取政权而斗争。俄国共产党却是已经获得了政权，并且控制着国家全部工业和政治生活。这就使得该党内反动的机器和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之间的冲突，具有前所未有的特点。首先这个机器较之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机器远为革命。它不仅先天如此，而且也非如此不可。它既不受制于资本主义国家、强大的资产阶级、和反无产阶级的公共舆论，也不依靠它们的支持。它在感情上是向着无产阶级的，因此，它在每后退一步的时候，不得不对劳动群众进行欺骗或者讨好。这就是斯大林走向反动时为什么沿着一条左右摇摆的道路的原因。既然他所掌握的各种组织是属于胜利了的、革命的工人阶级，那么他要走向反动，除了沿着这样一条欺人的——非常可能也是自欺的——道路之外，别无他途。这个事实很容易被人忽略，特别是外国的旁观者们，在他们看来，当斯大林无可避免地表达革命无产阶级的意志时，他似乎提供了革命的领导。他的官僚机构实际上的作法正如一切已经巩固下来的工运官僚机构一样，即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力量之间保持平衡，使自己继续当权。但是由于无产阶级力量在俄国比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强大得多，于是一个不经心的观察者就以为这个官僚机构似乎完全倒向无产阶级一边了。

除了这种实际立场比我们所熟悉的工运官僚们要左些的情形以外，斯大林还采用了一种和他们截然相反的语言。工运官僚们是用“正派”、“规矩”、“法律”、“秩序”、“爱国主义”等名义来推行他们的政策的。他们把他们队伍中的反对者叫作“赤色分子”、“革命党”、“布尔什维克”。但是斯大林不论要推行什么政策，他都不得不用“革命”、“布尔什维克主义”、“列宁主义”的名义来提出。他在他的队伍中不论要排斥什么鼓动者，他都不得不把他们指控为“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孟什维克”。这是他所处的地位使然，是一种绝对的必要，是完全不管事实的。“革命”、“布尔什维克主义”、“列

宁主义”成了俄国既成秩序的招牌。如果这个秩序适应着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阶级统治的制度而逐渐稳固下来的话，那么它会仍然背着这些招牌。那时它们将变成体面的字眼；统治势力认为方便的任何权宜措施，都可以假其名来实行。斯大林将高举着飘扬的红旗带领俄国工人退到资本主义去。这情形对于我们美国人来说，应该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在美国，寡头剥削阶级最恶劣的盗用名义的事情总是在“自由”和“民主”的名义下进行的；因为在这里，“美国革命女儿会”正是美国最狂热的反革命团体。

但是这种字义的改变，是通过轻微得几乎使人觉察不到的重点转换而完成的。例如，列宁主义这个字眼的根本重点已经转到纪律，中央集权，党内服从，政治上的临机应变、善于运用策略、“现实主义”这些方面。虽然所有这些东西曾经是列宁或其政策的特点；但使得列宁在数百个领袖中显得特别杰出的却不是这些东西，而是他的伟大的革命意志，这就是：不屈不挠、勇敢无畏、绝不容忍不正确的妥协行动和机会主义、从事可能做到的事情总是达到令人不可置信的极限。使列宁杰出的是他的正直不苟，敢于正视每一事实。还有他对于一切无聊的虔敬表现——不论是出于礼仪、伪善、或者无知——的憎恶。列宁是历史上的最大叛逆。这个事实正在不知不觉地从人们的思想中消失，从“列宁主义”一词的涵义中消失。当历史上的变化是逐步发生的时候，字义往往会有这样的变化。这个过程在过去是众所熟知的，但现在却很难被发觉，于是这就使得我们对于一个基本上是简单的情况的理解更加混乱了。

斯大林官僚机构除了是比较革命的，它所使用的语言是迄今为止任何工运官僚机构从来想像不到的比较革命的语言之外，它又是无限强大得多的。它的成员是工运领袖和无产阶级政客，这些人同时是一个庞大工业的巨头，他们控制了全俄的财富。他们操纵提拔和贬抑的权力，他们操纵高薪优职的追求者和妄想发迹的野心家（这些人构成人类中“知识分子”的很大部分）的普遍欲望的权力是无限的。他们冷酷地利用这个威权。他们使自己的四周

圍繞着一大批馴服的奴僕和搖旗吶喊的“嘍囉”，這批人馬的成分包羅極廣，從熱烈的理想主義者直到疲倦的布尔什維克，前者因為游歷蘇維埃國土的樂趣而改變了信仰，後者曾經全心全意地參加了過去的鬥爭，如今唯一的要求是有塊地方休息。用卡爾·馬克思的話說，斯大林的官僚們“創造了一個和社會各真實階級並列的人為等級，對於這個等級來說，保存現政權是個飯碗攸關的問題”。^① 這裡馬克思是指路易·波拿巴反動的資產階級政權而說的，正是對這類政權，這種人為階級迄今為止用感情的虔誠、思想的糊塗來加以支持，在邏輯方面拚命賣弄來為之效勞。在從前，他們從來沒有自願地向一個自稱為革命的工運官僚機構提供同樣的支持。這也是使人們難於看出真實情況的一個原因。

混亂的另一個根源是我們自己的這樣一種心情：我們覺得不正視這些事實，不說出這些事實，或者不公開說出這些事實，才是最好地為革命服務。斯大林分子正在加意地培養這種錯誤的心情，他們繼續夸大戰爭危險，用國際工人階級團結起來保衛蘇聯的名義，說服許多有批判能力的人保持沉默。使工人階級團結在蘇聯周圍的正確方式應該是像列寧那樣，告訴他們真相，告訴他們社會主義問題的真正內容。以為可以把廣大群眾團結在任何健康人對之都會產生本能憎惡的這樣一個政治謊言網周圍，這種想法是對群眾的莫大蔑視。以為當最清醒的呼聲被壓制并被滅除的時候保持沉默才是最好的為革命服務，這種想法是完全不理解政治鬥爭的規律。

幾乎每一個在過去幾年中注意過俄國政治鬥爭的人都知道，斯大林“剽竊”了反對派。在對他們個人進行打擊之後，斯大林採取了他們所主張的那些措施，並企圖在為時已屬過晚的時候使之實現。目前（在頓巴斯！）^② 由徹底得勝的官僚（他們監禁和流放了

①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中文版第 222 頁。——中譯者注

② 參看本書第三部分，第十五章《我同列寧在工業工作上的一致》。——中譯者注

那些以前一向就要求反官僚主义的人) 搞起来的“反官僚主义运动”, 不过是一九二四年以来持续至今的那个过程的一个最近的例子。最近, 在对富农长期纵容之后而企图向他们征收粮食的失败的尝试, 是过晚采纳反对派纲领的另一个例子。这并不单纯是思想政策水平问题。这并不是托洛茨基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而斯大林非常狡猾地攫取了这个好主意。这是一个决定于力量来源的问题。斯大林的基本力量来自工人阶级。这毕竟是根本事实, 也是未来希望的根本原因。当反对派制定一项无产阶级政策并在工人中传布开的时候, 斯大林就必须采纳它。未来希望就这样地得到某种程度的实现。因此, 姑且完全抛开反对派取得胜利的远景不谈, 阻止斯大林官僚机构右倾必然趋势的最大希望, 就在于维护反对派的威信, 维护他们得到对公众宣传的手段的权利, 维护他们的生命。世界各地每一个共产党人和每一个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同情者对于这项工作都是能够有所贡献的。他要做的只是正视真理和说出真理。

斯大林和反对派的冲突所以使人混淆不清, 还有另外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 反对派本身的某些人普遍抱有一种错觉, 他们以为分歧不完全是根本性的, 他们以为党无须经过尖锐斗争就能回到战斗的无产阶级路线。因此, 反对派一方面坚定地坚持原则, 另一方面在策略上却始终变化不定、踌躇不决。虽然考虑到这些策略问题的复杂性和史无前例, 上述情形可以得到人们的理解。但是这种情形仍然使得许多本来能看清问题的人, 在理智上和感情上都发生了混乱。

在本书所印载的文件中表现出来的那种言辞坦率、斗争坚决的策略, 也许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有下面三个理由使我们相信如此。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实行的反革命政策是昭然若揭的, 任何一个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或列宁政策的人, 内心对此已经毫无怀疑。斯大林在和反对派冲突时采用暴力, 是同样公然破坏了列宁的组织原则, 老实说, 也破坏了任何一个真诚希望创造共产主

义社会的人凭常識即須遵守的原則。随着他們用警察和監獄把信仰馬克思主义的批評者压制得无声无息，統治集团在考虑問題时关于科学思想的一切伪装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为了維持政治的謊言和官方的乐观估計，为了保持官僚們的屁股坐穩在位置上，为了对世界广大群众掩盖历史的和他們前途的真相，于是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範圍內被庸俗化，被变成聳动視听的标語口号体系，这个过程很快就要完成。一切追求真理和正直的人，都不会和这个墮落过程同流合污。

要充分說明圍繞着俄国情况的混淆不清，除了反对派的策略的躊躇不决之外，还必須加上另一个原因，那就是斯大林的詭計多端和运用政治陰謀的老练才能。斯大林是“粗暴的”和“不忠順的”，用党过去的水平衡量，也是个冒充博学的人，虽然如此，但是他却是个机詐狡猾的人。俄国每一个字的出版，都在他武装控制之下。全世界共产党官方报刊每一个字的出版，都在他严密的組織控制之下。这样完备的一个世界範圍的政治性出版机构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斯大林一直用狡猾手段毫无廉耻地利用着这个出版机构，以便使列宁的名字和革命術語同斯大林官僚机构的篡夺政权等同起来。斯大林的政治謊言是一个处心积虑的、根本性的政策，他之依賴这种政策，正如列宁依賴对事实的忠实說明。誰要是不願承认这一点，不願老实說出这一点，他就不能穿透圍繞俄国情况的迷雾。

所以本书第二部分所收的文件是很重要的，我借用托洛茨基的話，把这部分定名为《斯大林伪造历史》。这部分文件证明了斯大林和他的御用文人經營着一个真正龐大的伪造事业，并且干得很成功。他已經使得世界上很大一部分讀書界相信：托洛茨基是有問題的；他不理解自己所領導过的运动的原則；他和列宁之間在領導俄国革命上有过爭吵，或者說深刻的政治分歧；而斯大林作为列宁在偉大斗争年月里的助手却起过重要作用。

事实恰好与此相反，二月革命发生的时候，列宁在日内瓦，托

洛茨基在紐約，兩人所持的態度是相同的。從他們在俄國見面的時刻起，兩個人就攜手合作，其親密程度，在兩個有堅強意志和高智力的人中間是驚人的。他們的意見不同是有思想的人所不可避免的那種意見不同。他們的辯論是在堅定不渝的團結信念之下進行的。他們從來沒有絲毫分裂的跡象。從革命最初的日子起，民間輿論就把他們的名字連在一起，這是完全正確的。

的確，列寧同托洛茨基親密合作的實際情形，還要遠遠超過民間輿論所了解的程度。托洛茨基在本書中透露，在鬥爭最危急的時刻，列寧曾經給他一張底端有親筆簽名以示無條件認可的空白公文紙，托洛茨基可以把他认为適當的任何命令填在上面。托洛茨基當時是全國武裝部隊總司令。在表示團結和信任上，很難想像還有比這更無保留的了。

列寧在臨終的時候，對托洛茨基作了其他一些團結一致的表示，從政治意義上說，這些表示更加意味深長，因為這些表示是在列寧自己黨內出現了一個反對派的情況下作出的。這個反對派的領袖和中心是斯大林。第一個建議在俄國共產黨內組成一個集團來阻止斯大林官僚主義陰謀的人是列寧，並且這個建議是向托洛茨基提出的，這大概會使許多人感到意外。列寧最後的政治行動是口授一封給斯大林的信，和他斷絕一切“同志關係”。正如每一個熟悉列寧性格的人都能體會到的那樣，這個行動意味着他已經把斯大林看成一個政治上的敵人。

儘管有這些事實，但是托洛茨基革命才具的威信被破壞了，斯大林作為列寧的真正朋友、布爾什維克革命的真正領導者的威信被樹立起來。這樣一個過程在美國歷史上也有類似的例子。由於一個相似的過程，湯姆·佩因^①傳到我們已成了一個“卑鄙渺小的無神論者”，而喬治·華盛頓則是一個偉大的革命的群眾領袖。由

① 湯姆·佩因即湯姆士·佩因（一七三七——一八〇九），政治家、哲學家和作家，一七七六年出版的鼓舞美國獨立戰爭的著名小冊子《常識》的作者。——中譯者注

于一个更加相似的过程，安德魯·琼生^①在我們的教科书中被描述成亚伯拉罕·林肯的渺不足道的继承者，一个瘋狂淫乱、玷污我們历史的家伙。而根据罗伯特·温斯顿最近的研究，安德魯·琼生是来自人民的大无畏的人，因为他出人意外地坚持林肯的政策，所以正是那些在林肯生前阴谋反对林肯的势力，把他打倒并加以丑化。

我們繼續从我們“急进的”历史家那里得知，历史上某些时期的记录是以完全歪曲了的形式傳下来的——从正在爭取权力的那个阶级的私利出发，把事情描述得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截然相反。当我们讀到这些現代著作的时候，我們往往以为，我們很有經驗，我們傳給后代的记录不会再包含这样严重的歪曲真相的情况。但是我們之中究竟有多少人——甚至最先撕下历史伪装的馬克思的信徒——曾經对被本书所揭发和打破的那个严密神話網抗爭过呢？現在有多少人敢对它抗爭呢？大多数人类都有在当权者的身上发现德行的天赋。但是很少人有力量正視，更少人有力量說出：仅仅为了过于热烈地用他們清醒的头脑維護純洁的科学、阶级政策、和十月革命在組織方面的希望，托洛茨基和他的朋友們被逮捕，被从家里硬拖出来，在重重警卫下被驅赶到不毛之地，被隔离看管在那里，有着在那个独裁者手中遭到更坏的下場的危險。事实摆在这里，但是認識既然意味着行动，那么去認識事实就需要勇气。

麦克斯·伊斯特曼

① 安德魯·琼生(一八〇八——一八七五)，美国第十七届的总统(一八六五——一八六九)。——中譯者注

原編者說明

我称之为《俄国局势真相》的陈述托洛茨基思想的这个文件，是由联共党中央委员会十三名反对派委员于一九二七年九月向联共党中央委员会提出的。这个文件当初是他们为党起草的一个政纲“草案”，现在普遍称为“反对派政纲”。按照党章，应当把他们的“草案”印发给党员参考，并且应当把它列为在选举最近的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以前为进行自由讨论而召开的特别会议上的一个讨论题目。按照党章，应该由全党来确定：这个文件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事情的真实状态，以及应当在多大程度上采纳反对派的实际建议。

但是斯大林和他在中央委员会里的多数知道，在工人阶级一般党员群众面前，这样揭露他们的根本政治路线会危及他们的统治，于是决定去掉这个政纲。他们是用“粗暴”和“不忠顺”的方式把它去掉的。斯大林的这种“粗暴”和“不忠顺”已因列宁的遗嘱而出了名。他们宣布这个纲领是“反党”的，因此不能发表。这不仅意味着这个政纲不得发表，而且成了一个非法文件。他们这样做不仅破坏了党章，而且破坏了列宁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并使之继续进行的方法所根据的原则基础。

在这样消除了反对派的真正意见之后，斯大林及其同伙千百倍地加强了他们每天诽谤反对派的运动。用了断章取义、曲解引用的办法，还用了干脆撒谎和歪曲的办法，他们使人觉得这个政纲是对党的一种进攻。本来应该供作自由讨论业经发表的各个纲领之用的时间，现在是供作对他们不敢印发的一个政纲进行凭空捏造和多方诬蔑之用了。

反对派鉴于他們的党内权利受到这样的破坏，于是他們采取步骤使他們的政綱原本和党员見面。最初他們用打字机和复写机印了很少的份数。但是他們的活動被国家政治保卫局发觉，机器和印好的政綱都被沒收。这就是著名的“秘密印刷所”事件，此事的破获被用来在全世界报纸上造成了一次很大的轰动。

斯大林为了证明他在反对中央委员会少数派的斗争中使用国家警察的正当，并且为了进一步加速他正在争取的“从肉体上消灭”反对派的一天早日到来，他利用了一个奸細去引反对派上勾。他派遣一个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务，伪称曾任弗兰格尔男爵反革命军队的军官，去向某些反对派成员提供援助。他这样就算是“破获”了反对派领袖和在俄国活动的白卫間諜之間的联系，即使至今也显然是一种很渺茫的联系。^① 反对派领袖在中央委员会上揭露和粉碎了这个可耻的詭計，当然这件事从来没有在报纸上披露过，也没有否认过。但是这件事起了重大作用，它迅速造成了逮捕和强制放逐所有对斯大林独裁进行过有远見的抵制的那些革命者們的条件。

反对派继续要实现他們使政綱和全体党员見面的决心。三个工人共产党员承担起排版印刷綱領的任务。他們完成了任务，本书譯文就是从他們所印的小册子譯出的，小册子是法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领袖轉送給我的。可是，他們几乎是立刻就被捕了，大部分的小册子也被沒收了。現在他們在莫斯科的監獄里，被剝夺了接見亲友的权利。他們因为英勇地保卫列宁思想，保卫工人、雇工和“与中农联盟的貧农”的利益，而被当作普通刑事罪犯和小偷一样来对待。

我譯出了托洛茨基在中央委员会开除他的那次十月份會議上所作的、或者說试图作的发言，用它作为反对派政綱和托洛茨基致党史委员会信的导言。当时他被中央委员会的委員們哄下了台。

① 关于此事請參閱《斯大林全集》第十卷，中文版第160頁。——中譯者注

他的答辯，或者說他的抗辯始終未被听取。共产国际报刊——在紐約是《工人日报》——上登載的这个被中断的发言，由于去掉了不断扰乱的话，成了一些不連貫和沒有意义的片断，从而造成了以为托洛茨基神經衰弱或者思想紊乱的印象。托洛茨基事先准备好的并且在騷嚷声中試图作的原来发言，将使外国讀者至少对于俄国共产党內正在发生的实际情况有一絲的了解。

麦克斯·伊斯特曼

害怕我們的政綱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托洛茨基关于开除他出
中央委员会的提案的发言

我要求单独研究弗兰格尔軍官和軍事陰謀問題的动議已經被否決了。我所提出的問題实质上是：当党被告訴說，同反对派联合的共产党人参加了一个反革命組織的时候，它是为什么被欺騙，怎样被欺騙和被誰所欺騙的。你們命令要把我关于假冒弗兰格尔軍官問題的簡短发言从記錄里删除——这就是說向党隱瞞，于是又一次暴露了你們所謂的討論是什么东西。布哈林以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这些文件为根据在这里向我們讲了一通热月党人^①大杂燴的哲学，而这些文件同印刷所或反对派都毫不相干。我們要的不是布哈林的廉价哲学，而是事实。但是沒有事实。因此把这整个問題插进到关于反对派問題的討論里来，是一个詭計。粗暴和不忠已經发展到无異于罪恶的背信棄义的程度了。明仁斯基^②所宣讀的文件却是毫不含糊地不利于目前政治路綫的——只要用馬克思主义的分析就可以說明这些文件。不过我沒有時間这么做。我只能提出这个根本問題：目前的統治集团怎么会和为什么觉得有必要欺騙党，把一个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务說成是弗兰格尔的軍官，抓住一場沒有結束的偵訊的片断材料，以使用反对派参加了一个

① 1794年7月27日(法国革命历的共和国二年热月九日)法国大資产階級发动反革命政变，推翻了雅各宾派的革命专政，逮捕并杀害了雅各宾派的領袖罗伯斯比尔以及他的同志們。这次政变在历史上被称作“热月政变”，組織和发动这次政变的人，被称作“热月党人”。——中譯者注

② 国家政治保卫局首腦。——英譯者注

反革命組織的伪造关系来震吓全党。这件事的根源是什么，它的結果将会怎么样？只有这个问题才有政治意义。其余的是次要又次要的問題。

但是，先談一两句所謂“托洛茨基主义”。每一个机会主义者都竭力想用这个字眼为自己遮羞。伪造工厂正在日夜两班开工赶制“托洛茨基主义”。不久以前，我就这个问题給党史委员会写了一封信，其中包含五十条引文和文件，证明目前占統治地位的理論和历史学派犯有伪造、歪曲、隱藏事实和文件、曲解列宁的罪行——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所謂同“托洛茨基主义”斗争。我曾經要求把我的信抄送联席全体會議的成員。但是信沒有抄送，虽然其中几乎全部是文件和引文。我要把它送到《真理报》“討論专頁”。我想他們同样会把它隱藏起来不让全党見到，因为我引用的事实和文件对于斯大林学派是致命的。

在去年七月的宣言里，我們十分精确地預言了对党的列宁式領導进行破坏必經的所有阶段，以及斯大林領導的暂时取而代之。我說暂时取而代之，是因为現在的統治集团得到的“胜利”越多，它也就越脆弱。現在可以用下面的結論来补充我們去年七月的預言：斯大林目前在組織上的胜利是他在政治上彻底破产的先奏。这是絕對不可避免的，并且——在斯大林政权这方面——馬上就要开始。反对派的根本任务是設法使目前領導的毁灭性政策的后果帶給党的損害和帶給党同群众的关系上的損害尽可能地小些。

你們要把我們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我們也认为这一步是完全符合发展到（更恰当地說，墮落到）目前阶段的現行政策的。这个統治集团正在成百成千地开除最优秀的党员、坚定的工人布尔什維克出党；这个官僚集团竟敢于开除像姆拉契科夫斯基、謝烈布里亚科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沙洛夫和薩尔其斯这样一些布尔什維克，仅仅这些同志就能够創建一个其威信、其能力、其列宁主义化，比起我們現在的書記处来不知要超过多少倍的党書記处；这个斯

大林—布哈林集团把聶察也夫、施契霍里德、瓦西里也夫、施密特、費謝列夫还有其他許多这样一些忠实可欽的人囚禁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秘密監獄里；这一官僚集团使用暴力、窒息党的思想、瓦解不仅俄国的而且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先鋒队的办法，窃据了党的最高地位；这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派系近几年来尾巴后面跟随着：蔣介石、馮玉祥、汪精卫、柏塞尔、希克斯、本·提萊特，还有那些庫西宁之流、施米拉里之流、佩帕尔之流、海因茲—諾伊曼之流、腊非也斯之流、馬尔丁諾夫之流、康德拉节也夫之流和烏斯特里雅洛夫之流——这样一个派系集团，是不能容忍我們留在中央委员会里的，即使距党代表大会的召开还有一个月。对这情形我們是理解的。

粗暴和不忠是和怯懦紧密相連的。你們把我們的政綱隱瞞起来——或者說，你們竭力想把它隱瞞起来。惧怕一个政綱是什么意思呢？每一个人都知道，惧怕一个政綱就是惧怕群众。

我們在九月八日告訴过你們，不管所有禁止的命令，我們一定要使党看到我們的政綱。我們已經开始了这个工作，我們一定要把它进行到底。姆拉契科夫斯基同志、費謝列夫同志以及其他印刷和散发我們政綱的所有同志們，他們过去和現在的行动都是和我們完全一致的。作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監察委员会的反对派成員，我們为他們的行动負政治上和組織上的全部责任。

列宁过去指出的粗暴和不忠，現在已經不仅是个人的特点了。它們已經成为这个統治派系的特性，它的政策和組織制度的特性。这已經不再是一个外表作風的問題了。我們現领导的根本特性就是它相信暴力方法的万能——即使在对待自己的党的时候。我們党从十月革命继承了一个有力的强制机构，沒有这个机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想像的。这个专政的核心是我們的中央委员会。在列宁的时代——那时有一个列宁主义的中央委员会——，党的組織机构是从屬於一个国际性的革命阶级政策的。的确，从斯大林当选为总书记的头一天起，他就引起了列宁的担心。在第十次

党代表大会的时候，列宁曾向他的亲密同志说过这样的话：“这个厨子早晚要给我们上一盘辣菜。”但是由于有列宁的领导，由于政治局里有列宁式的人员，那时总书记处完全居于从属地位。从列宁卧病的最初时刻起，情况就开始变化了。由书记处选拔人员，也就是把斯大林分子配置在各个官方职位上，变成了一种和我们的政治方针完全无关的独立行动。因此列宁在知道自己即将逝世的时候，向党提出了他最后的忠告：把斯大林调开，他会给党带来分裂和毁灭。

党没有及时得知这个忠告。一小群经过挑选的官僚把列宁的信隐藏了起来。现在我们充分看到了这个后果。现统治派系以为凭借暴力什么事都可以成功。这是极为错误的。暴力能发挥巨大的革命作用，但是只有在一个条件下——那就是暴力服从于真正的阶级政策。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布尔什维克对资产阶级、对孟什维克、对社会革命党人使用暴力，曾经取得巨大成果。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对布尔什维克使用暴力，只加速了这个妥协者政权的失败。现统治派系采取流放、逮捕、剥夺职业的办法，这是对它自己的党进行威胁利诱。工人党员不敢在他自己的支部里说出他的想法。他不敢凭良心投票。官僚集团的独裁把我们党置于恐怖之下，而党应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表现。你们把党置于恐怖之下，你们就削弱了党使无产阶级敌人惧怕的力量。

组织制度不是独立存在的。党的整个政治路线表现在党的制度上。近几年来，这个政治路线已经离开正轨——它的阶级核心和运动趋势已经从左转向右，从无产阶级转向小资产阶级，从工人转向专家，从普通党员转向干部，从雇农和贫农转向富农，从上海工人转向蒋介石，从中国农民转向资产阶级的将军，从英国无产阶级转向柏塞尔、希克斯和总委员会——这是举不胜举的。斯大林主义的本质就在这里。

乍看起来，斯大林路线似乎是完全胜利了。斯大林派似乎打击了左面（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也打击了右面（在北高加索）。事

实上，这个中間派系的整个政策本身是在两条鞭子的抽打下前进的——一条来自右面，一条来自左面。这个官僚主义中間派系完全缺乏阶级基础，經常搖摆于两条阶级路綫之間，有步驟地游离无产阶级路綫而走上小资产阶级路綫。它不是直綫式地游离出去的，而是急驟地搖摆着游离出去的。已往那些搖摆情形，我們已經看到太多了。特別急驟而令人难忘的搖摆是：在富农的压力下（右面来的一鞭子）扩大选举权，紧跟着在反对派的压力下（左面来的一鞭子）取消扩大选举权的指令。在工人立法、工資政策、稅收政策、对于私人資本家的政策等等方面，这一类的搖摆事例，我們已經看够了。但是总的路綫一直是在向右移动。最近的宣言毫無疑問是一次向左的搖摆。但是我們不要有一分钟无視这个事实——这次搖摆絲毫沒有改变政策的总路綫，并且事实上它将（在不久的将来）加速这个統治中間集团的右傾。

今天的“强制进攻”富农的喊叫（昨天他們向这同一个富农阶层喊叫：“发财吧！”）不能改变总的路綫。在周年紀念日意外地实行一天只工作七小时以志庆祝也不能改变总的路綫。决定現领导集团政治路綫的，不是这些个别的冒险主义的姿态，而是这个领导集团在同反对派斗争中集合在自己周圍的社会力量。通过斯大林机构，通过斯大林主义政权而对无产阶级先锋队施加压力的那些力量是：官僚，冒牌工人，行政官員，工业經理，新私人資本家，享有特权的城乡知識分子——所有这些社会成分現在都指着富农向工人說：“記住，小伙子！这回可不是一九一八年。”

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左的姿态，而是根本政治路綫。起决定作用的是你們怎样挑选下屬人員。起决定作用的是管理人員，是支持你們的社会力量。你們不可能一方面压制工人支部，同时又进攻富农。这两件事是互不相容的。你們在周年紀念时向左搖摆，如果貫徹下去的話，馬上就会遭到你們自己多数派队伍中的无情反对。今天叫“发财吧！”而明天叫“消灭富农！”这对于布哈林來說是很容易的。他会耍笔杆，并且現在已經准备好了。他沒有东西可

損失。但是富农、經理、有勢力的官僚、专家——这些人的看法就不一样了。这些人对于突然大搞一些周年紀念活动可沒有兴趣。他們会有話要說的。

托姆斯基同志起来反对这次周年紀念的搖摆，因为他的处境比別人更糟。他預感到工人在职工会里将要提出什么样的质問，而負責回答这些质問的將是他。工人們看到了宣言宣布了左的路綫，他們明天就要向托姆斯基要求，至少真正地防止右傾。这就是統治集团內部斗爭不可避免的原因。在我們的右翼方面存在着工业經理的勢力和工会人員的勢力。像在工人运动史上常見的那樣，这两种勢力有一个时期是联合活动的。但是这次周年紀念的向左搖摆将要在它們之間造成裂痕。在他們之間两面討好的职业官僚，将要失掉自己的支持者。

一方面，这次周年紀念的搖摆是对反对派关于我們生活（無論是城市的或者乡村的）全部根本問題的观点的正确性的最无可怀疑的和郑重的承认。另一方面，对于統治派系說来，它是在政治上對他們自己的否定，是他們破产的自供。它是那些沒有能力在行动上有表現的人在口头上的自供。这次周年紀念的搖摆不仅不会延迟反而会加速現行路綫在政治上的破产。

現領導的全部政策必然产生党內的压制制度。在极端的官僚分子行列后面站着正在活跃起来的国内資產階級。他們的后面站着世界資產階級。所有这些勢力压迫着无產階級先鋒隊，不許它抬头，不許它开口。中央委員會的政策越是离开无產階級的途徑，就越有必要用自上而下的强制方法迫使无產階級先鋒隊接受这种政策。这就是党內目前这个不可容忍的制度的根本原因。

一方面馬尔丁諾夫之流、施米拉里之流、腊非也斯之流和佩帕尔之流在中国革命問題上扮演着主角；同时姆拉科夫斯基、謝烈布里亞科夫、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沙洛夫和薩尔其斯却被开除出党，因為他們印发一件为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而拟定的布尔什維克政綱。这些事实絕對不是仅仅屬於党內性质。这些事实是我們政

治斗争中阶级力量对比改变的一种表现。在对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先锋队施加压力的时候，国内资产阶级当然没有世界资产阶级那么无所顾忌。但是这两种压力是紧密联合并且双管齐下的。首先感到并且说出这个日益迫近的危险的那些工人阶级和我们党的分子，也就是比较革命的、比较冷静的、比较有远见的、比较不妥协的工人阶级斗争的代表——这些分子现在构成了反对派的队伍。反对派队伍在我们党内和在共产国际范围内都正在增长。事实和重大关键事件肯定了我们所采取的立场。你们的压制加强了我们的队伍，使党内最优秀的“老人”靠攏了我们；锻炼了年青人，并且使他们之中的真正布尔什维克集合在反对派周围。被你们开除出党的反对派党员是最优秀的党员。那些开除和逮捕他们的人——虽然还没有意识到和理解到——正是被其他阶级用来逼迫无产阶级后退的工具。现统治派系企图践踏我们的纲领，他们这样做正是执行乌斯特里雅洛夫^①的社会命令——也就是执行正在复活的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社会命令。不同于那些垂死的、老派的、侨居的资产阶级政客，乌斯特里雅洛夫这个新式的资产阶级聪明而有远见的政客并不盼望反革命活动和任何闹事。他不想“跳越阶段”。适合乌斯特里雅洛夫的现阶段的正是斯大林路线。乌斯特里雅洛夫公开把他的赌注押在斯大林身上。乌斯特里雅洛夫要求斯大林把反对派消除掉。开除和逮捕反对派党员，对我们提出弗兰格尔军官和军事阴谋这种纯粹热月党式的控告，斯大林这样做正是在执行乌斯特里雅洛夫的社会命令。

① 乌斯特里雅洛夫，律师，曾任高尔察克政府部长。内战后有些人“转换路标”，作为事后的同情者或者至少是容忍者而投向苏维埃政权，乌斯特里雅洛夫即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个人数不少的俄国思想家和作家集团中最能干的一个，这些人欢迎新经济政策，把它看作走向资本主义逐渐复辟的一个步骤。乌斯特里雅洛夫鼓吹消灭托洛茨基，他把这看作走向上述同一方向的一个步骤。——英译者注

斯大林为自己所規定的当前任务是：分裂党，清除反对派，使党习惯于肉体消灭的方法。法西斯哨子帮^①，毆打，扔书丢石头，監獄——到这儿，斯大林政权在它的道路上稍微停了一下。但是这条道路是已經預定了的。既然雅罗斯拉夫斯基之流、什維尔尼克之流、郭洛曉金之流和其他的人可以把一厚册的統計表投擲到一个反对派黨員的头上，他們干嗎还用和反对派辯論政府的統計数字呢？斯大林主义在这个动作上得到了最露骨的表现，它已經发展到公开耍流氓的地步。我們再說一遍：使用这些法西斯的方法不过是盲目地和不自觉地执行其他階級的社会命令。其目的在于：清除反对派并且从肉体上消灭他們。我們已經听到了这样一些意見：“我們要开除一千个，枪毙一百个，使党内得到太平。”这些喊声来自可怜的、惊慌失措的、但却又穷凶极恶的盲人。这是热月党人的喊声。因权力而腐化了的、因官僚主义的仇恨而盲目的最坏分子，正在竭尽全力准备热月政变。为此，他們需要两个党。但是他們的暴力将在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綫上撞得粉碎。反对派忠于这条路綫，他們的革命勇气是坚强无比的。斯大林是造不成两个党的。我們公开地向党說：无产阶级专政已处在危險之中。而且我們坚决相信，党和它的无产阶级核心必将听见我們的話，必将了解我們的話，必将克服这个危險。党已經深深地受到震动，明天，它将会受到彻底的震动。

在反对派少数几千人队伍本身后面，有第二层和第三层忠于反对派的人們，在这后面有更加广大的工人黨員层，他們已經开始注意傾听我們的意見，并且逐漸傾向我們这面。这个过程是无法扭轉的。非党工人不相信你們的謊言和你們對我們的誹謗。他們对于官僚主义和鎮压措施的增长有着正当的不滿，这已經由列宁

① “俄国党的官僚們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哨子帮。每逢屬於反对派的党的干部預定发言时，帶着警哨的人就像框子一样把大厅圍起来。反对派的发言人刚一开口，哨子就吹起来。哨子声繼續不停，直到反对派的发言人把讲台让給別人”。——引自法国共产主义者的报纸《反潮流》——英譯者注

格勒工人階級在十月十七日的游行中毫不含糊地表示出来了^①。无产階級是毫不动摇地拥护苏維埃政权的，但是他們要求另外一种政策。所有这些过程都是不可抵抗的。在这些过程面前，国家机器是无能为力的。你們的压迫越殘酷，反对派在普通黨員和一般工人階級心目中的威信就越高。开除一百个反对派黨員就意味着在党内增加一千个新反对派。被开除的反对派黨員认为自己現在是并且将来也是一个共產黨員。你們可以用強力从真正的布尔什維克列宁主义者手里把党证搶去，你們可以暫時剝夺他的党内权利，但是他永远不会放棄他对党的义务。当揚松在中央監察委員會會議上問姆拉科夫斯基同志被开除后怎么办的时候，后者回答說：“我要掌稳舵輪，繼續前进。”每一个反对派黨員都会这样說的。不管他从什么地方被开除，从共产国际的中央委員會也罷，从党的中央委員會也罷，从党内也罷。我們每一个人都将像姆拉科夫斯基那样地說：“我要掌稳舵輪，繼續前进。”我們站在布尔什維主义的舵輪旁边。你們不能把我們拉开。我們要忠实地掌握它。你們不能把我們清除出党。你們不能把我們清除出工人階級。我們受慣了压制，我們受慣了打击。我們决不会把十月革命断送給斯大林的权术——斯大林政策的全部实质可以用这几句話包括：对无产階級核心进行压制，同各国妥协分子友好，向世界資产階級投降。

在党代表大会召开前一个月，你們把我們开除出中央委員會，

① 这次游行在法国反对派报纸《反潮流》的俄国禁止发表的新聞栏里，被描述如下：“在苏維埃联盟执行委員會開幕會議期間，組織了一次大規模的街头游行。二十五万工人的队伍經過站立着党领导人的各个观礼台向前行进。其中一个观礼台是由反对派领导人占有的。当时出現了一种完全自发的行动——也是完全出乎党的官員們的意料之外的行动。当一队队的工人到达反对派领导人的观礼台前时，他們停下来，在原地踏步，欢呼，然后繼續前进，在领导集团的观礼台前既不停留，也不欢呼地走过去。这情形繼續了四个小时。为了遮掩这种群众表示，党的官員們最后走上反对派的观礼台，站在那里。”——英譯者注

这个中央委员会已经被你们变成斯大林派系的一个狭小的执行机构了。看来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将是你们官僚机构的胜利顶点。实际上它将是你们在政治上彻底破产的标志。斯大林派系的胜利是敌对阶级力量对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胜利。党在斯大林领导下所遭到的失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失败。党已经觉察到这一点。我们要帮助党理解它。反对派政纲现在已经放在党的面前。反对派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之后将在党内变得比现在强大无数倍。工人阶级的日历和党的日历同斯大林的书记处日历是不一致的。无产阶级思想缓慢，但是它思想有力。我们的政纲将要加速这个过程。胜负决定于对现政治路线的最后清算，而不决定于官僚主义者的拳头。反对派是不可征服的。你们今天把我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罢，正如昨天你们把谢烈布里亚科夫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开除出党，把费谢列夫和其他人逮捕起来。我们的政纲将会找到自己的道路。全世界工人会深为震惊地问他们自己：“什么道理，在十月革命十周年的时候，他们开除和逮捕十月革命最优秀的战士？是谁在那里捣鬼？哪个阶级在捣鬼？是十月革命时胜利了的那个阶级，还是正在慢慢出现、正在暗中破坏十月革命的胜利的那个阶级？”

即使各国最落后的工人，也被你们的压制惊起了，为了检验你们制造的弗兰格尔军官和军事阴谋这个无耻毁谤的真实性，他们将会拿起我们的政纲。你们的迫害、开除、逮捕，将使得我们的政纲成为国际工人运动中最受群众欢迎、最亲切、最珍贵的文件。开除我们吧。但是你们阻碍不了反对派的胜利——我们党和共产国际的革命团结的胜利。

俄国局势的真相和共产党的任务

第一章 前 言

在最后一次出席党代表大会所作的发言中，列宁說道：“过去一年來，國家是掌握在我們手中，但是在新經濟政策方面，它是否按照我們的意志行動了呢？沒有。我們不願意承認它沒有按照我們的意志來行動。它是怎樣行動的呢？就像一輛不聽使喚的汽車，雖然有人坐在裡面駕駛，可是汽車不是開往駕駛者要它去的方向，而是開往別人要它去的地方，不知這個別人是誰，是秘密的，不合法的，天知道是那裡來的人，還是投機者和私人經濟資本家，或者兩者都是，——總之汽車不完全按照，甚至常常完全不按照掌握舵盤的那個人所想像的那樣行駛”^①。

在這些話里提供了我們應該用來審查我們政策中根本問題的準則。汽車正往什麼方向行駛？還有國家呢？政權呢？它是按照我們，代表工人和廣大農民群眾的利益和意志的共產黨人所要求的方向行駛着嗎？還是沒有按照我們所要求的方向？還是“不完全是”按照我們所要求的方向？

自從列寧逝世以來的這些年里，我們曾經不止一次地促使黨的中央機關，以後並試圖促使全黨，注意這個事實：由於錯誤的領導，列寧所指出的危險已經大大地增長了。汽車不是按照工人和農民的利益所要求的方向行駛。儘管我們遭到了種種迫害，在黨代表大會前夕我們仍然認為自己有義務，以加倍的努力喚起黨對這個事實的注意。因為我們確信這個情況是可以糾正的。黨本身

^① 《列寧全集》第三十三卷，中文版第 245 頁。——中譯者注

可以糾正这个情况。

列宁說汽車常常駛往我們敌对力量所指示的地方，他这么說使我們注意两个极其重要的事实。第一，在我們社会里存在敌視我們事业的力量，这就是富农、新資產階級和官僚；他們利用我們的落后和我們政治上的錯誤，他們依靠国际資本主义的支持。第二，这些力量是强大到能把我們政府的、經濟的汽車推往錯誤的方向，并且最后甚至企图(开头用隱蔽的形式)把汽車方向盘抓过去。

列宁的話給我們規定了如下的責任：

(一)对富农、新資產階級和官僚这些敌对力量的增长要提高警惕；

(二)要記住，随着国家的全面恢复，这些力量将竭力联合，把他們的“修正案”加进我們的計劃里去，對我們的政策施加日益增大的压力，通过我們的机器来滿足他們的利益；

(三)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去削弱这些敌对力量的增长、联合和压力，防止他們在实际上(虽然表面上看不出来)造成两个政权制度，这是他們一心想达到的目的；

(四)把这些問題的全部真相坦白地告訴全体劳动群众。其中包括“热月政变”的危險和反对这一危險的斗争这个根本問題的真相。

自从列宁发出他的警告以来，我們有許多事情改善了，但是也有許多事情更坏了。国家机器的影响在增长，但同时工人国家的官僚主义化也在发展。由于資本主义势力在农村中的絕對和相对增长及在城市中的絕對增长，因此我国資產階級分子开始产生政治上的自觉意識。这些分子对于他們在工作中和在社交中接触到的那部分共产党人，竭力进行腐化，而其結果并不是总是不成功的。斯大林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向左开火！”的口号不能不促使党内右派分子和国内的資產階級一烏斯特里雅洛夫分子更进一步联合起来。

“誰战胜誰”的問題要在經濟战綫、政治战綫和文化战綫的各

个方面长期进行阶级斗争来决定胜负——这是一场最后决定是社会主义发展路线呢，还是资本主义发展路线的斗争；是一场最后决定是按照社会主义路线分配国民收入呢，还是按照资本主义路线分配国民收入的斗争；是一场最后决定是单一的无产阶级政权呢，还是和新兴资产阶级平分政权的斗争。在一个小农、小小农和一般的小有产者占压倒多数的国家里，最重大的事变常常是断断续续地和在暗中进行的，只是在最后才“意外地”爆发出来。

资本主义成分的主要表现是农村阶级分化和城市私人资本家的增多。农村的上等阶层和城市的资产阶级分子正越来越紧密地同我们国家——经济机构的各个环节联结起来。而这个机构常常在统计数字的掩盖下帮助新资产阶级，使它的增大自己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的活动取得成功。

国营的、合作社营的和私营的贸易机构占去我们国民收入的一个很大份额，超过总生产量的十分之一。另一方面，近年来，**私人资本**以商业中间人的资格所经营的贸易，大大超过了全部贸易额的五分之一，每年的绝对数字则超过了五十亿。一直到現在，一般消费者所需产品的百分之五十以上是来自私人资本家之手。这对于私人资本家则成为他们利润和积累的根本来源。农业价格和工业价格的差额，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的差额，农村经济不同部门在不同地区和季节的价格的差额，国内和国际价格（走私货品）的差额，这些都是私人收益的经常来源。

私人资本在贷款上获取高利，在政府公债上赚钱。

私人资本在工业上的活动也是很可观的。虽然在最近这个时期私人资本的相对数字减少了，但它的绝对数字仍在增长。登记的私人资本经营的工业每年总产值为四亿。小型工业、家庭工业和手工业每年总产值为十八亿以上。总计，各种非国营工业加起来占全部商品生产的五分之一，占全部市场商品的百分之四十左右。属于非国营工业的广大群众和私人资本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商业资本和家庭工业资本对于手工业工人群众各种公开的或

隱蔽形式的剝削是新資產階級積累資本的一個極其重要並且日益增大的來源。

稅收、工資、價格和信貸是分配國民收入的主要工具，某些階級從而得到加強，另一些階級則被削弱。

目前農業稅總的來說是以一種顛倒的累進辦法征收的：對力量弱的課以重稅，對力量強的和富農則只課以輕稅。根據大致的估計，占全蘇（即使把階級分化高度發展的省份，如：烏克蘭、北高加索和西伯利亞除外）土地所有者中百分之三十四的貧農，得到的純收入占總數的百分之十八。而占百分之七點五的最高層土地所有者獲得的純收入也正好是百分之十八。而且，這兩者繳納大体相同數額的稅——總稅收的百分之二十。從這裡可以明顯地看出，稅收加在每一個貧農身上的負擔比加在富農身上，或者一般“力量強的”土地所有者身上的負擔都要沉重得多。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的領袖們的擔心是多餘的，我們的稅收政策絕沒有“剝奪”富農。它一點也沒有阻礙富農把不斷增多的金錢和貨物集中在他們手裡。

間接稅在我們預算中的作用正在可驚地增大，結果就減低了直接稅的作用。僅此一端，稅收的負擔就自動從較富有的階層身上轉移到較窮苦的階層身上。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征自工人的稅收為上一年的兩倍，而征自其他城市居民的稅收則減少了百分之六^①。越來越沉重得難以忍受的酒稅正好落在各工業部門身上。根據某些大致的估計，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五年比較，按人口計算的收入的增長，農民是百分之十九，工人百分之二十六，商人和工業家百分之四十六。如果把農民劃分為三個基本階層，你就會看到富農收入的增加比工人收入的增加要多到難以比較的程度。根據稅收材料估計出來的商人和工業家的收入，無疑是少於他們的實際收入的。但是，即使這些加工過的數字，也清楚地證明

① 一九二七年《財政公報》第二號，第 52 頁。

了階級分化有了發展。

在過去一年半之間，工農業價格的“剪刀差”已經更加擴大了。農民出售產品所得的價格，至多為戰前價格的一點二五倍，而他購買工業品所付出的價格至少為戰前價格的二點二倍。去年一年，農民，並且**主要**又是下層農民的這種超額支出的總數為十億盧布，這不僅加劇了工農業之間的矛盾，而且使得農村階級分化大大尖銳化。

批發和零售價格之間的差額，使國營工業受了損失，也使消費者受了損失，這就是說有一個第三方面得到了利益。得到利益的是私人資本家，因此也就是資本主義。

一九二七年的實際工資最多也不過維持了一九二五年秋季的水平。可是在這兩年期間，無疑地國家變得更富了，國民總收入增加了，農村的富農階層極為迅速地擴大了他們的貯存，私人資本家、商人、投機者迅速地增加了他們的積累。很清楚，國民總收入中工人所占的份額是減少了，而其他階級所占的份額却增大了。在評價我們的全面情況時，這個事實非常重要。

只有從心裡認為我國工人階級和我們黨不能克服它的困難和危險的人，才會硬說，直言不諱地指出我們發展中的這些矛盾，指出這些敵對勢力的增長，是**驚慌失措和悲觀主義**。我們不同意這種看法。必須看清危險。我們把它們確實地指出來，正是為了用正確的方法和它們鬥爭並且克服它們。

敵對勢力——富農、新資產階級和官僚——一定程度的增長，在新經濟政策下是不可避免的。你不能用單純行政命令或簡單經濟壓力消滅這些力量。由於我們提出和執行新經濟政策，我們自己就為我國資本主義關係創造了一定的地盤，並且在將來很長一個時期內，我們還必須承認它們是不可避免的。當列寧說下面這段話的時候，他不過提醒我們注意工人必須知道的一個赤裸裸的事實：“當我們繼續是一個小農國家的時候，資本主義在俄國就有比共產主義更牢固的基礎。這是我們必須記住的……我們還沒有

挖掉資本主義的老根，還沒有鏟除國內敵人的基礎。”^①

列寧在這裡指出的無比重要的這個社會情況，我們已經說過，是不能簡單地消滅的，但是我們能通過正確的、有計劃的、有步驟的工人階級政策，依靠貧農和依靠同中農的聯盟來克服它，跟它鬥爭。這個政策是有機地包括在所有無產階級的社會地位在世界範圍內的加強裡面，包括在社會主義指揮中心最迅速的提高裡面，這個指揮中心是為準備和發展世界無產階級革命而工作的。

正確的列寧主義政策也包括策略的運用。在和資本主義勢力進行鬥爭的時候，列寧常常採取部分讓步的辦法，以便麻痺敵人；採取暫時後退的辦法，以便以後更成功地前進。現在也需要運用策略。但是在對於不能用直接進攻擊敗的敵人進行迂迴運動作戰的時候，列寧總是站在無產階級革命這條戰綫上的。在他領導下，黨總是明了採取每一個策略的理由，它的意義，它的限度，不可超越的界綫，以及無產階級再次開始前進的位置。在列寧領導下的那些年月里，後退就叫做後退，讓步就叫做讓步。由於這樣，在迂迴運動中的無產階級隊伍總是保持着它的團結一致、戰鬥精神和明確的目標意識。

在最近時期，領袖們已經肯定地脫離了這些列寧主義的方法。黨盲目地被斯大林集團領着前進。這個集團掩蓋敵人的勢力，在每一個地方、每一件事情上製造一種成功的外表，它沒有給無產階級指出前途——或者，更壞的是，它給無產階級指出一個錯誤的前途。它左右搖擺着前進，遷就和迎合敵對分子。它使得無產階級隊伍的力量削弱並且發生混亂。它促成了消極態度的增長、對領導不信任和對革命力量缺乏信心。它借口列寧主義策略而把非原則的左右跳躍偽裝起來，這種左右跳躍總是出乎黨的意料的，為黨所不理解的，削弱黨的力量的。唯一的結果是使敵人贏得了時間，他們前進了。斯大林、布哈林、李可夫的這一類策略的“典型”例子

^① 參看《列寧全集》第三十一卷，中文版第468頁。——中譯者注

在国际上是他們的中国政策和对英俄委员会^①的政策，在国内是他們对富农的政策。在所有这些問題上，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在一項彻底錯誤的政策严重后果落在他們头上以后，他們才能发现真相，或者一部分真相。

在我党中央机构的政策实际上决定于斯大林集团的这两年^②的結束之际，我們可以认为已經充分证明了这个集团无力防止：（1）那些企图把我国的发展推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势力的无节制增长；（2）在富农、新资产阶级和官僚力量增长的相形之下，工人阶级和貧农地位的削弱；（3）工人国家和国际资本主义斗争中一般地位的削弱，苏联国际威信的下落。

斯大林集团明显的錯誤是：不把全部真实情况告诉党、工人阶级和农民，反而掩盖事实，諱言敌对势力的增长，不許那些追究和揭发真实情况的人开口。

在整个情况表明危险来自右面的时候，却集中向左开火；粗暴地、机械地压制表示无产阶级对无产阶级革命命运正当震惊的一切批評，公然默許右傾趋势，削弱党的无产阶级和老布尔什维克核心的影响——所有这些事情，正是在最需要无产阶级的积极活动、党的警惕和团结、对列宁真正遗产的忠诚这样一个时刻，来削弱工人阶级并使它解除武装。

党的領袖們曲解列宁，修改列宁，解释列宁，补充列宁，視其掩盖他們連續犯下的每一錯誤的需要而定。自从列宁逝世以来，一系列的新理論被創造出来了，唯一的意义是：为斯大林集团脱离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路綫提供理論根据。孟什维克、路标轉換派〔事

① “英俄委员会”全名应为“英俄統一委员会”。該委员会是由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发起，于一九二五年四月六日至八日在倫敦举行的英苏工会代表會議上成立的。英俄委员会由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和英国工联代表大会总委员会的主席、書記及两个組織各推出委員三名組成。由于英国工联反动首領們的背叛政策，該委员会于一九二七年秋宣告結束。——中譯者注

② 实际上是四年。——英譯者注

后的同情者〕和資本主义报刊欢迎斯大林—布哈林—馬尔丁諾夫的政策和新理論，并且认为这是一个“从列宁前进”（烏斯特里雅洛夫）的运动，是“具有政治家風度的說理”，是“现实主义”，是对革命的布尔什維主义“烏托邦”的否定。他們欢迎从党的領導中清除一支布尔什維克軍隊——列宁的战友——，并且认为这是一个改变党的根本路綫的实际步驟。

同时新經濟政策在初步阶段的发展，沒有受到坚决的階級政策的制約和修正，将造成同样性质的更大危險。

二千五百万小农戶是俄国資本主义勢力的根源。逐渐从这一大批人中出現的富农阶层，正在重演資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下埋装一个大地雷。这个过程的前途最終取决于国营企业增长和私营企业增长的对比。我們工业增长的緩慢步伐大大增加了农民中的階級分化的速度和由此而产生的在政治方面的危險。

列宁写道：“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上，富农屡次恢复过地主、皇帝、神甫、資本家的政权。以前所有欧洲的革命由于工人軟弱，富农使共和制退到了君主制，使劳动人民的政权退到了剝削者、富人、寄生虫的专政。……你可以相当容易地使富农同地主、沙皇、神甫讲和，即使他們互相爭吵，但是要使它同工人階級讲和，永远办不到”。^①

誰要是不懂得这一点，誰要是相信“富农长入社会主义”，誰就只能使得革命撞在暗礁上毁灭。

我国存在着两个互不相容的基本立場。一个是建設社会主义的无产階級立場，另一个是一心要把我們的发展轉到資本主义軌道上去的資产階級立場。

資产階級和追随它的小資产階級各阶层这个陣营，把它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工厂主的私人首創精神和个人利益上。这个陣营把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中文版第37、38頁。——中譯者注

它的賭注下在“力量强的农民”身上，要使合作社、工业和我們的对外貿易都为这种农民利益服务。这个陣营认为社会主义工业不应该依靠国家預算，它不应该发展得太快以致損害农业資本家的利益。爭取提高劳动生产率对于日益加强的小資产階級來說，就是压榨工人的体力和神經。爭取降低价格对它來說，就是为商业資本的利益而减少社会主义工业的积累。反对官僚主义对它來說意味着解散工业，削弱計劃中心；意味着把重工业置于不重要的地位——这又是进行一次有利于力量强的农民的調整，并且很快就放棄对外貿易壟断制。这就是烏斯特里雅洛夫之流的路綫。这条路綫的名字就是**根据分期計劃实现資本主义复辟**。这在我国是一个强大的趋势，它影响着我們党內的某些集团。

关于无产階級路綫，列宁是这么說的：

“只有在无产階級的国家政权最終平定剝削者的一切反抗，确使他們完全屈服，并保证本身完全巩固，在大規模集体生产和最新技术(全部經濟电气化)的基础上改組全部工业的时候，社会主义对資本主义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的巩固才能认为是有了保证。只有这样，城市才有可能給落后和无变化的农村以技术的和社会的根本的帮助，这种帮助将为大大提高农业和耕作劳动生产率打下物质基础，从而用实例的力量和小农自身的利益迫使他們过渡到大規模的、集体的、用机器耕种的农业上去”。^①

我們党的整个政策——預算，稅收，工业，农业，对内和对外貿易，一切的一切，应该建立在这个原則上。这就是反对派的根本立場。**这就是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这两个立場之間，斯大林派一天天趋近前者，他們正沿着一条时而稍稍向左然后大大向右的搖摆路綫前进。列宁主义路綫是在同資本主义成分不断斗爭中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烏斯特里雅洛夫路綫是在資本主义基础上、以逐步侵蝕十月革命果实的方式

① 參看《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中文版第140頁。——中譯者注

来发展生产力。斯大林路綫在客观上导致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减慢，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降低，从而为烏斯特里雅洛夫路綫的最后胜利准备了条件。斯大林路綫背离社会主义的真面目是掩盖在人們熟知的社会主义辞句的假面具下面的，因此它的危險性和破坏性就更大。我們建設过程的完成会把經濟发展的全部根本問題暴露出来，并且会使得斯大林的政策破产，这种政策用来解决重大問題——無論中国革命問題，或者苏联基本建設問題，是完全无能的。

尽管情勢紧急，并且由于現领导的生硬錯誤而使紧急情勢达于极点，情勢仍然是能够扭轉的。但是必須改变党领导集团的路綫，并且必須按照列宁所指示的方向，雷厉風行地改变。

第二章 工人階級和工会的状况

十月革命使无产階級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个大国的統治階級。我們把生产資料收归国有是把那个以人剝削人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加以社会主义改造的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我們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是彻底全面改变工人階級物质文化生活条件的第一步。尽管我們的国家貧困，我們的劳动法給了工人——甚至过去被剝夺所有集体自卫权利的最落后工人——法律保证，这是最富有的資本主义国家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給工人的。工会已被提高到一个統治階級手中的极其重要的社会工具的地位，这就使它一方面能够把那些在其他情况下完全无法接近的群众組織起来，另一方面能够直接影响工人国家的整个政治路綫。

党所面对的問題是保证这些最高的历史成就的进一步发展，——这就是用真正社会主义的内容来充实它們。我們在这条道路上能否成功决定于国内和国际的客观条件，也决定于我們路綫的正确性和领导的实际才能。

在估計我国沿着社会主义建設的道路发展的情况时，决定性

的因素应当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成分对资本主义成分的优势——加上工人阶级各方面生活条件的改善。这种改善在物质方面(产业工人就业的数目,实际工资的提高,工人预算的性质,居住条件,医药治疗等等)、在政治方面(党,工会,苏维埃,共青团)、最后在文化方面(学校,书籍,报纸,剧场)都应该是明显的。企图把工人根本的具体利益放在不重要的地位,并且在“基尔特社会主义”这个诬蔑性的借口之下把工人的根本的具体利益同工人阶级的总的历史利益对立起来,这种企图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危险的。

工人国家占用剩余价值当然不是剥削。但是首先,我们的工人国家是一个有官僚主义偏差的工人国家。庞大臃肿而享有特权的行政管理机构吞掉了很大一部分剩余价值。其次,日益成长的资产阶级用贸易和在不正常的差价上投机的手段,盗取了国营工业所创造的一部分剩余价值。

一般说来,在经济恢复的这个时期,工人的数目和他们的生活条件已有所提高,这不仅是绝对的提高而且是相对的提高——也就是同其他阶级的增长相比较。但是,在最近时期,发生了一个急剧的变化。工人阶级数目上的增长及其状况的改善几乎停止了,而它的敌人却在继续增长,而且是以一种加快的速度在继续增长。这必然导致不仅工厂工人状况的恶化,而且无产阶级在苏维埃社会中所占比重的下降。

资产阶级在工人中的代理人孟什维克正在得意洋洋地指点我们工人物质上的可怜状况。他们正在竭力煽动无产阶级反对苏维埃国家,竭力劝诱工人接受资产阶级—孟什维克的口号——“恢复资本主义”。骄傲自满的官吏在反对派坚持改善工人物质状况的主张里看见了“孟什维主义”,这正是给孟什维主义尽了最大的义务,正是把工人驱赶到它的黄色旗帜下面去。

要克服困难必须了解困难。必须公平正直地用劳动群众的实际状况来检验我们的成功和失败。

工人的状况

到一九二五年秋季为止，我們的經濟恢复时期使工資有了充分迅速的提高。但是从一九二六年开始的实际工資大为降低的情况直到一九二七年初才被扭轉。一九二六——一九二七會計年度的头两个季度，大工业中的每月平均工資以莫斯科卢布計算，分别为三十卢布六十七戈比，和三十卢布三十三戈比；而一九二五年秋季为二十九卢布六十八戈比。第三季度——按照初步估計——为三十一卢布六十二戈比。因此今年的实际工資沒有变动，大致在一九二五年秋季的水平。

当然，特殊部类和特殊地区——首先是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工人的工資和一般物质水平无疑是高于这个平均水平的。但是另一方面，其他广大的工人阶层的物质水平却大大低于这些平均数字。

而且，所有的資料都证明工資的增长落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劳动强度加强了，而恶劣的劳动条件仍然未变。

工資的提高越来越以要求加强劳动强度为条件。这种新趋势是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相容的，而中央委员会在其著名的关于合理化的決議^①中加强了这种趋势。苏維埃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这项決議。这种政策意味着，由于发展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增加的社会财富本身并不导致工資的增加。

工人数目的微小增长意味着每一个家庭中劳动成员的数目的降低。以实际卢布計算，从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以来，工人家庭的开支預算降低了。住房費用的增高迫使工人把他的一部分住房出租。失业者直接或間接地加重了工人預算的負担。迅速增加的酒类消費加重了他的預算負担。从总数可以看到工人的生活水准明显地下降了。除非在实行生产合理化的同时，把工业和交通扩

^① 《真理报》，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大到足以吸收被解雇的工人，否則現在推行的生产合理化必将使得工人阶级的状况更加恶化。实际上，“合理化”的结果常常是把一些工人“赶出去”，并且降低其余工人的物质条件。这必然使得工人群众对合理化本身充满不信任。

在劳动条件恶化的情况下，常常是工人中最弱的部分最倒霉，这就是：非熟练工人，季节工人，女工，青工。

一九二六年，几乎在工业所有部门中，女工的工资同男工相比较有了明显的下降。在三个工业部门的非熟练工人中，女工一九二六年三月的收入分别为男工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一·八，百分之六十一·七和百分之八十三。在泥炭工业和装卸工作等方面，一直没有实行改善女工工作条件的必要措施。青工的平均收入和所有工人的收入相比较是在不断的下降。一九二三年为百分之四十七·一，一九二四年为百分之四十五，一九二五年为百分之四十三·四，一九二六年为百分之四十·五，一九二七年为百分之三十九·五^①。

一九二六年三月，百分之四十九·五的青工收入少于二十卢布^②。规定在每一工业单位的一定数目的工人中要雇用一定数目的青工的条例被取消了，这对青年工人和工人家庭是沉重的打击。青工的失业数字正在大大地增加。

农业工人

在全国三百五十万雇佣工人中，有一百六十万是男女农业雇工。在这些农业雇工里只有百分之二十被组织在工会中。工资合同的登记刚刚开始。他们工资之低几乎等于奴隶劳动。农业雇工的工资向来低于法定的最低限度——而且这情形甚至常常发生在苏维埃农庄中。平均实际工资不高于战前水平的百分之六十三。工作日很少有低于十小时的。事实上，多数情况是没有时间

① 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青年经济状况调查。

② 中央劳动统计局。

限制的。工資的支付是不定期的，並且是在令人難忍的拖延之後才支付。農業雇工的這種悲慘狀況不僅是由于在落后的農民國家中建設社會主義的困難而引起的結果。而且這也是錯誤路線的必然結果，這條路線實際上——在實際生活里——所優先關心的是農村的上層階級，而不是下層階級。我們必須全面地，有步驟地保護農業雇工，不僅要反對富農，還要反對所謂“力量強的”中農。

住房問題

工人通常的居住面積向來大大低於整個城市居民的平均居住面積。大工業城市的工人在這方面是居民中受惠最少的。在一系列所調查的城市中，各社會階級在居住面積分配上的情形如下：

產業工人，每人五點六平方公尺；職員，每人六點九平方公尺；手工藝工匠，每人七點六平方公尺；自由職業者，每人十點九平方公尺；非工人成分，每人七點一平方公尺。工人占末位。而且，工人的居住面積正在一年一年地縮小，而非無產階級分子的居住面積却在擴大。住房建設問題的總的狀況威脅着工業的進一步發展。國家計劃委員會的五年計劃無視這個事實，提出了一個住房建設的遠景，按照這個遠景，五年之後的住房情況比現在還要糟糕。而且這是委員會自己承認的。按照五年計劃，到一九三一年末的時候，平均標準將從一九二六年末的十一點三平方公尺^①降到十點六平方公尺。

失業問題

工業化發展遲緩的情形在其他任何方面都不如在失業問題上表現得那樣可怕，失業打擊着工業無產階級的基本隊伍。一九二七年四月失業登記的官方數字是一百四十七萬八千^②。失業的

① 一公尺大約等於二十八英寸。——英譯者注

② 《勞動報》，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实际人数大约为二百万。失业人数的增长比起就业工人总数来是快得无可比拟。按照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制定的五年计划，我国工业在整个五年期间将吸收四十万稍多一点的固定就业工人。这意味着，加上不断从农村流入的工人，到一九三一年底时失业人数将增加到三百万人。这种情势将引起的后果是，无家可归的儿童、乞丐和妓女的增多。付给失业者的少量失业保险金引起了人们正当的不满。救济金的平均数为十一点九卢布——约等于战前五卢布。工会救济金的平均数为六点五到七卢布——而且在失业的工会会员中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可以领到这种救济金。

劳动法规被加上了许许多多的解释，为数之多超过了它本身的条文好多倍。而这些解释实际上是取消了法规的许多条文。特别是关于临时和季节工人的法律保障被破坏了。

最近实行的签订集体合同的制度是以几乎普遍地放松法律限制和压低工资等级标准为特点的。赋予经济管理部门以强制仲裁权，这就使得集体合同本身形同虚设，使它从一种双方协议的行动变成一道行政命令了^①。工业方面拨充工人的赔偿金的款项是非常不充分的。根据劳动人民委员会的材料，在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在每一千工人中发生因伤残事故九十七点六起。每年有十分之一的工人受伤。

劳动纠纷事件的激增在这几年来是很突出的，这些事件大部分是用强迫手段而不是用调解方式加以解决的。

车间里的制度每况愈下。行政机构越来越力求建立起他们的无限权威。工人的雇用和解雇实际上完全操在行政机构手中。革命前的那种雇主和工人的关系现在并不罕见。

生产会议逐渐变得形同虚设。工人所通过的实际建议大部分从来没有实现过。而这种生产会议所提出的改进措施，其结果往往是使工人遭到裁减，这种情形就使得工人对于生产会议感到厌

^① 《劳动报》，一九二七年八月四日。

惡。因此出席生產會議的人寥寥無幾。

在文化方面，必須着重提出的是學校問題。讓孩子受初等教育對工人來說正變得越來越困難，更不要說職業訓練了。幾乎在所有的工人階級區，缺乏學校的情形在繼續發展。父母必須支付學雜費，這實際上就剝奪了工人子女受教育的机会。學校的缺乏和幼兒園設備不足驅使很大一部分工人子女在街頭嬉戲。

工會和工人

第十一次黨代表大會一項決議中所指出的“在工廠勞動條件問題上的利益矛盾”，近年來大大地發展了。但是，近來黨關於工會運動的整個政策和工會領導人的實際行動對於工會產生了這樣一種影響，那就是，如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所說：“工會往往不善于處理他們的工作，表現了片面性，常把主要的和最重要的任務放在無足輕重的地位上；主要的和最重要的任務就是：保衛工會組織下的群眾的經濟利益，盡一切可能提高他們的物質和精神水平。”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以後的情況並沒有變得較好一些，而是更壞了。工會的官僚主義化更進了一步。

在十個產業工會選舉產生的執行機構的全部人員中，車間工人和非黨工人積極分子所占的百分比是微乎其微的（百分之十二到百分之十三）。工會代表會議的極大多數代表是和工業完全沒有關係的人^①。工會和工人群眾同社會主義工業的行政方面的關係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疏遠。工會組織下的工人群眾的自主活動已為工會支部書記、工廠經理、工廠委員會和車間委員會的主席（“三邊”）之間的協議所代替。工人對工廠委員會和車間委員會抱着不信任的態度。出席會員大會的人是很少的。

工人的不滿既然在工會中無處發泄，因此不得不壓抑下去。“我們千萬不要太積極——如果你想保住飯碗，就別那么多嘴多

^① 《真理報》，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舌”。这样一些說法是很通常的^①。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方面必然越来越多地企图在工会組織以外采取行动以改善他們的状况。仅仅由于这一点就必须根本改变目前的工会制度。

最重要的实际建議

一、物质条件方面

(一)根除任何企图延长八小时工作制的傾向。只在絕對不可避免的时候才允許延长工时。不允許在雇用临时工人上濫用职权，不允許把正式工人按照“季节工人”待遇。在違背以前的規定而延长工时的有損健康的行业里，取消所延长的工时。

(二)最急迫的問題是提高工資，至少要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相适应。将来的方針必須是适应劳动生产率的每一增长有計劃地提高实际工資。必須使不同部类的工人的工資差別达到日益平衡，方法是有計劃地提高低薪工人的工資，而絕不是降低高薪工人的工資。

(三)我們必須制止官僚主义式地濫用合理化措施。合理化必須同相应的工业发展、同按計劃分配劳动力、同反对浪費工人階級生产力——特别是熟练工人——的斗争，紧密地結合起来。

(四)減輕失业的恶果：(1)必須調整失业救济金，使之相当于具体地区的平均工資。(2)鉴于失业時間的持久，救济期必須从一年延长到一年半。(3)不允許再降低社会保險稅，对实际上不繳納社会保險稅的行为必須进行一次认真的斗争。(4)必須制止把保險基金用在一般保健和卫生措施上。(5)我們必須全力反对“在被保險人身上进行節約”的傾向。(6)我們必須取消在各种借口下剝夺真正失业工人領取救济金和向职业介紹所登記的权利的一切条例。(7)必須以增加失业者的福利(从产业工人开始)为方針。我們必須为开办长期社会事业制定多方考虑和細心編制的

^① 莫斯科委员会的材料。《情况汇编》載《全体工人大会的报告》，第30頁及其他文件。

計劃，按照這種計劃，失業者將得到利用，而充分有利於國家經濟和文化的发展。

(五)有計劃地改善工人的居住条件。在全部住房問題上坚决实行階級政策。不允許牺牲工人利益而去改善非无产階級成分的居住条件。不許把被解雇的工人和半失业的工人趕出住房。

必須采取有力措施使公寓房屋有較健全的发展。必須使低薪工人可以得到公寓房屋。不允許上层職員占去原定撥給产业工人的房間。

必須放棄國家計劃委員會所制定的露骨違背社会主义政策的住房計劃。必須責成各企业机关充分增加其住房建筑开支，和供此項用途的預算款項及貸款，以使今后五年內工人住房确实得到改善。

(六)集体合同必須在工人會議上进行真正的而不是虛有其表的討論之后才能簽訂。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必須撤消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給工厂行政方面以强制仲裁权的決議。劳动法規必須被看作劳动者的正当要求的最低限度，而不是最高限度。集体合同必須包含合同整个有效期間不許裁减工人和職員的保证(特許例外必須載明)。生产指标必須以一般工人而不是个别工人为基础加以核定，并且这将作为工資合同整个有效期間的指标。凡是使得工人的各种待遇标准低于原合同的任何修改，均應宣布絕對禁止。

(七)工資和标准局必須置于工人和工会的有效控制之下，必須停止工資和标准的經常改变。

(八)安全設備和改善工厂条件的撥款必須增加。不执行劳动保护条例的必須課以更高罰款。

(九)必須重新审查对劳动法規所作的一切解釋，那些导致劳动条件降低的解釋必須予以取消。

(十)对于女工实行“同工同酬”。一般地应把妇女工作分在較高等級。

(十一)禁止学徒无偿劳动。禁止降低青工工资。必须采取措施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

(十二)绝对不准实行有损工人切身利益的节约措施。我们必须恢复那些从工人那里剥夺掉的“琐细开支”(孩子日托,公共汽车票,较长的假期,等等)。

(十三)工会必须更多地注意季节工问题。

(十四)工厂内供应工人的医疗设备必须增加(救护车,急救室,医院,等等)。

(十五)为工人区儿童设立的学校的数量必须增加。

(十六)国家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加强工人合作社。

二、工会方面

(一)评定工会工作,主要应以它在目前工业的可能限度内在多大程度上维护了工人的经济和文化利益为准。

(二)党组织在决定有关工人群众经济和文化利益的措施时,必须认真考虑工会中共产党员的意见。

(三)工会工作的基础必须是:认真选举,凡事公开,对会员负责。

(四)行政机构的组成必须和同级工会机构进行真正的而不是虚有其表的协商,取得意见一致。

(五)在每一届工会代表大会(包括全苏工会代表大会)和一切由选举产生的工会机构(包括全俄工会理事会)中,直接参加生产的工人必须占多数。非党工人在这些机构中所占的比例至少必须提高到三分之一。

必须定期选派一定数量的工会机关干部去从事生产劳动。

在工会活动中更多地采用志愿工作制,广泛实行志愿工作的原则,更多地鼓励车间工人参加志愿工作。

(六)不允许因党内分歧而撤换被选入工会的共产党员。

(七)必须保证车间委员会和工厂委员会对于行政机构的绝对

独立性。雇用和解雇工人，把工人从一个工种调到另一工种工作超过两星期等——所有这一类的事只有在通知車間委员会以后才能办理。为反对在这一类事情上的濫用职权，車間委员会得有权向相当工会和糾紛評議委员会对行政方面的决定提出控訴。

(八)必須保护工人通訊員的权利，因通訊員进行揭发而对之加以迫害的人，必須受到严厉的惩处。

刑法中應該加进一条，凡是因提出批評，提出独立建議，以及投票，而对工人直接或間接、公开或暗中加以迫害的，应作为危害国家的严重罪行而予以惩处。

(九)必須扩大生产會議監察委员会的职权，使之有权監督生产會議決議的执行，并有权檢查生产會議在保护工人利益方面的成績。

(十)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在列宁领导下通过的关于国营企业罢工問題的決議，仍然有效。

当租让企业发生罢工时，应把它看作私营企业。

(十一)重新审查劳动統計的全部制度，它以現在的形式所提供的工人階級的經濟和文化状况都是不真实的、显然帶有伪飾的，因此极大地妨害了保卫工人階級經濟和文化利益的工作。

工人階級在十月革命十周年时的困难状况，归根結蒂当然可以說是由于国家的貧困、由于干涉和封鎖的結果，由于資本主义环境对第一个无产階級国家的不断斗争。这种状况不能一下子改变。但是我們能够也必須用正确的政策改变这种状况。布尔什維克的任务不是自滿地去描繪他們的成就——当然确实有成就——，而是明确地提出还要做什么、必須做什么、以及如有正确的政策就能做到什么的問題。

第三章 农业問題和社会主义建設

“小生产是經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資本

主义和資產階級的。”^① 或者是无产階級国家依靠工业的高度发展和电气化去克服千百万的小企业技术上的落后性，并且在集中化和集体化的基础上把它們組織起来；或者是資本主义在农村积蓄力量，破坏城市里的社会主义基础。

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农民——这是指不剝削別人劳动的基本农民群众——是同盟軍，无产階級专政的巩固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都依靠同它之間的正确联盟。关于农民問題，列宁在下面的話里早已正确地規定了我們現阶段的任务：“善于同中农达成協議，一分钟也不放棄对富农的斗争，只是牢牢地依靠貧农。”^②

在农民問題上，斯大林—布哈林集团正在修正列宁，他們修正的主要方面可以概括为以下八点：

（一）放棄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則，即：只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才能帮助农民沿着集体化道路改造农业。

（二）对于雇农和貧农是无产階級专政在农村地区的社会基础这个問題，估計不足。

（三）把我們在农业經濟的希望寄托在所謂“力量强的”农民身上——这在实质上即是富农。

（四）忽視或公然否认农民所有制和农民經濟的小資产階級性质。这是离开馬克思主义的立場轉向社会革命党人的学說。

（五）低估資本主义成分目前在农村中的发展，并且掩飾农民中正在发生的階級分化。

（六）創造了一种起瓦解作用的学說，大意是：“富农和富农組織是沒有任何希望的，因为我国发展的总框框是由无产階級专政的結構預定的。”^③

（七）鼓励“富农合作社的核心长入我們的制度里来”。^④“这

① 《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中文版第6頁。——中譯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中文版第173頁。——中譯者注

③ 布哈林：《到达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工农联盟》，第49頁。

④ 同上。

个問題可以表述为，必須让富裕农民和富农发挥他們的經濟潜力”。^①

(八)企图把列宁的“合作社計劃”同他的电气化計劃对立起来。按照列宁自己的意見，只有把这两个計劃結合起来才能保证过渡到社会主义。

新资产阶级的代表利用官方集团这些修正主义的傾向，已經同我們国家机关的某些环节勾結起来，他們正公然企图把我們在农村中的全部政策轉到資本主义的軌道上去。并且，附带說一下，富农和富农思想的辯护人把他們的野心用关心生产力的发展、关心“一般的”商品产量的增长等等托詞掩盖起来。事实上，富农的生产力的发展和富农的商品生产的增长正在压制和阻碍着所有其他农民經濟生产力的发展。

虽然我們农业恢复的过程比較迅速，但农民經濟的商品生产是很低的。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間，投入市場的商品总量为战前水平的百分之六十四，出口量仅为一九一三年出口量的百分之二十四。这除了由于农村本身一般消費量增加^②以外，主要由于农业产品和工业产品之間的差价，以及富农加紧囤积食物。甚至五年計劃也不得不承认“由于一般地缺乏工业产品，就使得城乡間貨物的等价交換受到一定的限制，降低了可能投入市場的农产品数量”^③。因此，工业的落后延緩了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延緩了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它破坏了城乡联盟，并且引起农民中迅速的阶级分化。

反对派在有关农民政策的有爭論的問題上的看法，已經得到了完全、絕对的证实。在反对派尖銳批評的压力下，我們的总路綫有了部分的改正，但是这些改正并没有阻止住官方集团繼續倒向“力量强的农民”方面去的傾向。为了证明这一点，只要指出下面

① 《真理报》，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② 由于人口增加和财产分散，产粮区百分之三十八的农庄购进粮食。

③ 第 117 頁。

的事实就够了，从加里宁的报告来看，在第十四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没有一个字提到农村的阶级分化或者富农的增长。

这种政策只有一个结果：我们将要失掉贫农，并且争取不到中农。

农民中的阶级分化

近年来农业地区已经朝着资本主义阶级分化的方向走了很远。

在过去的四年间，无地和少地的阶层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五到百分之四十五。同时占有六到十俄亩（合十七到二十八英亩）的阶层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一百二十。占有十俄亩以上的阶层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五十到百分之二百。无地和少地阶层百分比的减少，很大原因是由于破产和流散。例如，在西伯利亚，在一年的期间，百分之十五点八的无地农户和百分之三点八的占有二俄亩以下土地的农户流散和消失了。在北高加索，百分之十四点一的无地农户和百分之三点八的占有二俄亩以下土地的农户流散了。

没有马匹和农具的农户要升入下中农地位是极端缓慢的。目前全国仍然有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没有马匹和农具的农户，这类农户中的基本群众正在下降到贫农的地位中去。

在北高加索，主要生产手段的分配如下：百分之五十的最贫穷农户占有生产手段百分之十五。中间阶层，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占有主要生产手段的百分之三十五。最高阶层，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十五，占有生产手段百分之五十。在其他省份（西伯利亚，乌克兰等地）也可以看到生产手段分配的同样情形。

上述土地和生产手段分配不平等的情况在不同阶层农户的存粮分配中也可以得到证实。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农村中百分之五十八的剩余粮食是在百分之六的农户手里^①。

^① 《统计汇刊》，一九二七年，第四号第15页。

出租土地所占的比例一年年地增加。在多数情况下，出租土地的业主都是占有生产手段的大土地所有者。在絕大多数的场合，为了逃稅，出租土地的事情是隱秘的。貧农既缺乏农具又缺乏牲口，他們大部分是用租来的工具和牲口耕种土地。地租的条件和农具及牲口租費的条件几乎苛刻到奴隶制的程度。伴随着这种物质上的奴役，金融上的高利貸也在发展。

目前农民所有权的分裂不但沒有减弱、而是加强了阶级分化的过程。机器和貸款并沒有在农业社会主义化上发生作用，而是經常落入富农和富裕农民的手中，从而加强了对雇农、貧农和下中农的剝削。

除了土地和农具集中在最高阶层的手中以外，他們使用雇工的程度也在日益增高。

另一方面，或者由于彻底破产和流散，或者由于个别家庭成员出走，因此一批数目不断增加的“雇农”正从下层和部分中层农户中出现。这些剩余劳动力有些落在富农或“力量强的”中农的奴役之下，有些流入城市，还有很多人找不到任何职业。

尽管这些情况已經发展得很严重，并且使得中农在經濟上的比重下降，但中农仍然是在数量上最大的农民阶层。把中农爭取到社会主义农业政策方面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主要問題。把我們的希望放在所謂“力量强的农民”身上，实际上就是把我們的希望放在中間阶层的进一步分化上。

只有对雇农的适当关心，只有以貧农和雇农同中农联盟为基础的路綫，只有同富农坚决斗争，只有工业化的道路，只有阶级路綫的合作社道路和阶级路綫的农村信貸制度，才能把中农吸引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上来。

实际建議

在目前正在进行的农村阶级斗争中，党必須不是口头上而是实际上站在雇农、貧农和中农基本群众前面，并且把他們組織起

来反对富农的剥削企图。

为了加强农业无产者——这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阶级地位，需要采取我们在工人阶级的状况那一节里所提出的一系列措施。

必须不再使农业贷款在大多数情况下成为农村富裕阶层的特权。我们必须结束目前这样的状况——贫农的微乎其微的储蓄不是用于他们所希望的用途上，而是用于为富裕阶层和中等阶层服务。

必须迅速发展集体化耕作，用以抵销农村私人所有制的增长。必须有步骤地、逐年资助贫农组织集体农庄。

同时，我们必须更有步骤地帮助集体农庄以外的贫农，方式有：完全免税，适当的土地政策，农具贷款，吸收他们参加农业合作社。“使苏维埃活跃起来，从而造成非党农民的活动中心”（斯大林—莫洛托夫），这个口号既没有阶级内容，而且实际上会加强农村上层的支配作用，我们必须采取下面的口号来代替它：“**建立由雇农、贫农和接近雇贫农的中农所组成的非党活动中心。**”

我们必须建立一个真正有计划的、普遍的、长期的贫农组织，这个组织以生活中的实际政治和经济问题为中心，诸如选举问题，税收问题；对贷款、机器等的分配的影响、土地分配和利用、合作社的建立、贫农从合作劳动中得到现金报酬等等。

党应该用一切手段促进中农在经济上的发展——在谷物价格上采取明智的政策，在组织贷款和合作社方面使他们可以得到贷款和加入合作社，有步骤地、逐渐地使这个人数最多的农民阶层可以得到大规模的、使用机器的、集体经济的好处。

党在日益增长的富农阶级这个问题上的任务应该是从各方面限制他们的剥削活动。我们绝不能允许继续违背我们宪法载有的剥夺剥削阶级在苏维埃中的选举权的条款。下述的措施是必需的：实行累进税制度；采取国家立法措施保护雇农和规定农业工人的工资；在土地分配和土地使用问题上采取正确的阶级政策；在向

农村提供拖拉机和其地生产工具問題上也同样采取正确的阶级政策。

农村地租制度的发展，目前使用土地的办法（按照这个办法，土地由土地公社处理，而土地公社是处在一切苏维埃的领导和控制之外并且日益处于富农的影响之下），第十四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在每年分配土地时“給以补偿”的决议——所有这一切都在破坏着土地国有化的基础。

加强土地国有化的一个重要措施是，把这些土地公社从属于国家地方机关，在处理一切有关土地分配和使用的问题上确立地方苏维埃（清洗其中的富农分子）的有力控制。这种控制的目的应该是最大限度地保护贫苦和无力的农的利益免受人数众多的富农的侵害。必须在我們現有經驗的基础上制定一系列补充的措施，用以制止土地公社中富农所占比例的过分增长。尤其是，必须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事实上把作为土地出租者的富农置于农村苏维埃政权的完全和绝对的监督和控制之下。

党应该粉碎一切旨在取消和破坏土地国有化的倾向——土地国有化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基本支柱。

目前实行的普遍农业税制度应该改变，改变的方针是：完全免除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最贫困农户的税收，并且不许因此在中农基本群众身上增加任何税收作为补偿。收税的日期应该适合下层纳税人的利益。

应该撥出为数要大得多的一笔款项用于建立苏维埃农场和集体农庄。必须最大限度地放宽新建立的集体农庄和其他形式的集体化组织归还贷款的期限。被剥夺选举权的人不能作为集体农庄的庄员。把小生产变成集体大生产的思想应该贯穿到合作社的全部工作中去。在机器供应方面必须坚决实行阶级路线，必须对欺诈的机器公司特别进行斗争。

分配土地的工作必须继续进行，其一切损失由国家负担，首先必须关心集体农庄和贫苦农户，最大限度地保护它们的利益。

谷物和其他农产品的价格应该保证貧农和中农里的基本群众起碼能够維持和逐漸提高他們現有的經濟水平。应该采取措施消除秋季和春季之間的谷物差价。因为这种差价对于农村貧苦阶层來說損失极大，而其全部利益都归于上层。

不仅必須大大地增加貧农基金的撥款，并且必須彻底改变农业貸款的方針，使之保证貧农和无力的中农能得到低利长期貸款，并且取消現在实行的保证人和担保的制度。

合 作 制

农村社会主义建設問題就是要在大規模的、使用机器的、集体經濟的基础上改造农业。正如列宁在《論合作制》一文里所說的，对于农民基本群众來說，合作制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最簡單的道路。这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无产階級专政和苏維埃制度給予农民的巨大利益。只有发展农业机械化这个方法才能为社会主义合作制（或者集体制）造成广闊的基础。沒有生产方法上的技术革命——这就是說，沒有农业机器，沒有作物輪作制，沒有人造肥料，等等——，农业真正集体化的工作就不可能成功和展开。

供銷合作社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能导向社会主义：（一）这个过程在社会主义成分（特别是大工业和工会）的經濟和政治的直接影响之下发生。（二）农业合作社發揮貿易职能的过程逐漸导致其本身的集体化。农业合作社的階級性质不仅决定于参加合作的农民的不同阶层在数量上的比重，而且尤其决定于他們在經濟上的比重。党的任务就是要尽力使农业合作制成为貧农和中农的真正联盟，成为貧农和中农反对富农經濟势力增长的斗争武器。我們必須有步驟地和坚持不懈地把农业无产者引导到建立合作社的事业中来。

只有在参加合作的人口得到最大限度独立的条件下才可能有成功的合作社結構。合作社同大工业和无产階級国家間的真正联盟应该是各合作社組織的正常制度联盟，不允許官僚主义的控制

方法。

党领导显然背离布尔什维克在农村的基本路线，他们倾向于寻求富裕农民和富农的支持；他们用反无产阶级的言词掩盖他们这种背离行为，说什么“穷人的幻想”，“吃白饭”，“懒汉主义”，并说在保卫苏联上贫农的价值不大——鉴于所有这些情形，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牢记我们党纲上的话。在明确指出我们同中农联盟的极端重要性之后，党纲简单明了地宣称：“俄国共产党在其全部农村工作中仍旧是依靠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农民力量。党首先把他们组织为独立的力量，建立农村党核心，建立贫农组织，建立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分子的特殊类型的工会，诸如此类。用一切可能的办法使他们同城市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使他们摆脱农村资产阶级和小私有者利益的影响。”^①

第四章 国营工业和建设社会主义

工业发展的速度

“社会主义的唯一的物质基础，就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②

在一定的历史情况——资本主义的包围和世界革命的迟迟不来——下，在目前最初阶段，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条件就是工业化的速度必须迅速到足以保证在最近的将来至少解决下列问题：

(一)国内无产阶级的物质地位必须绝对地和相对地加强(增加就业工人的数量，减少失业人数，改善工人阶级的物质水平，特别需要按照卫生标准扩大工人阶级的住房面积)。

(二)工业、运输和电站工作的发展速度至少必须同全国需要和资源的增長相适应。

(三)必须使农业有可能逐步过渡到较高的技术基础上，并且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中文版第93页。——中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中文版第446页。——中译者注

保证为工业提供日益增多的原料。

(四)在发展生产力的問題上,在技术問題上,在改善工人階級和劳动群众的物质条件問題上,苏联絕不能落后于資本主义国家,而必須在最近的将来超过它們。

(五)工业化必須达到足以保证国防的程度,特别是保证軍事工业的适当增长。

(六)社会主义成分、国家成分和合作社成分必須有步驟地增长,排挤一部分,同时控制和改造另外一部分前社会主义的經濟成分(資本主义的和前資本主义的經濟成分)。

虽然我們在工业、电气化和运输方面有很大成就,但是工业化还远沒有得到必需和可能的发展。目前工业化的速度以及为今后几年規定的速度是显然不够的。

沒有,当然也不可能有一种政策使我們可以一下子解决所有的困难,或者把有步驟地发展我国工业和文化的一个长时期一下子跳过去。但是我們在工业和文化上十分落后的状态要求特別緊張的努力,把我們的一切財富真正地、及时地动員起来,正确地利用每一种資源,最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工业,还有运输、电气化和建筑工作长期落在人民的要求和需要后面,落在国民經济和整个社会制度的要求和需要后面;由于这种落后,全国經济周轉好像被夹在一把鉗子里。这种落后使得农产物商品部分的成交和出口降低。它使进口受到极为狹窄的限制,使生产价格和成本提高,使切尔文^①不穩定,使生产力的发展迟緩。它延迟了无产階級和农民群众一切物质条件的改善,造成了失业的惊人增长和生活条件的恶化。它破坏了工业同农业的联盟,削弱了我国自卫的能力。

工业发展速度不够快轉过来又导致农业发展的迟緩。同时,沒有农业生产力的决定性的提高和商品生产的大量增加,工业化也是不可能的。

① 二十年代的十卢布紙币。——中譯者注

价 格

不逐步地和坚决地降低生产成本及工业品的批发和零售价格，并且使它们同国际价格平衡，就不可能加速工业化。真正的进步就在这里，无论是在提高我们的工作的技术基础的问题上，或者是在更好地满足劳动群众的要求的问题上。

现在应该停止说什么反对派希望提高价格这种下流无聊的叫嚣了。在希望降低价格上，全党是绝对一致的。但仅仅希望是不够的。政策是否正确，不应该凭意图而应该凭结果来判断。目前降低价格的斗争的结果甚至使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也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这个政策我们不是正在损失大量的金钱吗？布哈林在今年一月份问道：“十亿的钱到哪儿去了呢？”在这同一个问题上，鲁祖塔克接着布哈林问道：“批发和零售之间的差价到哪儿去了呢？”^①由于长期缺乏货物，由于极其官僚主义式地普遍降低批发价格，而这种做法在多数情况下又并没有使工人和农民受惠，就使国营工业蒙受了成亿卢布的损失。批发和零售间的差价所产生的利润（特别是落到私商手中的）是如此巨大，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应该把这种贸易利润的一部分保留在国营工业手里。从过去几年整个经济方面的经验里得出的无可辩驳的结论是：必须迅速克服不平衡状态，增加工业商品的数量，加快工业发展的速度。这才是真正降低批发和零售价格，首先是降低生产成本的唯一道路，后者在去年已经显出上升而不是下降的趋势。

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制定的五年计划

（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

载在即将召开的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议程上的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问题，完全应该成为全党注意的焦点。这个五年计划还没有正式通过，而按照它现在的样子是很难被通过的。但它却

^① 《政治局记录》，一九二七年三月三日，第20—21页。

以最系統、最完整的形态表现出目前經濟領導方面的根本观点。

按照这个計劃，**工业基本投資**几乎不是逐年增长的（明年为十一亿四千二百万，一九三一年为十二亿零五百万）。并且工业基本投資在国民經濟投資總額中所占的比例将从百分之三十六点四降低到百分之二十七点八。按照这个計劃，国家預算中工业純投資在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一这几年間，大約将从二亿降到九千万。每年生产增长率按規定应超过前一年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九——这是資本主义国家在迅速发展时期的增长率。土地、生产手段、銀行的国有化，和行政机关的集中所具有的巨大有利条件——也就是說社会主义革命所产生的各种有利条件——在五年計劃里完全沒有得到反映。

目前少得可怜的**工业产品的个人消費量**規定在五年期間只不过增长百分之十二。棉織品的消費量在一九三一年将为战前的百分之九十七，比美国一九二三年的消費量少六分之五。煤的消費量比德国一九二六年的消費量少八分之七，比美国一九二三年消費量少十八分之十七。生铁消費量比德国少五分之四多，比美国少百分之九十二。发电量将比德国少四分之三，比美国少八分之七。紙的消費量在五年最后的时候将为战前消費量的百分之八十三。所有这一切是发生在十月革命十五年之后！在十月革命周年紀念的时候拿出这样寒傖、彻头彻尾悲观主义的計劃，这实在意味着你們的工作就是要反对社会主义。五年計劃所規定的降低零售价格百分之十七即使实现了，这在我国价格同国际价格的比例上也起不了任何作用，后者比前者低二点五到三倍。

物价即使降低得这么微不足道（而且这还不过是一个計劃），五年計劃也預計到工业品将感不足，无法来滿足全国从貨幣上来計算一年可达四亿卢布对工业品的需求。只要想一想，目前惊人的批发价格在五年期間要降低百分之二十二——这减得并不算太多——，仅仅这一項就会造成为数整整十亿的貨物缺乏。**不平衡状态**就是这样維持不变，成为零售价增高的一个长期根源。五年

計劃答应农民在一九三一年将得到相当于战前数量的工业产品，而价格要高一点五倍。它答应大工业工人在五年終了的时候名义工資将增加百分之三十三，不算沒有根据的降低物价的希望。按照国家計劃委员会的设计，为了消除供求間的不平衡，将提高工人繳付的房租，使之高于目前租金額二点五倍，每年約为四亿卢布。看到居民中富裕阶层有多余的购买力，計劃委员会的官員要来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資以改变这种情况。很难使人相信，这样一种恢复市場平衡的方法，是工人国家的負責机关制定的！所有这些虛假的远景，迫使消費者从取消国家壟断对外貿易这条毁灭性道路中寻找出路。

五年計劃所規定的建筑六千到七千俄里新铁路的計劃——与此对照，例如，在一八九五——一九〇〇五年間所建的铁路为一万四千俄里——是严重地不敷需要，这不仅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观点來說，而且从各主要省份最基本的經濟要求的观点來說。

或者是偏向这边或者是偏向那边，这就是实际指导我国經濟发展的国家机关的真正态度。这就是我們目前領導方面政治路綫的真正面目。

苏联和世界资本主义經濟

在两个不可調和的敌对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間未来长期的斗争中，最終說来，勝負决定于两个制度間劳动生产率的对比。而这在市場条件下，可以用我国国内价格同世界价格的对比来衡量。列宁在他最后的一些讲话中有一次曾警告党說：即将到来的“考試”“是俄国和国际市場举行的‘考試’，我們依靠这个市場，同它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①当时他心中考虑到的就是这个根本事实。因此，布哈林关于我們可以用任何速度，甚至“龟行”的速度走到社会主义的观点，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廢話。

^①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中文版第 243 頁。——中譯者注

我們不能在閉关自守的經濟的掩護下躲开資本主义包圍。正因为閉关自守,这样一种經濟就将不得不以极端緩慢的速度前进,于是就必将遇到不是削弱了的而是加强了的压力,这压力不仅来自資本主义的軍队和舰队(“干涉”),而且首先来自資本主义的低廉商品。

当資本主义国家拥有較高的技术时,对外貿易壟断制是社会主义存在下去的必要武器。但是,目前处在建設过程中的社会主义經濟,只有在技术、生产成本、产品质量和价格問題上逐漸接近世界經濟水平,才能保持这种壟断。經濟領導方面的目标不應該是在閉关自守、自給自足的經濟,这种經濟必然以降低发展水平和速度为代价,正相反,它的目标應該是用最大限度加快速度的方法,达到我們在世界体系中的比重的全面增长。

为此:(一)必須了解我們出口的重大意义,目前,出口落后于我国工业的总发展,已經到了危險的地步。(苏联在世界商业交易量中所占的比例,已經从一九一三年的百分之四点二二减少到一九二六年的百分之零点九七。)(二)尤其必須改变我們对富农的政策,这项政策使富农可以囤积原料牟取暴利而破坏我們社会主义的出口。(三)必須全面加速我国經濟的工业化和加强我国經濟的社会主义成分(而不是資本主义成分),来发展我們同世界經濟的联系;在最近将来不應該分散我們有限的积累,而應該通过深思熟慮的計劃把它逐步投入一种新的生产,这种生产首先要保证大量生产最必需和最有用的机器;我們應該有計劃地利用世界資本主义的技术成就,周密而灵活地用这些成就来补充和刺激我們自己的工业。

把我們的希望寄托在孤立发展社会主义上面,寄托在一种脱离世界經濟的速度上面,这样就破坏了我們的整个前途。这样就使得計劃領導机关离开了正軌,并且提供不出正确的方針以調整我們同世界經濟間的关系。我們沒有办法决定什么应自己生产,什么应从国外輸入。坚决拋棄孤立建設社会主义經濟的理論,

这意味着在很少几年的过程內我們的資源将得到无比迅速的利用，更快地工业化，我們自己的机器生产将更加有計劃和有力地增长。这意味着就业工人数量更快地增加和物价的真正降低——一句话，处在資本主义包圍中的苏联得到了真正的加强。

一旦受到了封鎖，或者发生了战争，我們同資本主义世界間各种联系的增长不会造成一种危險嗎？从上述的每一点里都可以引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当然，为了备战，我們應該建立我国所需的进口原料的儲备，并且應該立刻建立极其必要的新工业——比如鋁的生产，等等。但是为了应付一場长期和严酷的战斗，最重要的事情是把国家工业发展到最高度，既能大量生产，又能迅速地从一种生产轉向另一种生产。不久以前的事例已經表明，像德国这样一个工业高度发展的、同世界市場有着千絲万縷关系的国家，当战争和封鎖一下子把它同全世界隔离开的时候，它竟然能够保持巨大的生命力和抵抗力。

以我們社会結構无比的优越性，我們在“和平”时期利用世界市場以加速我国的工业发展，我們將能够准备得更好和武装得更好地对付封鎖或者干涉。

任何国内政策本身都不能使我們免于資本主义包圍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危險。国内問題就是用正确的階級政策——即工人階級同农民間的正确关系——加强我們自己，在建設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尽量前进。苏联內部資源极为丰富，我們完全能够这样前进。我們为了这个目的而利用世界資本主义市場，就是把我們对历史的根本估計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进一步发展結合起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在某些主要国家內的胜利将打破資本主义包圍，并将解除我們的沉重的軍事負担。它将大大地在技术上加强我們，大大地加速我們的城市和乡村、工厂和学校的全面发展。它将使我們有可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这就是，以最先进的技术 and 所有成員真正平等地劳动和享用劳动成果为基础的无階級社会。

办法在哪里

社会主义专政的命运决定于真正工业化和迅速提高群众文化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为了更加大胆和更加革命地解决这两个问题，办法在哪里？对于这个问题，反对派的答案如下：

主要的办法是通过正确运用预算、信贷和价格而重新分配国民收入。辅助的办法是正确地利用我们同世界经济的联系。

(一)按照五年计划，国家和地方的预算将在五年间从六十亿增加到八十九亿，因此到一九三一年将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十六。这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较小于战前沙皇的预算，后者为百分之十八。一个工人国家的预算比起资产阶级的预算来，不仅可以而且应该在国民收入中占有更大的比例。当然，这是假定这个预算真正是社会主义的预算，除了人民教育经费日益增加之外，它将为国家工业化拨出非常庞大的款项，在今后五年过程内，预算中工业化需要的纯拨款可以而且应该达到每年五亿到十亿。

(二)税收没有随着上层农民和一般的新资产阶级的积累增长而相应提高。因此：(1)必须对私人企业的各种超额利润征税，其数额应不少于一点五亿到二亿，而不是像现在的五百万；(2)为了加强我们的出口，必须保证从富裕的富农阶层（约为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十）征集不少于一点五亿普特的粮食。这种余粮征集应以赎购的形式进行。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时，余粮曾达八亿到九亿普特，而且大部分是集中在这些上层农民手里。

(三)必须在实际上实行一种一贯和坚决降低批发和零售价格，并缩小它们之间的差价的决定性的政策。而且做法必须是这样的：降低价格的影响所及主要地应该在于工人和农民大量消费的物品方面。（可是不允许在已经够低的质量上弄虚作假，而现在正在这样做。）降低价格不应该使国营企业得不到必要的积累，而应该是主要通过这样一些方法：增加货量，降低生产成本，减轻“附加”费用，裁减官僚机构。如果降低价格政策比较灵活，比较适应

市場情況，比較能區別對待——這就是，更多地考慮到每一種貨物的市場情況——，那麼這種政策就會使現在用以養肥私人資本和一般寄生商業的大批款項，保留在國營企業手里。

(四)按照去年斯大林和李可夫所發表的宣言，據說實行節約措施每年能贏余三億到四億盧布，可是事實上結果卻微不足道。節約措施是個階級政策問題，並且只有在群眾的直接壓力下才能實現。工人必須敢於對此施加壓力。非生產費用每年降低四億盧布是完全可能的。

(五)熟練地運用對外貿易壟斷制、外國貸款、租讓制、技術援助協定之類的武器，就會為我們提供額外的收入。這樣就會大大增加我經費使用的靈活性，就會以新技術豐富和加速我們發展的全部過程，從而加強我們在資本主義包圍中的社會主義的真正獨立。

(六)選擇人員——从上到下——和正確的人事關係的問題在一定意義上說是財政問題。人員越差，需要的錢越多。官僚主義制度必然排斥優秀人員和正確的人事關係。

(七)我們現在經濟領導機關的“尾巴主義”實際上意味着億萬金錢的損失。這是我們為缺乏遠見，步調不一，極端狹隘和因循落後而付出的代價。

(八)僅僅稅收收入並不能滿足國民經濟的繼續增長的要求。必須使信貸成為按照社會主義建設方針分配國民收入的越來越重要的杠桿，這首先意味着通貨穩定和貨幣流通正常。

(九)在我國經濟上採取堅決的階級政策，限制投機和高利貸的活動範圍就會使得政府和信貸機關比較容易動員私人積蓄。這樣就有可能通過長期貸款使工業得到極其廣泛的財政資助。

(十)政府經售伏特加最初是作為一個試驗而採行的，當時的意思是，經售收入的主要部分應該放在工業化上，主要是冶金工業上。但在實際上，由於國家經售伏特加，工業化反而受到了損害。必須承認這個試驗是完全失敗的。在蘇維埃的結構下，國家經售

伏特加是一种損失，这不仅是从私营企业的立場來說——像在沙皇制度下——，而且主要是从国营企业的立場來說。曠工現象，操作粗心，生产次品，机器损坏，工业事故，火警，斗毆，伤残都增多了——这些事故的損失每年达几亿卢布。国营企业在伏特加上的損失并不少于預算从伏特加得到的收益，而比起企业本身从預算得到的撥款来，則多过好几倍。尽早（两年到三年）取消国家經售伏特加将会自动地增高工业化的物质和精神資源。

办法在哪里？这就是对这个問題的回答。說工业化速度迟緩的直接原因是缺乏办法，这是不真实的。办法虽然不多，但还是有办法的。缺乏的是正确的政策。

我們必須断然拒絕国家計劃委员会所制定的五年計劃，并且加以譴責，因为它同“把新經濟政策的俄国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这一任务是不相容的。我們必須真正实行重新分配各階級的稅收負擔——加重富农和新資產階級的負擔，減輕工人和穷人的負擔。

我們必須降低間接稅的相对重要性。我們必須在不久的将来取消国家經售伏特加。

我們必須整頓铁路運輸业的財政状况。

我們必須整頓国营企业的財政状况。

我們必須把被忽視的林业恢复到正常状态，林业能够并且應該成为大宗收入的来源。

我們必須保证貨幣的无条件稳定。貨幣稳定一方面需要降低物价，另一方面需要預算上沒有赤字。絕不允許为消弥赤字而发行紙币。

我們的預算必須是用途严格的預算，沒有赤字、铁面无私，絕不允許任何不必要或者額外的东西。

我們必須在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預算中大批增加国防（主要是軍事工业），一般工业，电气化，運輸，住房建筑，农业集体化的撥款。

我們必須断然抵制一切想干預对外貿易壟断制的企图。

我們必須採取堅決方針，在增加技術力量和改善群眾物質條件的基礎上，實現工業化、電氣化和合理化。

第五章 蘇維埃

資產階級國家的官僚機構，不管它採取什麼形式，總是在統治階級內部培養互相忠誠，在群眾中間有計劃地散布恐懼和對統治者的服從心理，用這樣的方法來使自己騎在人民頭上和鞏固自己的統治。十月革命用工农兵蘇維埃代替了舊的國家機器，給了資產階級國家這個老偶像以歷史上最沉重的打擊。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的黨綱說：

“俄國共產黨對官僚主義進行最嚴厲的鬥爭，為了徹底戰勝這種弊害，黨提出下述措施：（一）使每一個蘇維埃委員必須擔任一定的國家管理工作。（二）使這些工作不斷變換，以便每一個委員逐漸參加國家管理的一切部門。（三）逐步吸引全體勞動人民，直到最後一個人，參加國家的管理工作。充分和全面實行這些措施——這些措施是巴黎公社所開辟的道路的進一步發展——，簡化行政管理職能，再加上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這將導向國家權力的消滅。”^①

蘇維埃的官僚主義問題還不僅是一個文牘紛繁和機構人員龐大的問題。根本上這是官僚機構所扮演的階級角色的問題，它的社會聯系和同情的問題，它的權力和特權地位的問題，它同新資產階級和不熟練工人之間的關係，同知識分子和文盲之間的關係，同蘇維埃“閣下”夫人和無知農婦之間的關係等等，等等的問題。幹部站在哪一邊呢？這是千百萬工人每天在實際生活中不斷提出的問題。

在十月革命的前夜，列寧提到馬克思對巴黎公社的分析，他有

^① 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九卷，中文版第 87 頁。——中譯者注

力地強調指出這個思想：“在社會主義下，公職人員將不再是‘官僚’或‘官吏’，其所以能如此，那是因為除了實行選舉制度以外，還可以隨時撤換，還把薪金減到工人平均工資的水平，並且還以‘同時兼管立法和行政的工作機關’去代替議會制機關”。^①

最近幾年蘇維埃國家機構是向什麼方向發展的呢？向着精簡機構和節省開支的方向嗎？無產階級化嗎？接近城市和農村的勞動者嗎？縮小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距離嗎？在生活條件、權利和義務方面更加**平等**的問題上，情況怎麼樣？我們在這方面前進了嗎？非常明顯，對於這些問題中的任何一個，你都不能作出肯定的回答。（當然，不言而喻，真正的和完全的平等只有在階級消滅以後才能達到。）

在新經濟政策時期，平等化的任務是受到阻礙和遲延了，但是並沒有取消。對我們來說，新經濟政策不是通向資本主義的道路，而是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所以，逐漸吸引全體勞動人民直到最後一個人參加國家管理工作，有步驟地爭取較大的平等，這仍然是黨在新經濟政策時期的最重要的任務。這個鬥爭只有在國家日益工業化和無產階級在物質及文化建設的一切部門居于優勢的基礎上才能取得勝利。在過渡時期，這個鬥爭並不排斥給合格的工人以較高的工資、提高專家工作的物質水平。它也並不排斥給教員以高於資產階級國家的工資，等等。

必須注意，近幾年來官員隊伍的人數一直在增長。它在鞏固自己，把自己置於一般人民之上，在同城市和農村的較富有的分子結合在一起。一九二五年的“指示”把選舉權給了為數眾多的剝削分子，這不過是一次很清楚的表現，表明這個官僚機構（直到它的頂峰）對於社會上富有的、發財的、興旺的分子，已經變得有求必應了。取消這些指示——它們實際上是對蘇維埃憲法的破壞——，是反對派批評的結果。但是在新指示下的第一次選舉在一些地方已

① 《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中文版第474頁。——中譯者注

經暴露出有一种得到上面鼓励的意图，要尽可能地减少富裕阶层中被剥夺公权的人数。但是，问题的中心不在这里。在新资产阶级和富农不断相对增长、并且日益同官僚机构靠攏的情况下，在我們总的领导机关的錯誤路綫下，即使他們被剥夺了选举权，他們仍然能够影响——虽然是在幕后——行政人員和政策，至少对較低的苏維埃机关是如此。

下层富农和“半富农”分子及城市资产阶级对苏維埃的渗透开始于一九二五年，由于反对派的攻击曾使之部分地停止，这种渗透是一个十分深刻的政治过程，如果忽視或者掩盖这个过程，就会給无产阶级专政带来悲惨的后果。

城市苏維埃，这是使工人和劳动群众直到最后一人参加国家管理工作的基本工具，近年来它已經失掉了一切真正的作用。这是阶级力量对比无可怀疑地向着不利于无产阶级的方向改变的表现。仅仅在行政上“复活”苏維埃来抵抗这种現象是不可想像的。只能用坚决的阶级政策来抵抗它——坚决反对新的剥削者，毫无例外地在苏維埃国家的一切組織和机关中增加无阶级的活动和比重。

莫洛托夫的“理論”說，我們不可以要求工人靠攏国家和国家靠攏工人，因为我們国家本身在内容和性质上已經是一个工人国家^①，这是官僚主义最最恶性的公式。它事先就批准了一切可以想像得到的官僚主义蜕化。在現领导集团下，对于莫洛托夫这个反列宁主义的“理論”——这个理論得到苏維埃官僚机构的广大人士公开的或者默认的同情——的任何批評，都被叫作社会民主主义傾向。但是严厉地譴責这个“理論”以及一切类似的“理論”，是进行任何真正斗争以反对官僚主义蜕化的必要条件。这个斗争并不仅仅意味着把一定数量的工人变成干部。它意味着整个国家机构在一切日常工作中靠攏工人和貧农。

目前官方所进行的反官僚主义斗争，不是以工人的阶级活动

^① 《真理报》，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为基础，而是企图以机关本身的活动代替它，这个斗争不会也不能有重大结果。在许多情况下，它反而促进和加强了现有的官僚主义。

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近几年来在苏维埃内部生活中发生了一系列完全反动的过程。苏维埃同基本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上的决定越来越没有关系。它们正在变成执行委员会和主席团的附属品。政府工作完全集中在后者的手里。在苏维埃全体会议上讨论问题只不过是做给人看的。同时，苏维埃机关两届选举之间的时期正在延长，它脱离广大工人群众的情形正在增长。所有这一切大大地加强了官僚分子在决定一切问题时的影响。

庞大的城市经济部门的管理工作常常操在一两个共产党人手里，他们选用自己的专家和自己的工作人员，并且常常完全依赖这些人。没有适当训练苏维埃的人员。从下到上都没有让他们参加实际工作。因此在苏维埃机构里不断有缺乏熟练工作人员的抱怨。因此权力越来越多地转到官僚方面去。

苏维埃重要工作部门由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和行政人员，只要同苏维埃主席发生冲突，就马上被撤换。如果同党的省委员会发生冲突，他们被撤换就更快。结果，选举原则已荡然无存，对选举人负责云云也失去了任何意义。

因此：

(一)必须采取坚决的政策同官僚主义斗争——像列宁那样进行这个斗争，使它成为阻止新资产阶级和富农的剥削意图的真正战斗，达到这一点的方法是：在党、工会和苏维埃内部坚持一贯地扩大工人民主。

(二)必须采取使工人、雇农、贫农和中农——反对富农——同国家紧密联系的口号，国家机关无条件地为劳动群众的基本利益服务的口号。

(三)作为使苏维埃恢复活力的基础，必须加强工人、雇农、贫农和中农的阶级活动。

(四)必須把城市苏維埃变成真正的无产階級政权机关，变成引导广大工人群众参加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工作的工具——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实现城市苏維埃对地方执行委员会及其所屬机构的控制。

(五)必須完全停止撤換由选举产生的苏維埃干部，除非在真正和绝对必要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时，应该把理由向选举人讲清楚。

(六)我們必須做到，使最落后的不熟练工人和最无知的农妇凭他們的經驗相信，在无论什么国家組織里，他們都将得到关怀、忠告和一切可能的支持。

第六章 民族問題

社会主义发展的总速度的迟緩，城乡新資產階級的成長，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增加，国家机关內官僚主义的发展，恶劣的党内制度，同这一切相联系着的是大国沙文主义和一般的民族主义精神的发展——所有这些东西都畸形地表现在苏联內部的民族問題和自治共和国問題上。由于一些自治共和国存在着前資本主义文化的殘余而使得这些問題更加复杂。

在新經濟政策下，私人資本的作用在工业落后的边疆地区異常迅速地增长着。在这些地区，經濟机关常常把它們的賭注完全押在私人資本家身上。它們确定物价时不考虑貧农和中农群众的实际状况。它們人为地降低雇工的工資。它們无节制的在工业同供給原料的农民之間实行官僚主义的私人中介的办法。它們把合作社导向使乡村富裕阶层得到更多好处的方向。它們忽視特別落后的畜牧业者和半牧业者的利益。主要問題——如何实现工业建設計劃，特别是农业原料生产的机械化計劃——完全置諸脑后了。

官僚主义在大国沙文主义精神的支持下，把苏維埃中央集权制变成了爭吵的源泉，为的是如何在各民族間分配官爵(南高加索

联邦)。它破坏了中央同边疆地区的关系。实际上，它使苏维埃民族院丧失了任何意义。它对自治共和国行使官僚主义的监护权，甚至剥夺后者处理当地居民同俄罗斯族居民间土地纠纷的权利。直到今天，这种大国沙文主义，特别是表现在国家机关中的大国沙文主义仍然是阻碍各族工人互相接近和团结的主要敌人。

给予贫农真正的支持，使一般中农群众接近贫雇农，把后者组成独立的阶级力量——所有这一切在民族州和共和国里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如果不把雇农真正组织起来，不建立合作社和组织贫农，我们就有使我国东方落后地区停留在他们传统的奴役状态中，使这些地区的地方党组织完全失掉真正下层阶级党员的危险。

共产党人在比较落后或刚刚觉醒的民族间的任务应该是把民族觉醒的过程纳入苏维埃—社会主义的途径。我们应该把劳动群众吸引到经济和文化建设工作中来，特别是用促进本地语言和学校的发展和使苏维埃机关“民族化”的方法。

在同其他民族或少数民族有磨擦的地区，随着资产阶级分子的增长，民族主义常常变得非常嚣张。在这样的情况下，实现地方机关的“民族化”就使少数民族吃亏。边界问题成为民族嫌隙的来源。党、苏维埃和工会工作被民族主义的空气所毒化。

乌克兰化、突厥化等等，只有在联盟的组织 and 机关里消灭官僚主义的和大国主义的习气以后才能真正实现；只有无产阶级在民族共和国占支配地位的条件下，只有在我們以下层阶级作为自己的支柱，并且同富农和沙文主义分子进行继续不断和毫不妥协的斗争的条件下，才能真正实行。

这些问题在像顿巴斯或巴库这类工业中心地区是特别重要的，这些地区的无产阶级居民人数众多，他们同周围农村的广大群众属于不同民族。在这种情况下，城乡间正确的文化和政治关系要求：（一）城市对不同民族的农村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必须采取特别关心和真正兄弟式的态度；（二）必须坚决抵抗资产阶级挑拨城乡关系的任何企图——不管是对待农村地区抱官僚主义傲慢态

度，或者是对城市反动富农式的仇恨。

我們的官僚主义政权把表面“民族化”的实际执行轉交到官員、专家和小資產階級教員手里，而这些人同城乡上层階級有千絲万縷的社会和文化联系。他們使自己的政策符合上层階級的利益。这样就使当地的穷苦阶层不敢接近党和苏維埃政权，把他們投入商业資產階級、高利貸者、反动神父和封建族长的怀抱。同时，我們的官僚主义政权把民族中真正的共产主义分子打入冷宮，常常把他們斥为“異端分子”，用一切可能的方式迫害他們。例如，格魯吉亞一批重要的老布尔什維克就曾經有过这种遭遇，他們得罪了斯大林集团，而列宁在他在世的末期还热烈地維護了他們。

十月革命喚起了民族共和国和民族的工人群众，因此他們热望立刻独立地参加实际建設生活。我們的官僚主义政权用地方民族主义的叫喊来吓唬群众，企图以此而使他們的热望消沉下去。

我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认为必須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殘余”，反对“苏联国内各民族在經濟和文化上的不平等”，反对“曾經受过俄罗斯族沉重压迫的各族人民中的民族主义殘余”。有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州負責干部参加的党的第四次代表會議（一九二三年）^① 宣称：“党的根本問題之一是在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州的当地居民中的无产階級和半无产階級分子中間支持和发展共产主义的組織”。代表會議一致宣称，从中央到落后的共和国和州去的共产党人，他們應該扮演的角色“不是教师和保姆，而是帮助者”。^② 最近几年来，整个事情正好是朝着相反方向发展的。中央委员会書記处所任命的民族党机器的领导人，包办了党和苏維埃的一切問題的实际决定工作。他們排挤积极的各民族工作人員，把他們当成一种次等共产党人，他們被吸收参加工作，不过用来起形式上的“代表作用”（克里木，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韃靼里亚，北高

① 原文如此。据《联共(布)党史簡明教程》，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召开于一九二三年，第十三次党代表會議召开于一九二四年。——中譯者注

② 列宁。

加索的山区各省,等等地方)。从上而下把地方党的工作人员人为地分成“右派”和“左派”的做法已经成为一种制度,以便中央机关任命的书记可以独断独行地指挥这两类人。

在民族政策方面,正如在其他方面一样,必须回到列宁主义的立场上来:

(一)有计划地、有原则地、坚持不懈地努力消除不同民族的工人间的民族界限——对新来的“民族”工人要特别照顾,提高他们的技术,改善他们的生活和文化条件;牢牢地记住,把落后的民族地区引导到苏维埃建设工作中来的真正杠杆,在于在当地居民中形成和发展无产阶级核心。

(二)以加快边疆落后地区工业化速度的观点重新考虑五年经济计划;制定一项十五年计划,这个计划应把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州的利益考虑在内。使我们的收购政策适应贫农和中农的作物生产(中亚细亚的棉花,克里木和阿布哈兹的烟草,等等)。执行合作社信贷政策以及土壤改良政策(在中亚细亚、南高加索等地)应该按照严格的阶级路线,并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联系起来;更多地注意畜牧合作社的发展;在原料农业的耕作上实行机械化的方式应该适应当地条件。改正我们的移民政策,使之在民族问题上严格符合正确政策的利益。

(三)真诚地实行把苏维埃、党、工会和合作社机构民族化的政策,同时认真考虑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进行真正斗争,反对在国家、合作社和其他机关的活动中的殖民者态度;取消处在中央和边疆地区之间的一切官僚主义的中介机关;从南高加索联邦在促进那些民族的工业和文化发展上的成功和失败中,去学习它的经验。

(四)从各方面消除妨害苏联各民族工人在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革命基础上进行最充分的联合和团结的一切障碍;坚决反对把占优势的民族语言机械地强加于其他民族的工人和农民。在这个问题上,劳动群众必须有充分的选择自由。每一个民族共和国内

各省任何少数民族的真正权利必须得到保证。在这方面的一切工作上，必须特别注意过去的被压迫民族和过去的压迫民族之间所产生的特殊情况。

(五)坚持一贯地在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州实行党内民主；绝对不允许对非俄罗斯民族采取发号施令的态度，不允许从上而下进行任命和调动；抛弃硬把非俄罗斯共产党人分成右派和左派的政策；要特别注意提拔和教育下层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农业无产阶级和(反富农的)农民党员。

(六)反对烏斯特里雅洛夫倾向和一切种类的大国主义倾向——特别在中央各人民委员会和一般国家机关里。以民族问题上的明确和一贯的阶级政策为基础，进行一次反地方民族主义的教育运动。

(七)把苏维埃民族院变成同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州的生活相联系的实际职权机关，真正能保卫它们的利益。

(八)适当注意工会工作中的民族问题和建立民族无产阶级单位的问题。这些工会里的工作应该用当地语言来进行，所有各民族和少数民族的利益都应该得到保护。

(九)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给剥削分子选举权。

(十)第五次民族代表会议必须在真正代表“下层”阶级的基础上召开。

(十一)在报纸上公布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信件，在这封信里列宁批评了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路线。

第七章 党

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党曾经赢得过像我们党所赢得的这样巨大的胜利，迄今十年来我们党一直领导着一个无产阶级并且实现这个阶级的专政。俄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工具。俄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领导党。没有其他任何党担负过像我们

党所担负的这样一个国际历史责任。但正由于这个原因，由于它所掌握的权力，我们党应该毫无畏惧地批评自己的错误。它应该暴露自己的阴暗面并且清楚地看到实际蜕化的危险，以便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列宁在世时常常是这样的，他经常警告我们防止自己蜕化成“骄傲自大的党”^①的危险。在展示下面这幅我党目前状况和它的一切阴暗面的图画时，我们，反对派，表示坚定的希望：如果采取真正的列宁主义政策，党是能够克服它的弱点并且足以担当它的历史任务的。

(一)近年来，我们党的社会成分一直在恶化。我们党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时的成分的约数如下：

实际从事产业和运输业的工人	430,000
农村雇工和农业工人	15,700
农民(半数以上现在是政府干部)	303,000
干部(半数以前是工人)	462,000

由上表看来，在一月一日的时候，我们党只有三分之一的车间工人(事实上只有百分之三十一)，而三分之二是农民，干部，前工人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人”。

在过去一年半之间，我们党大约失去十万车间工人。一九二六年“自动”退党的普通党员达到二万五千人，其中百分之七十六点五是车间工人^②。根据官方材料(它当然把实际情况加以缩小)，由于最近同党员重新登记一起进行的所谓“甄别”，大约有八万党员被开除出党，其中的绝大多数是产业工人。“以相对数字计算，今年初登记的党员占全体党员的百分之九十三点五”^③。因此，仅仅通过重新登记的办法，就“甄别掉了”全体党员的百分之六点五(约为八万党员)。在被“甄别掉”的党员中，大约百分之五十为熟练工人，三分之一强为半熟练工人。中央委员会要缩小这些业经大大缩小

① 《列宁全集》第三十卷，中文版第486页。——中译者注

② 《消息报》，第二十四、二十五号。

③ 同上。

的資料的企圖是顯然沒有得逞的。我們用斯大林的“甄別”抵消了“為紀念列寧而吸收黨員的運動”。

另一方面，從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以來有十萬農民被吸收入黨，其中大多數是中農。雇農的百分比是微不足道的。

(二)黨的領導機關的社會成分的惡化情況更加嚴重。在縣(小區)委員會里，農民(出身)占百分之二十九點五，職員及其他占百分之二十四點四；這些委員會成員的百分之八十一點八是各國家機構的雇員。車間工人在這些黨的領導機關的全體工作人員中所占的比數幾乎等於零。州和省委員會里，車間工人所占比數為百分之十三點二；在縣委員會里為百分之九點八到百分之十六點一^①。

黨本身約有三分之一的黨員是產業工人，而在那些黨的決策機關里，產業工人只占十分之一。這構成對黨的嚴重危險。工會也是走着同樣的道路^②。這表明來自小資產階級的“行政人員”和“工會官僚”，把我們手里的權力拿去了很大一部分。這是使黨“非無產階級化”的最可靠的道路。

(三)“前社會革命黨人和前孟什維克”在黨機器內和在一般領導崗位上的作用增大了。在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的時候，在居于我們報紙負責和指導地位的人中，有百分之三十八是以前參加過其他黨派的^③。目前情況更壞一些。掌握黨的布爾什維報紙的實際指導工作的，或者是“青年”修正主義派(斯列普柯夫，斯捷茨基，馬里耶茨基及其他人)，或者是其他黨派的前黨員。在居于我們黨的行政機構領導地位的人中，約有四分之一是前社會革命黨人和前孟什維克。

(四)在一切方面，官僚主義都在增長，但是它的增長在黨內特別具有破壞性。現在的黨官僚們是這樣看問題的：

① 《統計匯刊》，一九二七年六月十日。

② 請參閱關於工會內工人狀況的一章。

③ 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的記錄，第83頁。

“我們有許多黨員，他們還沒有适当地了解党，了解党到底是什么样的組織。他們认为党是从支部建立起来的——支部是党的基础，然后区委員会，这样一层层地向上建筑，直到中央委員会。这是不正确的(!!!)。必須由上而下看我們的党。在一切实际关系上和在我们党的全部工作中，都必須遵守这个观点。”①

比較負責的同志，比如烏格拉諾夫，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等人給我們規定的党内民主的定义，本质上和这是同一回事。

这个“新”概念是极端危险的。如果我们当真承认“必須由上而下看”我們的党，那就意味着，列宁主义的党——工人群众的党不再存在了。

(五)党内民主在过去的几年内被一步一步地取消了——这破坏了布尔什維克党的整个傳統，破坏了一系列党代表大会的直接决定。干部的真正选举在实践中已經不存在。布尔什維主义的組織原則沒有一点不受到歪曲。党章被系統地篡改，目的在于增加上层的权利，而减少下层核心的权利。县、区、省委員会的选举期限被中央委員会延长为一年，两年，以及更长的時間。

省委員会、省执行委員会、省工会理事会等組織的领导人实际上是不变动的(任期从三年到五年以及更长的時間)。任何一个黨員和任何一部分黨員“向全党申訴根本不同意見”②的权利实际上被取消了。在召开代表大会和代表會議以前，不把一切問題让全党进行事先的自由討論(像我們在列宁领导下时所經常做的那样)。要求进行这种討論被看作破坏党的紀律。完全忘了列宁的話：“布尔什維克‘參謀部’必須真正为其部队的忠实而直觉的意志所支持，这支部队服从參謀部，同时又指导參謀部。”

党内正出現一种意义极为重大的情况——这是总路綫的必然副产物——，这就是驅逐党内的老人，这些人经历了地下时期，或者

① 俄国共产党北方地区委員会第二書記的講話，刊載于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七日的《斧头》上。

② 列宁。

至少經歷了內戰，有他們自己的观点，而且能够維護自己的观点。他們被一些新分子所代替，这些新分子的突出优点是盲目服从。

这种以革命紀律的名义从上而下所培养的服从，其实和革命紀律毫无关系。現在被提升到工人階級基层組織和行政机构的領導地位的新共產黨員，常常是从那些一貫以对革命前原来的当局馴順著称的工人中挑选出来的。他們的得寵是由于他們以明显尖銳的敌視态度对待老的工人黨員——在革命最艰苦时刻的工人階級領袖人物。

同样的現象以更加丑恶的形式出現在国家机关里，人們在那儿常常会遇到苏維埃“党”老爷的完善典型。在庄严的場合，他以十月革命的名义发誓；他的与众不同的特点是对自己的工作完全漠不关心；他彻头彻尾地生活在資產階級环境中，背后大罵他的上級，而在党的會議上“痛斥”反对派。

一个領導黨員（首先是書記）的实际权利要比一百个普通黨員的实际权利大得多。这种日益以党机器代替党的情形是由斯大林的“理論”所促成的，这种“理論”背棄了对于每一个布尔什維克來說是不可破坏的列宁主义原則——无產階級專政可以并且只能通过党的專政来实现。

党内民主的死亡导致工会和其他所有非党群众組織內的一般工人民主的死亡。

党内分歧被曲解了。对于那些被斥为“反对派”的布尔什維克們的观点，进行一連几个月和几年的恶意論战。但是却不容許这些布尔什維克們在党的報紙上闡述他們自己的观点。昨天的孟什維克，社会革命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崩得分子，犹太民族主义者，都在《真理报》上攻击和譴責一些中央委員提交給中央委員會的文件。他們把这些文件断章取义。但是文件本身却从来没有发表过。党的基层組織被迫投票“譴責”他們对之毫无所知的文件。

党被迫根据官方的“說明”和注解来判断我們的不同意見，而这些“說明”和注解往往既不真实又极无知，使人作嘔。列宁的話：

“誰仅仅根据无稽之談而相信什么，誰就是个毫无希望的傻瓜”已由另外一句話来代替：“誰不相信官方的話，誰就是反对派”。傾向反对派的产业工人为了他們的态度不得不付出失业的代价。普通党员不能大声說出自己的意見。党的老干部被剝夺了在报纸上或在會議上的发言权。

捍卫列宁观点的布尔什維克們被誣蔑为想要制造“两个党”。这个精心編造的指責，是为了使工人一致反对反对派，因为工人自然是热情維護他們党的統一的。对于斯大林的孟什維主义严重錯誤的任何批評（关于中国革命問題，英俄委员会等），都被說成是“反党斗争”。情况就是这样，尽管斯大林事先从来没有向党提出过任何問題，无论是中国革命政策，或者任何其他重要問題。关于反对派要制造“两个党”的指責，每天有一些人重复不休，这些人自己的目的正是要把布尔什維克—列宁主义党员排挤出党，以便他們可以放手实行他們的机会主义政策。

（六）几乎党的全部教育工作和全部基本政治文化事业現在都已成为整反对派的課程。强制的方法不仅几乎完全代替了說服的方法，而且补充以欺騙党的方法。党的教育成为仅仅是官方宣傳，因此逃避这种教育成为一般的傾向。會議，党校和小组活动現在都供作整反对派之用，因此参加的人数大大下降。对于党机器目前的錯誤路綫，全党正在采取消极抵抗。

（七）近年来，不仅个人野心、官僚主义和不平等現象在党内日益发展，而且发源于異己和敌对阶级的浊流也流入党内——比如，排犹主义。党要保全自己就必须对这类污秽进行无情的斗争。

（八）虽然有这样一些事实，但是压制的措施却完全针对左派。由于反对派在其所屬的支部会上发言，由于他們大声疾呼，由于他們企图宣讀列宁遺囑，因而把他們开除出党已經完全变成慣例。在政治認識水平上，更加重要的是在他們对党的事业的忠誠上，被开除者常常是高出于开除者的。这些同志虽然处于党外——因为对蔣介石、柏塞尔或他們自己的官僚“不信任”和“抱悲观主

义”，因此有罪——，但他们继续过党的生活。比起那些仍然是党员的野心家和市僧来，他们远为真诚地为党服务。

(九)由于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临近，目前压制和威胁的冰雹大大地加紧了，为的是进一步威吓党。这就证明了这个事实：斯大林和李可夫联盟为了掩盖其政治错误，必然求助于极端手段。它在每一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上把党置于既成事实之前。

(十)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这是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根据同斯大林一致的原则制定的）是错误的。目前中央委员会的核心继续在摇摆之中向右移动。取消党内民主是政治路线根本错误这个事实的必然结果。既然这条路线反映着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压力，反映着包围我们党的非无产阶级各阶层的影响，那么就必须由上而下来强迫执行。

在理论方面，所谓“青年学派”占有垄断地位。这是修正主义者的学派，他们任何时候都准备执行党机器的学术命令。受过布尔什维克党真正传统的熏陶的青年布尔什维克优秀分子，不仅遭到排挤，而且实际上受着迫害。

在组织方面，政治局实际上隶属于书记处，书记处隶属于总书记，这早已是一个既成事实了。列宁在他的遗嘱中所表示的最大担心——担心斯大林不够忠顺，担心他不按党的方式使用他所“掌握的”“极大权力”——已经得到了证实^①。

目前在中央委员会和党的一般领导机关里存在着三种基本倾向。

第一种倾向是公然无忌的右倾。这种倾向又包括两个集团。其中之一，由于它的机会主义和软弱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代表“经济上有势力的”中农的。它的路线是中农决定的，它受到中农思想的指导。属于这个集团的有这样一些同志：李可夫，亚·彼·斯米尔诺夫，加里宁，格·彼得罗夫斯基，楚巴尔，卡敏斯基及其他

^① 列宁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和一九二三年一月四日的信件。

人。紧紧圍繞着他們活动的是一些“非党”政客：康德拉节也夫之流，薩基林之流，查雅諾夫之流，以及富农的其他代表們，他們或多或少地公开宣揚烏斯特里雅洛夫的理論。在每一个省，尤其在每一个县都可以看到不少小康德拉节也夫和小薩基林，他們在那里拥有一份真正的权力和影响。第一种总傾向的另一个集团是由工会領袖构成的，他們代表着工人和職員中的高薪阶层。这个集团的特点是希望同阿姆斯特丹国际^①加强联系。这个集团的領袖是托姆斯基，麦里尼昌斯基，多加多夫等同志。这两个集团之間有一定程度的磨擦，但是它們要使党和苏維埃国家的路綫無論在国际政策或国内政策上右傾的意图，却是一致的。它們都是以蔑視列宁主义理論和鄙棄世界革命策略著称的。

第二种傾向是官方机器的“中派主义”。这种傾向的領袖是斯大林，莫洛托夫，烏格拉諾夫，卡岡諾維奇，米高揚，基洛夫諸同志。实际上就是現任的政治局。不断搖摆的布哈林“代表了”这一集团的政策。这个官方中間集团本身絕不代表任何广大群众的态度，但是它却企图——不是沒有成功——使自己代替党。党的、工会的、产业机构的、合作社的、国家机关的“行政人員”这个阶层現在已达几万人。其中有不少“工人”官僚——这就是說，以前是工人，而現在同劳动群众已經失去了一切联系。

不消說，在对革命前途有如此巨大重要性的行政和领导机关里，当然也有成千上万坚定的革命者，他們是沒有同群众断絕联系、无限忠誠于工人事业的工作人員。他們在这些机构里进行着真正的共产主义劳动。

但是这并不能改变由于政治路綫和党的制度的蜕化变质而产生了人数众多的真正官僚阶层这个事实。

这个阶层的实际权力是巨大的。正是这个“行政人員”集团坚

① 改良主义的工会国际組織，正式名称是“国际工会联合会”，一九一九年七月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成立，受第二国际领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解散。

——中譯者注

持主張“安安靜靜”，“关心业务”——而最主要的是“不准討論”。正是这个集团自滿地宣布(并且有时是真正地认为)，我們已經“快要达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綱領的十分之九”已經完成。正是这个集团“高高在上地俯視”全党，更加高高在上地俯視非熟练工人、失业者、雇农。这个集团认为主要的敌人在左边——这就是說，在革命的列宁主义者之中。这个集团提出“向左开火”的口号。

目前，右和“中間”这两种傾向，由于它們共同敌視反对派而团结起来。但是如果清除了反对派，它們之間的冲突就会加剧。

第三种傾向就是所謂“反对派”。这就是党的列宁主义派。由于統治集团要掩盖自己的机会主义，它就可鄙地企图把反对派說成是一个右傾派別(“社会民主主义傾向”等等)。反对派是拥护党的統一的。斯大林硬說反对派要建立“第二个党”，他在这面謊言的旗帜之下宣傳自己的綱領——“清除”反对派。反对派用自己的口号回答道：“不惜任何代价維護列宁主义的俄国共产党的統一。”目前这个文件闡明了反对派的綱領。党內的工人階級成分和一切真正的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維克将会拥护它。

反对派不得不在艰苦的条件下为列宁的事业而斗争，因此个別人背离反对派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三种傾向的領袖中間将会发生个別人的重新組合，但是这种重新組合并不能改变这个問題的根本事实。

(十一)把所有上述事实合在一起就构成党的危机。自从列宁逝世以来，党内分歧日益深刻化，牵涉的根本問題越来越多，范围日益扩大。

党内群众的基本情緒是希望党統一。现在的制度使全党无从理解，威胁着党的統一的危險来自什么地方。在每一个尖銳和重要的問題上，斯大林的全部策略是使全体党员面临单一的抉擇：要么放棄你自己的意見，要么承受企图分裂的指責。

我們的任务是不惜任何代价以保持党的統一，坚决反对分裂、割除、驅逐、开除等等政策——但同时在这統一这个界限內，保证全

党有权对一切有爭論的問題进行自由討論和做出决定。

反对派在揭发目前党内錯誤和不正常状况的同时，深信党内工人阶级成分的基本群众终于能够不顾一切把党带回列宁主义道路。反对派的根本任务就是去帮助这个过程。

实际建議

(一)必須像我們在列宁在世时所做的那样，在真正党内民主的基础上准备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列宁写道：“每一个党员应当冷静地和极其公正地研究：(1)意見分歧的实质，(2)斗争的发展……这两个問題都需要研究，同时还一定要有能够从各方面进行检查的最精确的印刷文件。”^①中央委员会必須让每一个党员有可能研究目前党内分歧的实质和目前斗争的发展。为了这样做，它必須通过报纸以及特刊和小册子，发表对党至今隱瞞的全部文件。

任何一个或一部分同志，都应该有机会在报纸上、会议上等等场合对党闡述自己的观点。

中央委员会的、地方組織的、个别党员的和部分党员的中心提綱（政綱），应该至少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前两个月在《真理报》（或者《真理报》增刊）和地方党报上发表。

爭論的进行应该是实事求是的和真正同志式的，不允許攻击个人和夸大事实。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全部准备工作的主要口号应该是統一——不是虛假的統一，而是俄国共产党的真正列宁主义的統一，整个共产国际的真正列宁主义的統一。

(二)必須立刻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改进党及其领导机关的社会成分。为了这个目的，我們必須重申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決議：“在最近的将来，直接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人应构成党员的大多数”。在今后二三年間，我們应该仅仅和专门吸收来自車間的男女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中文版第26—27頁。——中譯者注

工人和在田里干活的男女雇工，把这作为一般原则。从其他社会阶层吸收党员，只能在严格的个别挑选的基础上进行；红军和红军战士，只有工人阶级或农村无产阶级或贫农出身的才能吸收；贫农只有经过至少两年的社会政治工作考验以后才能吸收。必须停止吸收来自其他党的人们。

我们必须执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在区委员会、省委员会等机关的全体人员中，车间工人不应少于百分之五十。这项决议实际上被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所取消，这是违背反对派意志的。在工业中心，我们必须保持车间工人的稳定多数（不少于四分之三）。在县委员会里，应有同样的由工人、雇农和贫农组成的多数。

（三）必须在实际生活中实现和执行关于党内民主的决议，这项决议是第十次党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并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五日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重申过，第十二次和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也重申过这项决议。

我们必须以全党的名义重申：“‘工人’民主意味着一切党员有对党内生活重大问题公开表示意见和进行自由讨论的权利。有选举负责领导人员和从上到下各级委员会的权利。”^①这是同乌格拉诺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日沃夫等人所发明的和传播的关于党内民主的反列宁主义新定义完全不同的。我们必须对在现实生活中损害每个党员的这种基本权利的人采取惩罚措施。

一般地说，党内少数在任何原则问题上的观点，都应通过党报等方式使全体党员得知。只有在有关问题是秘密的条件下，才允许有例外。不言而喻，在决议通过以后，就要按照布尔什维克铁的纪律予以执行。党的争论俱乐部网必须扩大，必须使党的机关报刊能够被用来对党领导的错误进行真正的批评（采取讨论专页，文选汇编等形式）。

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以来加进党章里面的那些不好的改动

① 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

(第二十五,三十三,三十七,四十二,五十等頁),必須取消。

(四)我們必須採取使全部黨機構無產階級化的堅定路線。構成整個黨機構決定性多數的應該是那些受黨和非黨群眾擁護的車間工人和先進的共產黨人。黨機構絕不應該完全由領取薪金的人員構成,而應該經常從工人中吸收人員來加以更換。地方組織(包括州和省)的預算基本上應依靠黨費。地方組織應該定期地確實地把它們的賬目向黨員群眾公布。目前黨的龐大預算和付給黨機構的薪金應該堅決削減。很大一部分的黨的工作應該由黨員在企業或其他工作以外抽時間盡義務來做。恢復黨機構生氣的措施之一就是系統地把一些同志從機關下放到工廠和其他下層工作中去。我們必須反對書記使其本身不能更換這種傾向。我們必須確定書記和其他負責職位明確任期。我們必須進行無情的鬥爭以反對最高集團的腐化和墮落,反對培植親信,“官官相護”等等。(例如:司茲蘭,赫爾松,伊爾庫茨克,赤塔等地。)

(五)早在列寧領導下的第十次代表大會上,就已經通過了一系列的決議,着重指出在黨內和勞動群眾內部更加平等的必要性。早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黨已經注意到,在新經濟政策下那些因其活動而同資產階級發生聯系的黨的工作人員有蜕化的危險。必須“制定完全實際可行的措施來消除專家和負責人員同勞動群眾之間的不平等(在生活條件、工資條件等方面),因為這種不平等破壞民主制度,並且是使黨腐化和使共產黨人威信下降的一個根源”。鑒於不平等的情況近年來異常迅速的發展,我們必須重新提出這個問題並且要像革命者那樣來解決它。

(六)必須沿着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的路線,重新組織黨的教育工作,禁止仿造的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贗品的傳播,這種贗品目前正在大規模製造。

(七)必須立刻恢復被開除的反對派黨員的黨籍。

(八)必須真正按照列寧指出的精神重建中央監察委員會。中央監察委員會的成員必須是,

- (1)和群众紧密联系。
- (2)独立于党机构之外。
- (3)在党内有威信。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恢复人们对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信任,才能把它的威信提到必要的高度。

(九)在选择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及两者所属机关的全体人员时,必须遵循列宁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及一九二三年一月四日信(遗嘱)中所提出的忠告。这些信件应该印发给全体党员参考。列宁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信中写道:“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人,主要应当是这样的工人,他们低于最近五年内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人,他们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剥削者的农民。……在我看来,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人,主要的不应该从作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工人中选择来的,因为这种工人已有一定的传统和一定的成见。这种传统和成见正是应该反对的。”^①

列宁在写这些信的时期,他在革命根本问题上向党提出了最后的和最为深思熟虑的忠告^②。

我们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应该严格按照上述列宁忠告的观点,选择它的中央委员会成员。

第八章 共产主义青年团

在共产主义青年团里,错误的政治路线和组织压制是以全力并且常常是以更大的力量在推行着。对青年工人的国际主义教育越来越不被重视。一切批评的思想正受到压制和迫害。党机构要求于共青团领导的,首先是“服从”,和愿意整反对派。在这种制度之下,下层组织的无产阶级部分,这个基本健康的部分被剥夺了一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中文版第620页。——中译者注

^② 《宁肯少些,但要好些》、《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论合作制》。

切特性。在这里甚至更甚于党内，上层所执行的錯誤政策正为小资产阶级影响打开道路。

近年来共青团的团员迅速增加了，但这种增加却是以其社会成分的恶化为代价的。从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以来，这个组织的无产阶级核心从百分之四十点一降低到百分之三十四点四，青年产业工人的数目从百分之四十九点八降低到百分之四十七。青年工人的政治活动也减少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采取最近一系列的決定是极其錯誤的，这样做只会扩大共青团和工人阶级青年群众的距离，因为这些決定違反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決議，进一步降低青年工人的条件（删改保护学徒工的条例，削減学徒工的特殊工資标准，限制工业学校的学徒工人数——以及企图实行学徒期間不付工資的办法，也属于这一类）。

农村中的共青团越来越失去无产阶级和貧农对它的支持。它在农村中的文化經濟工作是沿着发展个体經營的路綫推进的。貧农的相对比重在各方面都一貫下降——在农村基层組織的一般組成成分里，在积极分子中間，在党员核心組織里。随着城市青年工人参加者日益减少，团內充滿了中农和富农青年。

像在城市中一样，在农村中也是如此，小资产阶级分子掌握团领导的趋势在发展。职员和“其他种种”集团日益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农村組織中的情况尤其如此。

我們百分之三十六的新党员是来自共青团队伍^①。但是，在团內的党员核心里，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是非无产阶级成分。在农村組織的党员核心里，中农迅速增加，雇农和貧农則在减少。（一九二五年，中农为百分之二十，一九二七年，为百分之三十二点五。）这样，共青团就变成小资产阶级成分削弱党的一个发源地。为了防止来自知識分子、职员和农村富裕阶层的新成分进一步削弱无

① 《真理报》，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四日。

产阶级核心的优势地位和把它贬低到无足轻重的地位上，从而必然引起团蜕化为小资产阶级的组织，就必须采取下述措施：

(一)立即阻止在青年无产阶级的劳动和教育方面革命成果逐渐被取消的情形——废除最近那些降低他们工作条件的措施。这是反对共青团中不健康倾向（酗酒，流氓行为等）的主要前提之一。

(二)按照工人阶级一般福利的发展比例，以提高工资，扩大工业学校和训练班网等办法，系统地 and 坚决地提高青年工人的物质和文化水平。

(三)执行上次党和共青团代表大会的决议——在最近数年期间，百分之百地从城市青年工人和农村无产阶级中吸收团员。

(四)加强吸收贫农青年入团的工作。

(五)吸收下中农入团，在其余的中农中间，只吸收那些在社会工作中，特别是在反富农斗争工作中受过考验的青年。

(六)加强团对贫农利益的保护，指导团的工作向着创造农村新社会的方向发展，但不是沿着个人致富的道路，而是沿着农业合作化和农业集体化的道路。

(七)改善党核心的社会成分，在今后两年内，只从工人、雇农和贫农中间吸收新党员。

(八)使共青团各机关的领导人员无产阶级化，系统地 and 坚决地把雇农和贫农提拔到领导职位上。作出规定，在无产阶级集中的主要地区，团的省委员会和区委员会，以及这些委员会的常委会，应该由车间工人在其中占压倒多数，并且应该吸收后者真正参加领导工作。

(九)在团内进行一次认真的反官僚主义斗争。坚决减少领取薪金的干部，使之减少到绝对必需的最低限度。团的工作至少有一半，在工业中心则有四分之三，应该通过团员义务活动来完成，应该把团这个联合组织的各组成部分的普通团员越来越多地吸引到中央机构的工作中来。

(十)团的文化和教育工作应该同参加党,苏维埃,工会和合作社的一般政治生活的日常活动紧密联系起来。

(十一)结束机械同意的制度,从上而下命令行事的僵化制度,反对说谎和愚昧的制度,这就是以整反对派为目的的照本宣读和“指示命令”。而代之以在独立判断,同志式地交换意见,和真正地而不是模仿地求得知识的基础上,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

(十二)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实行民主制度。对那些在党和团的问题上持有独立见解的人停止压迫和迫害。严格遵照团章上规定的日期召开区、县、省等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

第九章 我們的国际环境和战争危险

苏联在世界舞台上的处境

一場帝国主义者反对苏联的战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推迟这个危险,争取尽可能多的时间来加强苏联并团结国际上革命的无产阶级,这应该是我們主要的实际的任务之一。只有主要国家内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才能最后消除这个危险。

由于下述的原因,世界战争的危险正在增长:

(一)近年来资本主义方面为加强自己而进行的斗争,及其在这个斗争中所取得的部分胜利,使得市场问题对于各主要国家来说已经成为一个紧急问题。

(二)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已经相信苏联经济力量的明显增长,他们也看到在对外贸易垄断制保护下的无产阶级专政绝不会在俄国为资本家提供“自由”市场。

(三)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正在猜测苏联的国内困难。

(四)英国总罢工和中国革命的相继失败,使帝国主义充满了希望,他们以为可以成功地打垮苏联。

英苏断絕外交关系很久以前就在蘊酿之中，而由中国革命的失敗加速了它。在这个意义上，这件事是中央委员会拒絕在中国問題上采取真正布尔什維克政策的一个报应。如果认为这件事只不过是英苏間貿易形式有所改变，那就大錯特錯了。（“我們仍将进行貿易，像我們和美国之間进行貿易那样”。）現在非常清楚，英帝国是有一个更大的活动計劃的。它正在准备反苏战争，正从其他一些国家的資產階級那里取得“道义上的委托”，并且正企图用这种或那种办法，把波兰、羅馬尼亚及波罗地海国家或者还有南斯拉夫、意大利和匈牙利，都拉进反对我們的战争里来。

看来波兰希望在反苏战争上有一个較长时期的准备。但是英国强迫它提前作战，也不是不可能的。

在法国，英国要求組成反苏統一战綫的压力正得到資產階級中有影响人物的支持。这些人在他們的要求上变得越来越不可調和，当适当时机到来时，他們对于断絕外交关系是不会犹疑的。

最近德国的外交活动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它总的“方向”是向着西方的。德国資產階級已經公开声言，如果发生反苏战争，开始时德国或許会保持“中立”（像美国在一九一四年那样）。这是为了尽可能从战争中撈一把，而且以后可以以高价向西方帝国主义公开出售它的中立。最有損苏联根本利益的，莫过于对它本身隱瞞德国資產階級轉向西方“方向”的情况。来自德国資產階級的意外打击对我們将会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只有完全公开的“按照实际情况說明事态”，只有喚起苏联工人和德国工人的警惕，才能使我們免于这个打击，或者至少使德国資產階級难于发动打击。

在对苏联的关系上，日本資產階級运用策略的狡猾是不下于德国人的。它很聪明地掩盖起它的企图，而假装“友好”。有一个时期，它甚至阻止張作霖攫取中东路。但是它暗中控制着中国，并且可能很快丢掉对我們的假面具。

在近东（土耳其和波斯），最起码說，我們也沒有达到这样一种情势：在帝国主义进攻我們的情况下，那里能保证坚决的中立。在

上述的情况下，这些国家的政府将会在压力下按照帝国主义的命令反对苏联，这或许是较为聪明的假设。

在帝国主义进攻我们的情况下，美国将起帝国主义“后方”的作用，它迄今对苏联始终保持着不可调和的态度。因为美国正是唯一能在财政上保证反苏战争的国家，这种作用的意义就更大了。

总起来说：假使一九二三——一九二五是一系列资产阶级国家承认苏联的年代，那么从现在开始时期将是断绝关系的时期。以前的承认时期并不一定意味着和平有了保证，喘息时机可以持久。现在的断绝关系时期并不一定意味着战争在最近的将来不可避免。但是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国际形势极为紧张的新时期，包含着进攻苏联的可能性，这是很明显的。

资本主义世界的内部矛盾是极大的。世界资产阶级要组成反对我国的长期统一战线是极端困难的。但是几个资产阶级国家在一定时期组成部分的反苏联盟，是完全可能的。

把所有这些情况综合在一起，就迫使我们的党：

(一)必须承认国际形势是危险的。(二)必须在广大人民群众面前，把国际政治问题重新提到重要地位上来。(三)必须极其紧张地全面地进行苏联的国防准备，以防一旦发生战争。

包括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各资产阶级政党，将用各种方法竭力在帝国主义所准备的反苏战争的真正性质上欺骗它们的人民。我们的任务是立刻向全世界广大人民群众说明，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和劳动剥削者反对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战争——一场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战争。在这场战争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本质上是为保持整个资本主义的雇佣奴役制度而战。苏联则是为国际无产阶级、殖民地半殖民地和被奴役国家的利益、为世界革命和社会主义而战。

我们的整个工作应该早已在这些口号下进行：(一)打倒帝国主义反对工人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战争。(二)在所有进攻苏联的国家里，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内战。(三)使一切对苏联进行战争

的資產階級國家陷於失敗。資本主義國家內一切正直的無產階級應該為“本國”政府的失敗而積極努力。(四)一切不願幫助“本國”勞動剝削者的外國士兵，投向紅軍這邊來。蘇聯是所有工人的祖國。(五)除了正在進行反帝民族革命戰爭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以外，“保衛祖國”的口號只不過是一切資產階級國家的帝國主義利益的偽裝。在蘇聯，“保衛祖國”是真實的口號，因為我們所保衛的是社會主義祖國和世界工人運動的基地。(六)自從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以來，我們就是“祖國的保衛者”。我們的“愛國”戰爭是“為了作為社會主義世界大軍的一個團隊的蘇維埃共和國”而進行的戰爭。“我們的‘愛國’戰爭不是走向資產階級國家的一步，而是走向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的一步”(列寧)。我們保衛祖國即是保衛無產階級專政。我們的戰爭是由工人和雇農，在貧農的支持之下，並和中農聯盟反對“他們的”富農、新資產階級、官僚、烏斯特里雅洛夫派的專家以及白俄之下進行的。我們的戰爭是真正的正義戰爭。誰不是蘇聯的保衛者，誰就是國際無產階級的徹頭徹尾的叛徒。

中國革命的失敗及其原因

中國革命的失敗使力量的實際對比發生有利於帝國主義的改變，當然，只是暫時的。新的革命沖突，一場新的革命，在中國是不可避免的。整個形勢保證了這一點。

機會主義領袖正努力用所謂“客觀力量對比”來解釋他們自己的失敗。他們忘記了，就在昨天，他們還在這同一個力量對比的基礎上斷言，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很快就要到來。

目前階段中國革命的不幸結果的決定性原因，在於俄國共產黨和整個國際領導集團的根本錯誤的政策。這個政策的實際結果是：在決定性時期到來時，中國實際上並沒有真正的布爾什維克黨。現在把責任完全推在中國共產黨人身上，是不切實的和卑鄙的。

我們在中国进行了一次运用孟什維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策略的标准試驗。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无产阶级不仅沒有取得它的胜利的“一九〇五”(列宁),而且目前正扮演着欧洲无产阶级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当前国际形势下的中国革命的特点并不是在中国有所謂“革命的”自由資產階級——斯大林—馬尔丁諾夫—布哈林把他們全部政策的希望放在这上面。中国革命的特点如下:

(一)比沙皇統治下的俄国人更受压迫的中国农民,他們不仅处在中国压迫者的枷鎖下,而且处在外国压迫者的枷鎖下,他們能够起来,并且已經起来了,較之一九〇五年革命中的俄国农民更加有力量。

(二)列宁早在一九二〇年为中国提出的“苏維埃”口号,在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七年的条件下仍然是絕對正确的。在中国,苏維埃本来能够提供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团结农民力量的形式。它們本来应该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真正机关。对資產階級国民党來說,对他們产生的卡維涅克^①來說,这是真正得到群众支持的机关。

列宁的理論說,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只可能由工农联盟(在前者的领导下)反对資產階級来完成,这不仅适用于中国,适用于相类似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而且实际上也指出了在这些国家取得胜利的唯一道路。

(三)从此可以得出結論,在目前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由于苏联的存在而有所不同,如果工农革命民主专政以苏維埃的形式在中国实现,那么就有一切可能比較迅速地轉入社会主义革命。

离开这个政策,就只有联合自由資產階級的孟什維克道路了,它必不可免地引向工人階級的失敗。这就是一九二七年在中國实

^① 卡維涅克(一八〇二——一八五七),法国將軍,陸軍总长,一八四八年六月用殘暴手段鎮压巴黎工人起义。——中譯者注

际发生的情况。

所有当列宁在世时由共产国际第二次和第四次代表大会所作的决定——关于东方的苏维埃，关于在民族革命运动的国家中工人的共产党保持完全独立，关于工人阶级和农民联盟反对“他们的”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决定——所有这些决定完全被遗忘了。

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全会的决议（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不仅没有对已经气势汹涌地发展着的中国形势提出真正列宁主义的估计，而且完全地和绝对地走上马尔丁诺夫所主张的孟什维克路线。虽然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在这个决议里的确没有一个字提到蒋介石一九二六年三月的第一次反革命政变。没有一个字提到一九二六年春天和秋天广州政府在许多省份枪杀工人和农民，及其所采取的其他一些镇压措施。没有一个字提到对工人阶级的强迫仲裁措施。没有一个字提到广州政府镇压工人阶级罢工，广州政府保护黄色“御用工会”。没有一个字提到广州政府力图绞杀农民运动，诬蔑农民运动，阻止农民运动的传播和发展。在第七次全会的决议里，没有要求把工人武装起来，没有号召和反革命大本营进行斗争。蒋介石的军队在这个决议里被描写成革命的军队。没有提出创办共产党日报的要求，甚至没有清晰地和大声地宣称，我们必须有一个真正的和独立的中国共产党。最后，七次全会还要求共产党人参加国民政府，这种步骤在目前情况下只会造成极其严重的灾难。

共产国际的决议说道：“国民革命政府（即：蒋介石的政府）机构提供了一条同农民团结的真正的道路。”它在同一个地方说道（这是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甚至大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1）也能在一定时期内和革命并肩前进。”

第七次全会的决议默不作声地放过了下述的事实：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以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承担了不批评孙逸仙主义的义务，放弃了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基本权利，采取了保

守的自由主义的土地綱領，最后，允許它的中央委员会書記陈独秀同志在一封一九二六年七月四日的公开信里，承认孙逸仙主义是工人和資產階級在民族运动中的“共同信仰”。

差不多在这同时，最負責的俄国同志提出了这样的意見：在农村中发展內战会削弱国民党的战斗力。換句話說，他們正式禁止农民革命的发展。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当情况看来已經够明显的时候，斯大林同志在圓柱大厅里莫斯科党組織會議上宣称，蔣介石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战士，蔣介石服从国民党的紀律，因此是我們的可靠盟友。一九二七年五月中，当情况进一步明显的时候，斯大林同志宣称，武汉的国民党是“革命的国民党”，是“清洗了右派分子的革命中心。”

共产国际第八次扩大全会（一九二七年五月）不可能从它本身找到力量去改正这些孟什維克的錯誤。

反对派向第八次全会提出了下述的声明：

“如果完全撤銷布哈林的決議而代之以由下述簡單的几句话所构成的決議的話，全会就能够正确地进行：农民和工人不要信任左派国民党領袖，而必須同士兵联盟建立自己的苏維埃。苏維埃應該武装工人和农民中的先进分子。共产党必須保有完全的独立性，必須創辦一家日报，必須領導苏維埃的建立。必須立刻沒收地主土地。必須立刻推翻反动官僚机构。卖国將軍和一般反革命分子必須就地处决。总路綫應該是通过工农代表苏維埃建立民主专政。”

反对派要想警告党，武汉国民党絕不是革命的国民党，这个意图被斯大林和布哈林斥責为“反党斗争”，“攻击中国革命”，等等。

有关中国革命和反革命实际情况的电报被隱瞞和伪造。我們党的中央机关报^①甚至在“士兵和工人联欢”的标题下，发布中国將軍解除工人武装的事件的报道。斯大林断言，在中国建立“苏維

^① 《真理报》，一九二七年七月三日。

埃”的口号意味着要求立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对列宁教导的歪曲。事实上，列宁早在一九〇五年时，即提出苏维埃作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机关这一口号。反对派在恰当时机所提出的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口号，却被斯大林和布哈林加以“支持和鼓舞反革命”等等的指责。当起义工人和起义农民的家庭被“我们的”将军们，“革命”将军们所屠杀的时候，斯大林和布哈林为了掩盖他们自己的破产，出人意外地提出了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口号——但是第二天就又把它的忘了。

最初，中国共产党被说成是“共产国际的模范支部”，反对派对它提出哪怕是最轻微的批评——这时它的错误还来得及改正——也被拒绝并斥为对中国党的“恶意攻击”。以后，当马尔丁诺夫—斯大林—布哈林的惨败已经非常明显的时候，他们企图把过错完全推给年青的中国共产党。

最初他们把一切都押在蒋介石身上，以后是唐生智，以后是冯玉祥，以后是“经过考验的和真诚的”汪精卫。一个接着一个，所有这些工人和农民的屠夫都被称为“反帝战士”和“我们的”盟友。

这种孟什维克政策现在正在用公然阉割列宁的革命教导的方法加以完成。斯大林—布哈林和“青年学派”现在正忙于证明，列宁关于民族革命的学说实际上就是“同资产阶级联盟”这样一个教义。

一九二〇年，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道：“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有相当亲密的关系，所以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往往甚至可以說在大多数的场合下，都是一方面支持民族运动，一方面又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一起来反对一切革命运动和革命阶级。”①

列宁如果今天还活着的话，他会用同样的话斥责那些竟敢引用他的话来证明他们同蒋介石和汪精卫联盟的孟什维克政策的正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中文版第 211 页。——中译者注

确性的人。列宁本人在一九一七年三月正好讲过这个问题：

“‘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工人应该赞助资产阶级’，来自剥削者阵营的废物政客这样说道。‘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说道，‘因此工人应该使人民看清资产阶级政客的骗局，教导人民不要相信这些政客的空话，只能依靠本身的力量，本身的组织，本身的团结，本身的武装’。”^①

在国际无产阶级面前，没有比企图把列宁描绘成“同资产阶级联盟”的倡导者这件事更大的罪恶了。在革命历史上，马克思主义的判断如此迅速如此准确地得到证实，像反对派关于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所作的判断那样，是罕见先例的。

研究中国革命的事件进程及其失败的原因，是全世界共产党人的紧急任务。

这些问题明天就会成为工人阶级运动——不仅是中国的工人运动，而且是印度和其他东方国家的工人运动——的生死问题，因此，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生死问题。

未来革命中的真正布尔什维克大军将在这些涉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基础的问题的辩论过程中出现。

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和共产国际的策略

由世界大战和我国革命所开始的时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这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一个根本内容。共产国际是作为一个“世界革命的党”而建立起来的。“二十一个条件”^②中包含着对这个事实的承认。并且，正是沿着这条路线，共产党人同各种各样社会民主主义的“独立的”孟什维克分裂了。

承认战争和十月革命开始了世界革命的时期这一事实，当然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中文版第314页。——中译者注

② 这里的“二十一个条件”，系指一九二〇年八月六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批准的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决议。决议提纲是列宁起草的。——中译者注

并不意味着每时每刻我們身边都有立即爆发革命的形势。在一定时期中，在个别的国家里，在个别的生产部門里，“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是能够局部重建其經濟甚至进一步发展其生产力的。世界革命的时代将有它的高潮和低潮时期。工人阶级及共政党的准备，反动的社会民主党的影响程度，共产国际的正确领导，也就更加重要了。但是，革命的这种漲潮和退潮并没有改变列宁关于当前历史时代的全面根本估计。只有这个估计才能成为共产国际革命战略的基础。

但是，由于世界革命运动一系列的失败和从而产生的悲观情绪，斯大林集团甚至自己也没注意到，它对于目前时代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和本质上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估计。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全部“理论”主要地是产生于这样的假设：资本主义的“稳定”将要持续几十年。这整个“理论”本质上是“稳定论”信徒的蜕化思想的产物。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受到社会革命党、无论其右翼或左翼的欢迎，这不是偶然的。切尔诺夫本人已经著文论述关于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共产主义的民粹主义”问题。左翼社会革命党机关报写道：“斯大林和布哈林正像民粹主义者那样，肯定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胜利。”^① 社会革命党支持这个理论，因为他们从这里看到世界革命的策略已被放棄。

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斯大林报告的决议中，提出了明显错误的下述声明：“在国际关系方面，我们取得了‘喘息时机’的加强和延长，它已经变成一整个时期。”^② 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全会（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七日）上，斯大林在他的报告里，把共产国际的全部政策放在同一个根本错误的对世界形势的估计的基础上^③。这种估计已经证明显然是不正确的。

① Znamia Borbi (《斗争的旗帜》)，一九二六年第十七号、十八号。

②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记录，第 957 页。〔参看《斯大林全集》第七卷，中文版第 238 页。——中译者注〕

③ 速记记录，第 12 页。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一九二七年七月,八月)的決議毫无保留地說到資本主义技术、經濟和政治的穩定。这就使得这种斯大林派对世界形势的估計非常接近第二国际領袖們(奧托·鮑威尔,希法亭,考茨基等人)所作的估計。

自从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来,已有一年半多了。在这个时期內,我們仅仅提到最重要的事件,就有这样一些:英国总罢工,中国革命的巨大事件,維也納工人起义。这些事件及其爆炸力就是隱藏在現在的“穩定”情况里的,它們向我們表明,資本主义积累了多少爆裂性物质,它的“穩定”是多么的不穩定。这些事件正好和一国建設社会主义的“理論”背道而馳。

資本主义“穩定”的另一方面是,两千万的失业人口,生产机构严重的开工不足,軍备的瘋狂增长,世界經濟关系的极度动搖。目前正籠罩着欧洲的新战争危險比任何东西都要肯定得多地表明,长期和平的希望之不可靠。只有小資产階級才梦想“几十年”的穩定,因为它被資本主义对工人的胜利弄得眼花目眩,它被資本主义技术、經濟和政治的成就弄得眼花目眩。但是真实的情况正向着战争发展,战争将要炸掉任何的“穩定”。此外,工人階級和东方被压迫的殖民地群众将不断地企图用暴力推翻这种“穩定”。有时在英国,有时在中国,有时在維也納。在英国是一次总罢工——而英国共产党只有五千黨員。在維也納是一場工人起义,牺牲的人等于一次全面革命——而奧地利共产党只有六千黨員!在中国是一場工农群众武装起义——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过是国民党的資产階級官僚机构的一个附屬品!这就是目前世界形势的显著矛盾。这些就是支持和延长資本主义“穩定”的真实情况。我們的最大問題是帮助各国共产党,提高它們自己,以便能滿足目前时代向他們提出的巨大要求。但这首先是假定說,在共产国际本身方面,对世界形势的性质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我們的国际共产党(共产国际)應該向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联合全世界工人階級,为防止战争,为保卫苏联,为把帝国主义战

爭變成以社会主义为目的的战争而斗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工人共产党人首先应该把具有革命思想的工人争取过来，这些工人中间有非共产主义者，非党的人，社会民主主义者，工团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工会工作者，也要争取那些正直的工人，即使他们还是纯粹资产阶级组织的一员。“工人统一战线必须被理解为一切愿意为反对资本主义而斗争的工人的联合，其中包括仍跟着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等等走的工人。在拉丁国家里，这样的工人的数目仍然是很大的。”这是在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在今天它仍然充分有效和可以适用。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的领袖们目前的活动，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他们在未来战争中的行为，就其不忠实和无耻叛卖来说，将远远超过他们在一九一四年——一九一八年所扮演的角色。保罗·崩库尔（法国）已经提出了一项法律，这项法律通过资产阶级在战时实行专政的方法事先就出卖了工人。工会总委员会（英国）正在为杀害沃伊科夫的凶手进行辩护，并且为运到中国去的军队祝福。考茨基（德国）正在鼓吹反对俄国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暴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正在组织“手榴弹运动”。芬兰和拉脱维亚的社会民主党的部长们和波兰社会党的领袖们随时准备支持一场反苏战争。美国官方工会组织的领袖们使用最恶意的反动派的语言，公开反对承认苏联。巴尔干的“社会主义者”正在支持“他们的”工人的刽子手，并且随时准备支持任何反对“外国”苏维埃联盟的运动。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们口头上“拥护苏联”，但是他们曾经帮助他们自己的法西斯分子，使维也纳起义的工人血流成河，显然，这些人在决定的时刻是要站到资本家那边去的。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现在没有鼓吹干涉苏联，只不过因为还没有任何强国准备这样做。所谓“左派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继续隐藏他们观点中的反革命本质，这些人是主要的危险，因为正是他们，使那些追随社会民主党旗帜的工人不能同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断然决裂。共产国际以前的成员（如：卡茨，施瓦尔茨，柯尔

什, 卢森堡), 他們背离了共产主义而采取了极左主义的道路以后, 扮演着同样的叛徒角色。

战争越临近, 和这些社会民主党领袖們(他們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 不論他們是哪種顏色, 从公开的右派到伪装的“左派”)勾搭就越来越危險。統一战綫的策略无论如何不能解釋为和工会总委员会的叛徒們結盟, 或者解釋为和阿姆斯特丹亲善。这样一种政策使工人阶级削弱和混乱, 而提高准叛徒們的威信, 妨害我們最大限度地巩固自己的力量。这条錯誤路綫用斯大林的話概括起来就是: “向左开火,” 这条錯誤路綫在过去一、二年間已經把共产国际各最重要支部的領導地位送入右派手里, 这是違背工人共产党人的意志的。(这种情形在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法国、意大利和英国都已經发生。)

这些居于領導地位的右派集团的政策是要砍掉共产国际中全部的左派, 是在削弱共产国际的力量并且酝酿着不祥的危險。

特别是德国的开除烏尔邦斯集团^①, 就是由这种排斥共产国际中全部左派的政策所决定的。斯大林集团不适当地強調烏尔邦斯和馬斯洛夫^②左派党人所使用的某些尖銳的辯論詞句(这些詞句是回答那些誣陷他們是“叛徒”, “反革命分子”, “張伯倫的代理人”等等的人的), 这样就頑固地把德国左派推上了成立第二党的道路。斯大林集团尽力促使德国共产党队伍的分裂成为完全的事实。

实际上, 在国际工人运动的一切根本問題上, 烏尔邦斯集团是捍卫列宁观点的。它捍卫苏联, 并且在决定的时刻, 它无疑将为保卫苏联而战斗到底。这个集团里包括着几十万老布尔什維克普通工人, 同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有着联系。这个集团得到仍然留在德国共产党內的成千上万的工人阶级共产党人的同情。

糾正斯大林分裂共产国际的行動的第一步, 是把所有这些被

①② 关于烏尔邦斯和馬斯洛夫, 請參閱《斯大林全集》第十卷, 中文版第 142 頁。

——中譯者注

开除的同志——首先是烏尔邦斯集团——重新吸收到国际中来，这些同志是承认共产国际历届代表大会的权威的。列宁在他的《左派幼稚病》中，揭发了真正“极左派”的錯誤，同时写道，工人运动中布尔什維主义的主要敌人过去和現在都是机会主义。“現在它在国际範圍內也仍然是主要敌人。”^①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对于上述的問題，列宁又补充道：“和這個問題相較，糾正共产主义左傾‘錯誤’是一个容易的問題。”^②当列宁說“左派”这个詞的时候，他心里所想的是极左派；可是斯大林，当他說和极左主义斗争的时候，他心里所想的是革命的列宁主义者。

和作为主要敌人的右傾机会主义运动坚决斗争，同时改正“左”傾錯誤——这是列宁的口号。我們——反对派，提出这同一个口号。

归根結蒂，“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势力就是資本主义势力。在战后危机的最初几年里（一九一八年——一九二一年），資本主义迅速地掉进深淵，这时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也随之在削弱并掉下去。近几年来資本主义的局部稳定带来了社会民主主义暫时的加强。意大利工人一九二〇年——一九二一年的失敗，德国无产阶级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三年的失敗，英国一九二六年大罢工的失敗，和中国无产阶级一九二七年的失敗，不管原因是什么，它們本身已經引起了无产阶级上层分子中間的革命浪潮的低落。它們在一定时期內加强了社会民主主义，而削弱了共产党。在共产党內，它們使右派暫时居于統治地位，而排斥了左派。工人貴族的作用、工运官僚及其小資产階級同事的作用，在这样一个时期变得特別大了，也特別反动了。

这些过程必不可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苏联共产党。行政“中央”已經集中向左开“火”，并且已經用完全机械的方法造成了一种新的內部力量对比，这对于左派列宁主义者是更加不利的。事实

① 《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中文版第13頁。——中譯者注

② 參看《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中文版第203頁。——中譯者注

上已經造成这样一种形势，在这种形势下沒有党的选举，只有机器的选举。

这些就是在共产国际、俄国共产党和苏維埃国家的政策上，列宁派影响削弱的总原因。結果那些在十月革命后很长时间内仍然呆在敌人队伍里，但是最后好像經過一段預备期似的被吸收到共产国际中来的半社会民主主义分子（馬尔丁諾夫，施米拉里，腊非也斯，D. 彼得罗夫斯基，佩帕尔等人），越来越經常和越来越高声地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发言。在这些人里还必须加进像海因茲·諾伊曼及其同类这样一些純粹冒險家的名字。但是在群众里面，新的左傾运动的分子，新的革命起义的分子已經在聚集之中。反对派正在理論上和政治上为那个新日子从事准备。

主要的結論

（一）在我們和英国断絕关系以及其他内外困难的影响下，在多数派的統治圈子里正准备着下述的“計劃”：（1）承认債務。（2）或多或少地取消对外貿易的壟断制。（3）从中国撤退——这就是，“暂时”撤銷我們对中国革命，一般地說即是对民族革命运动的支持。（4）在国内实行向右的“策略”——这就是，把新經濟政策扩大一些。希望用这个代价来防止战争危險，改善苏联的国际形势，消除（至少减少）国内困难。这全部“計劃”是以資本主义有几十年的稳定这一假設为基础的。

实际上这不是“策略”，而是苏維埃国家这方面在目前形势下的全面投降：通过“政治上的新經濟政策”，通过“新新經濟政策”，回到資本主义去。帝国主义者会接受我們的一切让步，然后更加迅速地进行新的攻击甚至战争。富农，新資產階級和官僚分子意識到我們的让步之后，他們会更加頑固地組織起所有反苏維埃力量来反对我們党。我們方面的这样一种“策略”将造成我們的新“資產階級”同外国資產階級之間最紧密的同盟。苏联的經濟发展將落在国际資本的完全控制之下——一辨士的貸款等于一卢布的

奴役。工人階級和农民基本群众将对苏維埃国家的强大，对苏維埃国家知道領導人民走向哪里的能力开始失去信仰。

如果可能“用贖买办法使我們自己”免于战争，我們当然要尽力这样做。但是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我們必須强大和团结，必須毫不动摇地維護世界革命的策略，必須加强共产国际。只有这样，我們才真有可能使战争确实长期推迟，而不必付出会損毀我們力量基础的代价；同时，只有这样，我們才能在战争不可避免的情况下，真有可能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持并且贏得战争。

列宁曾經向帝国主义做出某些經濟上的让步，目的在于用贖买办法使自己免于战争，或者用可接受的条件吸引国际資本。但是不論是在这些情况下，或者是在革命的最严重时刻，列宁从来没有想到过取消对外貿易的壟断制，給富农以政治权利，削弱我們对世界革命的支持，削弱世界革命的一般策略。

首先我們必須完全地和毫无保留地肯定和加强我們对世界革命的支持。对一切“稳定”思想，对一切假政治家風度（它表現在这样一些說法里：我們不必去管“中国的閑事”，我們最好“尽可能迅速地从中国脫身”，如果我們举措“合宜”，他們会“放开我們的”等等），我們必須表示坚决的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論”現在实际發揮着瓦解作用，并且明显地妨害国际无产阶级力量团结到苏联周圍来。这种理論正在欺騙其他国家的工人，模糊他們对实际危险的認識。

(二)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任务是团结我們自己党的队伍，使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領袖們不能再在分裂、割除、“砍掉”等上面公然进行投机。所有这一切都最直接地和战争問題联系着，目前帝国主义正沿着这条道义—政治路綫进行“試探”。国际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一切机关报，現在都对我們的党内分歧表示极不寻常的兴趣。它們公开鼓励和慫恿中央委员会现在的多数派，把反对派开除出党的領導机关，如果可能的話，則开除出党；最后如果可能的話，則根本消灭他們。从最大的资产阶级报纸《紐

約时报》，到掙扎得最成功的第二国际报纸維也納《工人报》（奧托·鮑威尔），所有資產階級和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都在向“斯大林政府”致敬，为了它和反对派斗争。它們要求这个政府砍掉反对派——这些“世界革命宣傳家”，以此来进一步证明它的“政治家式的明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只要敌人在“砍掉”反对派等方面的希望仍然沒有实现，战争也就不会来临。此外，如果可能，我們可以用贖买办法使我們自己免于战争，如果必須战斗，我們可以在战争中取胜——不过，唯一的前提是，我們必須保持团结，我們必須使帝国主义对分裂或割除的指望落空。因为这种事情只对資本家有好处。

（三）必須糾正我們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階級路綫，停止对共产国际中的左派的斗争，让那些接受历届代表大会決議而被开除了的成員回到共产国际中来，永远結束同英国工联总委员会的叛徒領袖之間的“誠懇合作”的政策。在目前情况下，和总委员会决裂，其意义等于一九一四年和第二国际的社会党国际局决裂。列宁在一份最后通牒里要求每一个革命者进行这种决裂。在今天和这样一个总委员会保持联盟，就等于在那时帮助第二国际的反革命領袖。

（四）我們必須坚决糾正我們在民族革命运动中——首先在中国，同时也在其他一系列的国家里——的路綫。我們必須清算馬尔丁諾夫—斯大林—布哈林的政策，回到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和第四次代表大会決議中制定的路綫上来。否則，我們在民族革命运动上，不仅不能起加速的作用，反而会起障碍的作用，从而失掉东方工人和农民的拥护。中国共产党必須完全取消在組織上和政治上对国民党的依賴。共产国际必須把国民党开除出去。

（五）我們必須始終如一，有步驟和頑強地进行爭取和平的斗争。我們必須推迟战争，“用贖买办法使我們自己免于战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切可能和可允許的事都必須去做（參閱第一点）。同时我們必須立刻做好战争准备，不能有片刻懈怠。我們目前的

当务之急是，制止一切关于是否存在战争迫近的危险这种涣散精神的知識分子式的政治閑談和猜測。

(六)我們必須坚决地糾正我們在國內的階級路綫。假使战争不可避免，只有严格的布尔什維克政策才能贏得战争，这就是：**工人和雇农，取得貧农支持，同中农联盟，反对富农、新資產階級、官僚。**

(七)在我們整个經濟、預算等方面，进行应付战争事变的全面准备。

資本主义正进入一个新的混乱时期。一場对苏联的战争就像一場对中国的战争一样，它对世界資本主义意味着一系列的灾难。一九一四年——一九一八年的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巨大“加速器”（列宁）。新的战争，特別是一場反对苏联的战争，只要我們这方面在战争中有一項正确的政策，我們就会贏得全世界劳动群众的同情，这场战争就将成为更加巨大的促使世界資本主义崩潰的“加速器”。**沒有新的战争社会主义也将发展。但新的战争必将导致社会主义革命。**

第十章 紅軍和紅海軍

国际形势越来越把保卫苏联的問題提到前面来了。党，工人階級和农民應該給紅軍和紅海軍以新的和更大的注意。

所有我們在經濟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情况都和国防問題有关。軍隊是整个社会結構的模型。它以最鮮明的形式不仅反映着現存制度的坚强的一方面，而且反映着它的軟弱的一方面。經驗教导我們，在这个領域里，依据表面現象是最不可靠的了。特別是在这里，与其失之于輕信和安心，不如失之于反复檢驗和自我批評。

我国階級相互关系問題和党在这方面的正确政策，对于軍隊內部团結和指揮人員同士兵集体的相互关系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工业化問題对于我国国防的技术資源有着决定性的意义。目前这个政綱所主張的一切措施——在国际政治和世界工人运动方面，在工业、农业、苏維埃制度、民族問題、党和青年团方面，所有这些問題对于加强紅軍和紅海軍有着头等的重要性。

我們对于这方面的实际建議，已經提交政治局了。

第十一章 关于真正的和伪造的分歧

沒有什么比下述的事情更能确切地表明斯大林集团的錯誤政治路綫了：他們坚持不休地与之爭吵的，并不是我們那些真正的意見，而是一些虛构出来的意見，我們現在和过去都从未有过的意見。

当布尔什維克同孟什維克、社会革命党以及其他小資产階級派別爭論的时候，布尔什維克在工人面前詳細說明他們的对手所提出的一套实际意見。但是当孟什維克或者社会革命党同布尔什維克爭論的时候，他們不是反駁布尔什維克的真正意見，而是把后者从来沒有說过的事情推到他們身上。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不能用任何正直的方式在工人面前詳細說明布尔什維克的观点，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工人就会支持布尔什維克。整个階級斗争的全部規律使这些小資产階級集团在反对布尔什維克的时候，下流到必須罵对方是“阴謀家”，“反革命的同盟者”，以后又是什么“德皇代理人”。現在如出一轍，我們自己党内的小資产階級派別只能把我們从来既沒有想过也沒有說过的事加到我們身上，否則就无法对我們的列宁主义观点进行斗争。斯大林集团非常清楚，如果我们能够用任何自由的方式辯护我們的真正观点，那么我們党的巨大多数党员就会支持我們。

进行党内正直辯論的最基本条件是不存在的。在中国革命这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問題上，中央委员会迄今沒有发表反对派所說的任何一个字。在严密地把党封鎖起来，把反对派同党报隔絕

之后，斯大林集团对我们展开了不停的论战，每天往我们身上加添许许多多的蠢事和罪行，其数量与日俱增。而党员则日益趋向于不相信这些指责。

(一)当我们说，目前资本主义的稳定并不是几十年的稳定，我们的时代仍然是帝国主义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列宁），斯大林集团说我们否认资本主义的一切稳定因素。

(二)当我们按照列宁的话说，为了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革命在一个或几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内的胜利是必要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尤其是在一个落后国家内取得最终胜利，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已经完全论证过的，斯大林集团完全捏造说，我们“不相信”社会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

(三)当我们遵循列宁，指出我们无产阶级国家的官僚主义蜕化现象在发展，斯大林集团说我们认为苏维埃国家一般说来不是无产阶级国家。我们向整个共产国际声明：“无论谁企图直接或间接地支持我们，而同时又否认我们党和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否认苏联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他们将遭到我们无情的反对和唾弃”，斯大林集团隐瞒了我们的声明，继续对我们进行诬蔑^①。

(四)当我们指出，热月党分子正在我国成长，他们有着相当重要的社会基础；我们要求党的领导方面对于这些现象和它们对我们党的某些环节的影响，进行系统的、坚决的和有计划的抵抗，斯大林集团说我们宣称党已特米多尔化，无产阶级革命已经蜕化变质。我们向整个共产国际声明：“说我们指责我们党的多数右倾，这是不真实的；我们仅仅认为，在俄国共产党内有右的倾向和右倾集团，它们有着巨大的影响，但是党能够克服它们”，斯大林集团隐瞒了我们的声明，继续诬蔑我们^②。

(五)我们指出富农的巨大增长；我们遵循列宁，继续断言：“富农不能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它是无产阶级革命最危险的敌人，斯

^① 参阅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声明，第1页。

^② 同上，第十四点。

大林集团攻击我們想要“剝夺农民”。

(六)我們提起党注意私人資本的地位正在加强的事实，注意私人資本积累及其影响在农村的过分增长，斯大林集团指責我們攻击新經濟政策，要求恢复軍事共产主义。

(七)我們指出党在工人物质条件方面的政策不正确，在解决失业問題和住房需要方面的措施不适当；特别是我們指出，非无产阶级分子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額正在猛烈地增大；他們說我們犯了“基尔特社会主义”傾向的严重錯誤，犯了“籠絡人心”的罪。

(八)我們指出工业一貫落后于社会經濟要求，以及这种落后带来的全部必然結果——不平衡，商品不足，城乡联盟的破裂——，他們把我們叫做“超工业化主义者”。

(九)我們指出价格政策的不正确，它不是把高昂的生活費用降低，而是为私人資本家积聚惊人的利潤，斯大林集团指責我們提倡一項提高物价的政策。一年前，我們向整个共产国际宣布：“反对派在言論中从来沒有要求过或建議过提高物价，而是认为我們經濟政策的主要錯誤正是在于它沒有进行足够的努力来解决必然造成零售价格过高的商品不足現象。”但是他們隱瞞了我們的声明，却繼續誣蔑我們。

(十)我們反对同总罢工的叛卖者、公开扮演着張伯倫代理人角色的英国总委员会的反革命分子“誠懇合作”，因此我們被指責为反对共产党人在工会里的工作，反对統一战綫的策略。

(十一)我們反对苏联工会加入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或者和第二国际的領袖們作任何种类的勾搭，于是我們被指責为“社会民主主义傾向”。

(十二)我們反对以中国將軍为基础的那个政策，我們反对把中国工人阶级隶属于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我們反对馬尔丁諾夫的孟什維克策略，因此我們被指責为反对“中国的土地革命”，“和蔣介石同謀”。

(十三)在我們对国际形势所作的估計的基础上，我們得出了

战争正在临近的結論，我們及时向党提出了这个警告，因此斯大林分子对我们发出了卑鄙的攻击，說我們“希望战争”。

(十四)我們忠于列宁的教导，我們指出，战争的临近只是更加迫切地要求我們有一項坚决的、純粹的和明确的階級政策，斯大林分子无耻地断言，說我們不願意保卫苏联，我們是“有条件的保卫者”，半失败主义者等等。

(十五)我們指出这个明显的事实：全世界資本家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报纸都在支持斯大林在俄国共产党内同反对派斗争，贊揚斯大林压制左派，鼓励他砍掉反对派，从中央委员会和党内开除反对派，《真理报》以及所有党的和苏維埃的报刊，每天欺騙說，资产階級和社会民主党“贊成反对派”。

(十六)我們反对共产国际的领导权轉入右派手中，反对开除几十万工人布尔什維克，斯大林集团指責我們企图分裂共产国际。

(十七)在党的目前畸形制度之下，反对派——这些忠誠的党员，企图把他們真正的观点告訴全体党员，因此被逐出俄国共产党。他們被加以“宗派主义”的罪名。关于捏造的分裂党的阴谋，处分的程序已經安排好了。党的最重要的問題沒有进行討論，而是用破布遮掩起来。

(十八)但是，近年来他們最喜欢用的罪名是說我們信仰“托洛茨基主义”。我們曾向整个共产国际声明^①：“說我們維護托洛茨基主义，这是不真实的。托洛茨基曾向共产国际声明，在所有他和列宁爭論过的原則問題上，列宁是正确的——特别是在不断革命和农民問題上。”斯大林集团拒絕发表这个向整个共产国际提出的声明。它繼續用“托洛茨基主义”指責我們。上述声明所提到的当然只是和列宁之間的过去的分歧，絕不是斯大林和布哈林恬不知耻地虛构出来的那些“分歧”。他們硬把我們老早以前的分歧同

^① 參閱上述由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签名的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五日声明。

十月革命过程中发生的那些实际分歧联系起来，这种联系是虚构的。

〔斯大林集团提到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五年两派之间的早期分歧，企图用这个方法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反对派表述在目前政綱里的观点上吸引开，我们认为这种斗争方法是不光明正大的。这些分歧现在已经丧失了它们的意义。由于当时党内和国内一些情况不明，布尔什维克的兩派在一九二三年——一九二四年的爭論中所犯的錯誤和小題大作，现在已经糾正了，并且它們沒有妨碍在反对机会主义保卫列宁主义的斗争中的誠懇合作。〕^①

斯大林和布哈林集团离开列宁的原則越来越远了，他們断章取义，粗暴和不忠地濫用任意摘选的列宁很久以前的那些論战語句，向党隱瞞列宁較近时期的另外一些話，直接伪造党的历史和昨天的事实，更加严重的是，曲解和直接篡改我們关于目前爭論的問題所写的文章，力图用这些方法欺騙党，使党相信目前这个斗争是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斗争。实际上，目前这个斗争是列宁主义和斯大林的机会主义之间的斗争。修正主义者用过完全相同的方法，他們曾經借口反“布朗基主义”而进行反馬克思主义的斗争。我們所以能够在反对斯大林路綫的斗争中全心全意地合作，正因为我們完全是在在保卫真正列宁无产階級路綫的意願和决心下联合起来的。

现在的这个政綱是对“托洛茨基主义”这种指責的最好回答。一切讀完它的人都将知道，这个政綱从第一行起到末一行止，都

① 希望了解托洛茨基思想的讀者不必注意方括弧中的段落。这是应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及其追隨者的請求而插入政綱中的，他們在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五年曾和斯大林合作反对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为了爭取他們支持他的政綱而作出这个及其他一些让步。

当然，事实上这次斗争中的爭端和自从列宁一九二三年离开政治生活以来的那些爭端本质上是同一的。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沒有犯过原則上的錯誤——更不要說任何“小題大作”。——英譯者注

是以列宁的教导为基础的。它浸透着真正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

让党了解我们的真正意见。让党看到有关我们分歧的真正文件——尤其是我们在中国革命这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问题上的分歧。列宁教导我们，如果发生分歧，不要相信任何人的片面之词，而要要求拿出文件来，倾听争论的双方，摒弃谎言，正直地探求争论的关键所在。我们反对派重申列宁的这个忠告。

当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分歧问题是在会前两三天突然降临到党的面前的，我们必须永远消除产生这种情形的可能性。我们必须为公正的争论和在分歧的真正问题上作出公正的决定而创造条件，列宁在世的时候是经常这样做的。

第十二章 反对机会主义——维护党的团结

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在国内外政策的基本方面所犯的严重错误，我们已经坦白地说明了我们的意见。我们已经指明中央委员会这些错误怎样削弱了我们的党，这个革命的根本工具。我们已经指明，虽然如此，但是我们党能够从内部改正它的政策。但是为了改正这个政策，必须清楚地和坦白地说明党领导上所犯错误的性质。

所犯的错误是**机会主义**的错误。根据列宁的经典式定义，机会主义在其发展了的形式中，是由工人阶级领袖和资产阶级组成的集团，它反对工人阶级的多数。在苏联现在的条件下，机会主义在其已臻于完全的形式中，是工人阶级领袖们要同正在发展的新资产阶级（富农和耐普曼）妥协，同世界资本主义妥协，而牺牲工人和贫农广大群众的利益的一种愿望。

因为我们指出这种倾向存在于我们党的某些集团里——在有些场合是刚刚出现，在有些场合已充分发展——，就以此为根据指责我们诬蔑党，这是荒谬的。因为我们正是向党呼吁，要党警惕这种危害党的倾向。硬说我们指责党或者中央委员会的这一部分或

那一部分对革命不忠诚，背叛无产阶级利益，这是同样荒谬的。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可以产生于对工人阶级利益最真诚的关怀。甚至极端的右倾的代表，也相信他们准备同资产阶级达成的妥协是对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必要的，他们相信这种妥协不过是列宁认为完全可以允许的那些策略行动之一。甚至代表公开放弃无产阶级革命倾向的右倾集团，也并非有意识地希望发生热月事件。这种情况对“中间派”来说更是如此，这部分人执行着一种典型的充满幻想、自我安慰和自欺欺人的政策。

斯大林及其最亲密的信徒认为，借助于他们的强大机器，他们可以用斗智的办法战胜全部资产阶级的力量，而不必在斗争中去打败它们。斯大林和斯大林分子无疑完全真诚地相信，他们是在一定的时期内“玩弄”中国将军们，而在为了革命利益利用过他们以后，就会把他们像榨干的柠檬一样抛弃。斯大林和斯大林分子无疑完全真诚地相信，他们“玩弄”柏塞尔之流，而不是柏塞尔之流反过来玩弄他们。斯大林和斯大林分子无疑完全真诚地相信，他们能够“自由地”向“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让步，而以后可以同样自由地收回这些让步。

斯大林分子为了“顺利实行”他们的策略，以一种官僚式的自欺欺人态度，完全不让党——实质上就是如此——参与政治决定，这样来避免它的抵抗。斯大林官僚机构作出决定并且行动起来，而后让党来“批准”它的决定。这种方式如果没有使得一些重要的力量瘫痪，也使得它们削弱了。这些力量本来可以在一个既必要又及时的良好的政治策略行动中使用的，这些力量本来可以减弱和消除那些领袖的显然恶劣的策略所造成的恶劣后果的。这样，中央委员会右派的妥协倾向和它的中派的策略造成了一个累积的结果，这个结果总括起来就意味着：苏联国际地位的削弱，无产阶级在同苏联内部其他阶级的相对关系中地位的削弱，无产阶级物质生活条件的相对恶化，它同贫农的联系的削弱，从而威胁到它同中农的联盟，它在国家机关中的作用的削弱，工业化速度的减慢。

当反对派提出热月事件危險的問題时，他們心中所想的正是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政策的一些**結果**，而不是多数派的**意图**。这种危險就是——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的軌道，而轉入小资产阶级的軌道。我們党的历史和性质同第二国际各党之間的巨大区别是每一个人都清楚的。俄国共产党經過了三次革命烈火的鍛炼。它在同各式各样的敌人的斗争中夺取并且掌握了政权。它組織了第三国际。它的命运就是第一个胜利了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命运。革命决定着它的内部生活的节奏。由于强大的阶级压力而出現在党内的一切思想过程，都有迅速成熟和发展的趋势。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我們必須在党内对每一种背离列宁路綫的傾向，在一出現的时候就进行及时和坚决的斗争。

在目前条件下，俄国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傾向有着深刻的客观根源：（1）国际资产阶级的包围和资本主义的暫时的局部稳定，造成一种相信这是全面“稳定”的傾向。（2）新經濟政策是一条絕對必要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它部分地复兴了资本主义，也复活了許多敌視社会主义的力量。（3）在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里，小资产阶级成分不能不滲入苏維埃和党。（4）党在政治領域中的壟断地位对革命來說是絕對必要的，但这个事实也进一步造成了一系列的特殊危險。在列宁领导下的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曾經直接地和坦率地指出，我們党内已經存在着整批整批的人們（来自富裕农民的人，高級职员，知識分子），他們本来会加入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維克党的，如果这些党不是非法的話。（5）党所掌握的国家机关反过来使許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成分流入党内，用机会主义影响党。（6）虽然专家、高級职员和知識分子对我們的建設工作是必要的，但是从他們那里发出一种非无阶级的影响，不断地侵入我們的各种机构——国家的、經濟的和党的机构。

这就是为什么党的列宁主义反对派对于斯大林集团的明显的日益危險的背离傾向坚持敲起警钟。要是认为党的偉大的过去和

它的老布尔什维克队伍在任何条件下和任何时间都是反对机会主义蜕化的保证，这是一种有罪的大意想法。这种想法是同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

这不是列宁所教导的思想。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说道：“历史上有过各种各样的变质；信念、忠诚和其他优秀的个人精神品质，在政治上完全是不关紧要的东西。”^①

在帝国主义大战以前，工人构成了西方各社会党内的绝大多数，他们曾经是无条件地反对机会主义倾向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及时克服他们的领袖的机会主义错误，这些错误在开始时并不是很大的。他们低估了这些错误的作用。他们不了解，在和平发展的长时期中，产生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工人官僚和工人贵族阶层；在这个和平时期后面，到来了第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变动，它不仅会迫使机会主义者，而且也会迫使中间分子向资产阶级投降，使群众在严重的时刻处于解除武装的状态。如果说那些战前第二国际中的左派——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有什么地方可受责备的话，那不是因为他们当时夸大了机会主义的危险，把它叫做民族的一自由主义的工人政策，而是因为他们过多地依赖那时的社会党中的工人阶级党员。他们依赖无产阶级的革命本能，依赖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他们低估了这个真正的危险，并且没有用足够的力量动员下层革命阶级来反对它。我们不要再重复那个错误。我们要及时地纠正党领导机构的路线。用这个事实，我们来回答指责我们要分裂党并且要建立一个新党的说法。无产阶级专政迫切地需要一个作为劳动群众和穷人的领导者的、单一的和团结的无产阶级政党。这种不为派系斗争所削弱的团结是无产阶级完成历史任务所绝对需要的。这种团结只能在不混杂个人解释和修正主义歪曲的马克思和列宁的教导的基础上实现。

主张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前提的工业化必须要有一个确定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中文版第253页。——中译者注

的速度，主張反对富农的增长及其統治农村的野心，主張及时改善工人条件，主張党内、工会内、苏維埃内实行民主——反对派这么做的目的不是为了使工人阶级同它的党分裂，而是为了加强全联盟共产党真正团结的基础。不纠正机会主义的错误，我们只能有一种表面的团结，这将使党在日益增长的资产阶级的进攻之下被削弱，这将使党在一旦发生战争时被迫在进军中和敌人的炮火下重新组织队伍。当党的无产阶级核心一旦发现我们的真正观点和建議，他们必将接受并且为之而战（对于这一点，我们是确信的）——不是把它们作为“派别的”口号，而是作为全党团结的旗帜。

我们党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它的领导上的错误，因此还没有纠正这些错误。恢复时期我国工业异常迅速地增长是产生机会主义错觉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央委员会在党和工人阶级里面系统地鼓励这种错觉。和内战时期相比较，工人的条件迅速开始有所改善，这种情形使工人广大群众产生了迅速地和没有痛苦地克服新经济政策的矛盾的希望。上述的情形阻碍了党及时看清机会主义倾向的危险。

列宁主义反对派在党内的成长，迫使最坏的官僚分子使用了在布尔什维主义的实践中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方法。由于再不能用命令阻止在党基层组织内讨论政治问题，于是一部分官僚现在正转向——恰好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前——建立暴徒组织，它们的任务就是用叫喊、吹口哨和熄灭灯光等办法来破坏关于党的问题的一切讨论。

在我们党内采取直接具体的暴力的方法的企图，势必引起一切正直的无产阶级分子的愤怒，从而必将使它的组织者自食其果。党机器最坏部分的任何手段都不能使党的群众同反对派分离。在反对派后面支持着它的是：我们党的列宁主义传统，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国际无产阶级所看到的国际政治的现状和我国经济建设工作的现状。在恢复时期以后，阶级矛盾必然日益尖锐，它将

日益肯定我們关于目前危机的出路的观点。它将在保卫列宁主义的斗争中日益加强无产阶级先锋队。

战争危险的增长已经迫使工人党员更加深刻地思索革命的根本问题。他们的思想必将使他们积极地加入纠正机会主义错误的工作中来。

近年来，我们党的工人阶级部分在很大程度上被排挤出党的领导，它一直受到长期诽谤运动的不利影响，这种运动的目的是证明左即是右，右即是左。党的工人阶级部分将清醒起来。它将发现真实情况。它将把党的命运掌握到自己手里。在这个过程中帮助工人先锋队是反对派的任务，是这个政纲的任务。

最重要、最尖锐同时是使我们党一切党员苦恼的问题，是党的团结问题。而且老实说，无产阶级革命的未来命运取决于这个问题。无产阶级千千万万的阶级敌人正在集中注意我们党内的争论，并且带着无法隐忍的喜悦和急切心情期待我们队伍的分裂。我们党的分裂，建立两个党，这对于革命来说，意味着巨大的危险。

我们反对派毫无保留地谴责要建立第二党的任何企图。两个党的口号是斯大林集团的口号，为了要从全联盟共产党中排除列宁主义的反对派。我们的任务不是创建一个新党，而是纠正全联盟共产党的路线。只有有一个团结的布尔什维克党，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取得最后胜利。我们正为了我们的观点在党内斗争，我们谴责“两个党”的口号，把它看作冒险家的口号。“两个党”这个口号一方面表现了党机器内的某些分子希望分裂，另一方面表现了一种失望的情绪，表现了他们不理解列宁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在党内赢得列宁思想的胜利——不管有什么困难。没有任何一个真诚保卫列宁路线的人会抱有“两个党”的观点，或者有分裂的想法。只有那些想用其他路线代替列宁路线的人才会主张分裂，也就是沿着两个党的道路行动。

我们将用全力斗争，反对建立两个党，因为无产阶级专政要求团结的无产阶级政党作为它的核心。无产阶级专政要求单一的党。

它要求一个无产阶级的党——这就是說，它的政策是由无产阶级利益所决定的，并且是由无产阶级核心加以实行的。纠正我們党的路綫，改善它的社会成分——这不是两个党的道路，而是加强和保证它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团结。

在此十月革命十周年的时候，我們表示我們深刻的信心，工人阶级作出了无数的牺牲，推翻了资本主义，证明他們現在对于纠正其领导机构的錯誤、有力地推进无产阶级革命、保卫世界革命中心——苏联的任务，是同样能够胜任的。

反对机会主义！反对分裂！为了列宁主义党的团结！

斯大林伪造历史

关于伪造十月起义的历史、革命的历史和党史一事
给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局的信

尊敬的同志们：

你们寄给我一份打印着详细问题的单子，要我答复关于我参加十月革命的情况。我怀疑我是否还能对于各种（包括我自己写作的）文件、讲演和书中已经谈到的情况增加很多的内容。但是请允许我向你们提一个问题：正当全部官僚机器——你们的和別人的一起，忙于隐瞒、销毁、或者至少是歪曲有关我参加十月革命的每一点史料的时候，还问我关于我参加十月革命的问题有什么意思呢？

有几百个同志曾经一再问我：对于为反对我而毫无顾忌地伪造十月革命和我们党的历史这种情况，我为什么保持沉默。我当然不想在这里说清所有这些伪造问题。那需要写好几本书。不过为了回答你们的问题，我要举出几十个这种有意识地 and 恶意地歪曲历史的例子；歪曲历史的活动现在正在大规模地进行，它得到了各种官方机构的当权者的支持，甚至已经扩及教科书方面。

第一章 战争和我的到达彼得格勒^①

我从加拿大的监狱出来到达彼得格勒，是在一九一七年五月初，正当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参加联合政府的第二天。

^① 我给这封信里的各章加上了题目，同时还给托洛茨基正文主要部分的某些地方加了脚注。——英译者注

你局机关报像其他許多的出版物一样，近来尽力把我在战争期間的活动描写为接近“社会爱国主义”^①。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們“忘記”了有一本題目叫作《战争与革命》的我在战争期間所写的东西的結集，这本书当列宁在世期間印过許多版，曾經是党校的学习文件，还被譯成外文列入共产国际的出版物中。

你們力图在我在战争期間的路綫这个問題上欺騙青年一代，尽管众所周知，由于我进行革命国际主义的反战斗爭，早在一九一四年我就在德国被通緝。这是因为我的德文著作《战争和国际》。我在法国被驅逐出境，因为我在那里和共产党的未来建党人共同工作。我在西班牙被逮捕，因为我在那里和未来的共产党人建立了联系。我从西班牙被移送到美国，我在紐約繼續进行国际主义者的革命工作，和布尔什維克們一起参加編《新世界》报，我并且在这个报上对二月革命第一阶段作出了列宁主义的估計。在从美国回俄国的途中，我被英国当局从輪船上抓下来，送进加拿大的一个集中营，在那里和六、七百个德国水手一起生活了一个月；这些水手后来都投身于李卜克內西和列宁的陣营。（他們中的許多人以后参加过德国內战，现在还給我来信。）

关于一封談到我在加拿大被捕原因的英国电报，列宁的《真理报》写道：

“編者按：英国大使收到的这封电报說，托洛茨基——一九〇五年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維埃的**前主席**，献身革命事业几十年的革命家——同德国政府所津貼的一項計劃有联系，这怎么能使人相信呢，哪怕是一分钟？这分明是对一个革命家惊人和无耻地誹謗。”^②

在目前这个对反对派进行卑鄙誹謗——本质上和一九一七年时对布尔什維克的誹謗沒有区别——的时期，这些话听起来是多

① 社会爱国主义是布尔什維克給那些放棄国际主义和对阶级斗争的忠誠、在战时和战后支持本国政府的社会党人所加的污辱性名字。——英譯者注

② 《真理报》，一九一七年四月十六日。

么新鮮。

在一九二一年出版的《列宁全集》第十四卷的注釋里，你們可以讀到如下的話：

“从帝国主义战争开始的时候起，〔托洛茨基〕就采取了彻底的国际主义者的立場。”^①

这样的評語，以及更明确的評語，可以举出无数来。关于我的《战争与革命》一书，俄国和外国的党报上曾經有几百篇文章指出，从我在战争期間的全部工作来考虑，人們必須承认和了解，我和列宁的分歧是次要的，而我的根本路綫是革命的，它使我繼續接近布尔什維主义——不是口头上，而是实际上。我在这里不屑去挖掘我目前的指責者們的政治历史——尤其是他們在战争期間的活动。

他們現在孤立地援引列宁在同我論战中使用的一些尖銳辭句作为他們論证的基础，其中有些話还是列宁在战争期間說的。列宁从来不能容忍发表意見半吞半吐或含混不清。当一个政治思想在他看来是不完全或者含混，他就給予痛击；这样做是正确的。但是，在特定時間內的政治攻击是一回事，对一个人的政治路綫的全面估价又是另一回事。

在一九一八年或者一九一九年的时候，在美国有某一个F·同志出版了一本包括列宁和我在战争期間所写的文章的集子，其中有我的关于那时正在辯論的欧洲联邦問題的文章。列宁对这件事反应如何呢？他写道：

“美国的F·同志做得完全对，他出版了一厚册包括托洛茨基和我的一系列文章的书，这样就提供了一幅俄国革命历史的輪廓。”^②

① 第482頁。

② 《列宁文集》第十七卷第66頁。我不想觸及我現在的指責者中的多数人在二月革命开始时的行为。关于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諾夫之流，关于雅罗斯拉夫斯基之流，还有其他許多許多人，人們可以想起不少有趣的事情。我限制自己只关于麦里尼昌斯基說几句话，他曾經企图在報紙上对于我一九一七年

在我們这一批人到达彼得格勒的时候，当时的布尔什維克中央委員費多罗夫同志在芬兰車站欢迎我們，他在欢迎詞中讲到革命的更高阶段、无产階級专政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这样一些問題。我在答詞中完全同意他关于革命前途的說法。以后費多罗夫告訴我，他的講話中的基本观点是在列宁的同意下——或者更确切地說，是在列宁的指导下确定的。不言而喻，列宁认为这些观点对于我們合作的可能性是有决定意义的。

我从加拿大回国以后沒有立即加入布尔什維克組織。为什么？因为有分歧嗎？你們現在正力图根据这个事实来捏造分歧。凡是一九一七年时身居布尔什維克中央核心組織的人都知道，当时从第一天起，就从来沒有一点我同列宁之間存在任何分歧的迹象。在我抵达彼得格勒——或者不如說芬兰車站的时候，我从被派来迎接我們的同志那里得知，在彼得格勒有一个革命国际主义者的

在紐約时的态度提出虛假的見证。每一个在美国的人都知道麦里尼昌斯基是一个孟什維克。在布尔什維克和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同社会爱国主义和中派主义斗争时，麦里尼昌斯基置身事外。他逃避所有这样的問題。他在加拿大集中营里也是这样，他（像其他許多人那样）是偶然同我和丘德諾夫斯基一起到那里去的。丘德諾夫斯基和我制定我們将来的工作計劃时，並沒有告訴麦里尼昌斯基。但是既然我們你挨我我挨你地住在一个营房里，丘德諾夫斯基和我决定向麦里尼昌斯基提出一个明白的問題：他在俄国将同誰合作，孟什維克还是布尔什維克？必須为麦里尼昌斯基說句公道話，他当时回答說：“同布尔什維克。”仅仅在这以后，丘德諾夫斯基和我才开始把他作为同志那样同他交談。請讀一下麦里尼昌斯基在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七年所写的东西。凡是在美国認識他的人，都只能对之发笑。但是何必回溯到美国呢？你只須听听麦里尼昌斯基的任何讲演，就可以認識这位保持飯碗的机会主义者了，柏塞尔主义对他比列宁主义要接近得多。（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諾夫現在是《消息报》的編輯。一九一七年当列宁和托洛茨基号召俄国工人停止战争并且成立自己的政府的时候，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諾夫則鼓励工人认購克倫斯基的“自由公債”。雅罗斯拉夫斯基是斯大林的御用文人。他在二月革命以后也是主張支持临时政府的。麦里尼昌斯基現在是莫斯科工会理事会主席。关于丘德諾夫斯基，不詳。——英譯者注）

組織(所謂“区联派”^①)，这个組織正在考虑同布尔什維克合并的問題，并且这个組織的某些領導人員把这个問題推迟到我到达以后再作决定。区联派組織中大約包含三千名彼得格勒工人，它的領導人員中有烏里茨基，阿·阿·越飞，卢那察尔斯基，尤尔涅夫，加拉罕，弗拉基米洛夫，曼努伊里斯基，波澤尔恩，里特文斯等人。

关于区联派的性质，《列宁文集》第十四卷里有这样的說明：

“在战争問題上，区联派采取国际主义的立場，在策略上，他們是接近布尔什維克的。”

我在回国后的最初几天，就首先向加米涅夫同志，以后当着列宁、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向《真理报》的編輯說，鉴于不存在任何分歧，我已經准备好即时加入布尔什維克，但是关于尽快吸收区联派組織入党的問題还需要作决定。我記得，当时在場的某人問我认为合并應該如何进行（区联派的什么人應該进《真理报》編輯部，什么人應該进中央委员会等等）。我回答道，对我來說，既然不存在任何分歧，这个問題就沒有任何政治上的重要性。

在区联派的領導人員中，有些人企图推迟这次合并，提出这个或那个条件等等。在党的彼得堡委员会和区联派之間曾經积累了一些老的意見和缺乏信任等等，这是在这类关系中所常有的。使我們的合并推迟的原因仅仅是这些，而不是其他。

第二章 拉斯科里尼科夫的两种意見

为了要把我在一九一七年的路綫同列宁的路綫对比，拉斯科

① 原名是“統一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区联組織”，是由一些脫离布尔什維克党的机会主义分子和孟什維克托洛茨基分子在彼得格勒組成的。这个集团产生于一九一三年，长期以来采取中派主义立場。二月革命后，区联派相当靠近布尔什維克，并有时和布尔什維克團結一致。在布尔什維克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前，区联派提出声明，說他們在各方面都同意布尔什維克，并請求接收他們入党。

——中譯者注

里尼科夫^①同志最近塗抹了不少紙張。他所写的这些东西和目前时期的其他捏造毫无区别，因此不必从其中引证什么例子。只要摘录这同一个拉斯科里尼科夫在早些时候所写关于一九一七年那个时期的某些話就够了。

“过去战前时期的分歧的余响已經完全消失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策略路綫已沒有任何区别。战争期間已經出現的那个合并問題，从托洛茨基一回到俄国，就完全地、确定地实现了。从他第一次的讲演里，所有我們这些老列宁主义者都感到他是我們的人。”^②

这些話不是为了证明什么或者反駁什么而写的，而仅仅是按照事实叙述当时情形。以后拉斯科里尼科夫表明，他也懂得怎样不按照事实叙述当时情形。在党史局的机关报上重新发表他的文章时，拉斯科里尼科夫小心地刪掉了当时的事实，而代之以当时不存在的情况。

也許不值得总是談拉斯科里尼科夫同志，可是他的例子很鮮明。他在評論我的文集第三卷时問道：“那么托洛茨基本人在一九一七年的立場是什么呢？”他答道：“托洛茨基同志仍然认为自己是同孟什維克們——策烈铁里和斯科別列夫同一伙人中的一員。”下面是：“托洛茨基同志还没有澄清他对布尔什維主义和孟什維主义的态度。当时托洛茨基同志仍然居于动搖不定的騎墙立場。”^③

我們將怎样把这些厚顏无耻的断言和上面摘录的这同一个拉斯科里尼科夫所說的話——“过去战前时期的分歧的余响已經完全消失了”——調和起来呢？如果托洛茨基还没有确定他对布尔什維主义和孟什維主义的态度，怎么会“所有我們这些老列宁主义

① 拉斯科里尼科夫在一九一七年时是一个海軍軍官，作为喀琅施塔得苏維埃的领导人之一，曾参加推翻临时政府。他現在共产国际工作。

② 《克倫斯基的監獄》，載《无产階級革命》一九二三年第十号，第二十二号，第150—152頁。

③ 《紅色处女地》，第七和第八号，第395—401頁。

者都感到他是我們的人”呢？

但是还不仅如此。在这同一个拉斯科里尼科夫写的题目叫作《七月的日子》^①这篇文章中，我們看到：

“列夫·达維多維奇^②当时不是我們党的正式一員，但是事实上他从美国回到国内那天起，就一直在我們党内工作。不管怎样，他在苏維埃里第一次发表演說以后，立刻就被我們全体看作是我們党的領袖之一。”

这看来似乎很清楚，似乎不可能加以曲解了。但是放心好了。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邪恶一天当就够了。^③我們今天的“邪恶”是如此地巨大——这种邪恶是在官方的指揮和命令下系統地加以組織和强化的。

拉斯科里尼科夫的行为不仅代表他个人的特点，而且代表我們目前整个領導制度和教育制度的特点，为了充分表現这种行为的美妙，我不得不从拉斯科里尼科夫的《克倫斯基的監獄》这篇文章中摘引較长的一段。下面是他在那篇文章中所說的話：

“托洛茨基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态度是一种非常尊敬的态度。他把列宁看得高于一切他在俄国或者国外遇到过的同代人。在托洛茨基談到列宁时所用的語气里，你可以感到一个学生的忠誠。那时，列宁已經为无产階級事业工作了三十年，托洛茨基是二十年。过去战前时期的分歧的余响已經完全消失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策略路綫已沒有任何区别。在战争期間已經出現的那个合并問題，从托洛茨基一回到俄国，就完全地、确定地实现了。从他第一次的讲演里，所有我們这些老列宁主义者都感到他是我們的人。”^④

必須作些补充，拉斯科里尼科夫在一九一七年夏季的月份里常常在工作过程中和我相会。他開車帶我到喀琅施塔得去，他常

① 《无产階級革命》，一九二三年第五百十七号，第71—72頁。

② 列夫·达維多維奇是托洛茨基的教名和父名。——中譯者注

③ 語出《聖經》《馬太福音》篇。——中譯者注

找我商量事情，常和我在監獄里作長時間談話，等等，等等。所以他的回憶之作是極有價值的証言，而他以後的“修改”，不折不扣地是一個捏造者在命令之下完成任務的作品。

第三章 一九一七年五月到十月

布尔什維克在一九一七年五月、六月和七月間所发布的一系列文件，不是我執筆写的就是我參加定稿的。屬於這一系列的文章，例如蘇維埃代表大會（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布尔什維克黨團關於在前綫實行進攻的議案的聲明，布尔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在七月示威的日子裡給執行委員會的信，等等。我已經發現了很大一批我所寫的，或者是我參加撰写的布尔什維克在這個時期的決議。我當時在一切會議上講話，都是以布尔什維克身分出現，這

- ④ 當然，拉斯科里尼科夫關於列寧和托洛茨基的關係的這個証言並沒有阻止他引用《托洛茨基給齊赫澤的信》，來教育青年黨員。（齊赫澤是孟什維克的一個領袖，一九一二年當他正和列寧爭論激烈時，托洛茨基寫給他一封信，信中用極端的語言攻擊列寧。——英譯者注）

在我們撇開拉斯科里尼科夫以前，讓我們聽一聽他在其回憶文中怎樣描述調查員宜讀厄馬連科關於德國黃金等事的証言時的情形：

“在宣讀証言的過程中，我們時時加以諷刺的評論，但是當調查員的沒有感情的聲音念到對我們來說是如此親愛的列寧同志的名字時，托洛茨基不能控制自己了。他用拳頭敲桌子，挺身站起來，憤怒地宣稱，他拒絕聽這個充滿惡毒謊話的証言。我們每一個人都不能在這個不加遮掩的捏造面前抑制自己的憤怒，我們全都熱烈地支持托洛茨基同志。”

在“不加遮掩的捏造”面前，憤怒是一種完全可理解的感情。且撇開拉斯科里尼科夫本人那些淺薄的捏造（也沒有遮掩得很好），讓我問他：對於最近按照厄馬連科式樣捏造的弗蘭格爾軍官和反革命陰謀案，剛從斯大林學校畢業的今天的拉斯科里尼科夫抱什麼態度呢？（厄馬連科是沙皇密探，他偽造文件證明列寧和托洛茨基同德國總參謀部之間有聯繫。這些文件在美國被稱作“席松文件”。上面所描寫的調查是由臨時政府所任命的一個委員會來進行的。最後一段是暗示斯大林完全按照沙皇政府的方式，使用一個密探來證明托洛茨基所領導的對派和活動在俄國的白衛分子之間有聯繫。請參閱《序言》后面的《原編者說明》。——英譯者注）

是所有的同志所熟知的。

不久以前有一位新型的“馬克思历史家”企图发现我和列宁在七月起义問題上的分歧。^① 每一个人都企图出一分力，而希望收回一百倍的报偿。即使去駁斥这些捏造，你也必須克制住一种要嘔吐的感觉。我不引用回忆录。我限于引证文件。在我当时对临时政府所作的声明中，我写道：

“（一）我同列宁、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站在一个基本立場上，并且我在我的《前进报》上和一般地說在我所有的講話中，說明了这个立場。……

（二）我所以沒有参加《真理报》編輯部和不屬於布尔什維克組織，并不是由于政治上的分歧，而是由于我們党的历史条件，这些条件現在已經完全失掉了意义。”^②

关于七月起义，社会革命党—孟什維克主席团召开了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維克党团邀請我去提出他們关于新形势問題和党的問題的声明。这是在我对党正式联合**以前**的事情，而尽管实际上——举例來說，斯大林当时就在彼得格勒。新型的“馬克思主义历史家們”那时还不存在，集会的布尔什維克們一致通过了我的声明中关于七月起义和党的問題的根本观点。关于这一点是有出版物可以作证的，特别是在恩·伊·姆拉列夫的回忆录里面。

众所周知，当問題是在艰苦条件下的思想态度和政治行为的問題时，列宁对人是不会犯因为仁慈而信任的毛病的，尤其是对那些以前一直站在布尔什維克党的队伍以外的革命者，这样的仁慈

① 一次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反对临时政府的自发起义。这次起义并不是布尔什維克所发起和希望的，但当起义已經发生的时候，党决定站在这个运动前面領導它。由于群众沒有准备夺取政权，所以这次运动就在两三天內很快地减弱和消退了。所有的資产階級和孟什維克的報紙都指責布尔什維克組織了这次起义，并且对布尔什維克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列宁躲藏起来。托洛茨基繼續活动了一个短时期，而在七月二十三日被捕，一直被监禁到九月四日。——英譯者注

② 《文集》第三卷，第一部分，第165—166頁。（指托洛茨基本人的文集。——中譯者注）

更加和他格格不入了。是七月起义这件事把过去的界綫的殘余清除了。在他关于参加立宪會議的布尔什維克候选人名单的信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道：

“我們不能允許这么多的候选人从最近才参加我們党的經驗很少的人們(比如尤·拉林)中間产生。我們必須特別加以重新考虑和修改这个名单……

“不言而喻……沒有人会反对这样的候选人資格，例如，像列·达·托洛茨基的候选人資格，因为，第一，托洛茨基从回国的那天就立刻站在国际主义者的立場上；第二，他在区联派中为同布尔什維克合并而斗争；第三，在七月的困难日子里，他以卓越的工作表明自己是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忠誠捍卫者。显然，对于出现在名单上的多数新党员是不能这样說的。”^①

我們同“預备国会”的关系問題是在列宁不在場的情况下决定的。我当时成了作为那些主張抵制預备国会的布尔什維克的发言人。如所周知，参加民主會議^②的布尔什維克党团中的多数投票反对抵制。列宁坚决支持少数。下面是他关于这个問題所写的一些东西：

“应当抵制預备国会。应当拋棄^③工农兵代表苏維埃，到工会中去^④，到群众中去。应当号召他們进行斗争。应当給他們提出正确鮮明的口号：驅逐克倫斯基这个拿破侖主义者的匪帮和解散他伪造的預备国会，解散这种策烈铁里—布里根杜馬。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甚至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后，还不肯接受我們提出的把政权和平地轉交給苏維埃的妥协办法（当时我們在苏維埃中还没有占多数），他們又滾到卑鄙无耻地勾結立宪民主党人的泥坑里去了。打倒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他們进行无情的斗争！”

“毫不留情地把他們从一切革命組織中赶出去。不要同这些基什金的朋友，科尔尼洛夫的地主和資本家的朋友进行任何談判

^① 《一九一七年布尔什維克的第一个合法的彼得堡委员会》，《列宁格勒党史》第305—306頁。

和會議。”⑤

“九月二十三日 星期六

“托洛茨基贊成抵制了。好极了，托洛茨基同志！

在参加民主會議的布尔什維克党团中，抵制的主張失败了。抵制万岁！”⑥

② 民主會議是由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召集各种合作組織和其他社会組織的代表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十四日举行的一个會議。他們的目的是寻求一些新的方法来支持临时政府，当时临时政府的权力已經日益轉到苏維埃手中，而苏維埃正在日益趋向布尔什維克。民主會議力图建立一个所謂預备国会或者共和国苏維埃的新机构，設想由它来控制政府。

那些以托洛茨基和列宁为首的、有意識地进行以革命夺取政权的活动的布尔什維克，自然反对民主會議和預备国会。那些日后反对布尔什維克夺取政权的人，特别是加米涅夫和李可夫，他們贊成这个支持临时政府的計劃。列宁那时处于“地下”，他每天向党发出措辞强硬的信件，坚持采取准备夺取政权的进攻政策。

列宁在他支持托洛茨基的信中写道：

“毫無疑問，在我們党的‘上层分子’中，显然存在着动摇的傾向，这种动摇可能会招致灭亡，因为斗争还正繼續发展中……在我們党的‘議會’上层分子中間，最高級是有問題的。”〔參看《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中文版第41頁。——中譯者注〕

看来很有趣，当时的中央委员会和《真理报》編輯对待列宁的样子很像以后他們对待托洛茨基的样子。列宁在九月二十九日的信中写道：

“鉴于中央委员会对于我从民主會議一开始就对这个問題所坚持的主張竟然擱置不答，以及中央委员会刪去我的文章中对于像参加預备国会的可耻决定，像把苏維埃主席团中的席位献給孟什維克，等等等等，这一类严重錯誤所作的指責，因此我不能不从这里面看出一个“有礼貌的”暗示：中央委员会甚至不願意考虑这个問題。要我封住嘴的一个有礼貌的暗示，而且甚至是要我退出的一个建議。

“对我來說已有必要請求批准退出中央委员会，我的确这样請求，同时我要保留我在党的下层和在党代表大会上进行鼓动的权利。”

因为那时中央委员会的多数还没有壟断报刊，也沒有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帮助，所以列宁的信到了全党的面前，而情况很快就改变了。在布尔什維克党团十月七日的會議上，托洛茨基又一次发言主張抵制，加米涅夫反对，經過激烈的辯論以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观点获得通过。——英譯者注

③④⑤⑥ 參看《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中文版第40頁。——中譯者注

第四章 我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作用

关于我参加十月革命的情形，你们在《列宁全集》第十四卷的注释里可以读到下面的一段话：

“在彼得堡苏维埃的多数转入布尔什维克手中以后，托洛茨基被选为彼得堡苏维埃的主席，他在这个地位上组织和领导了十月二十五日的起义。”^①

这里有多少是真实的，多少是虚假的，让党史局——假使不是现在这个党史局，那么就让将来某个党史局决定吧。前些时候斯大林同志绝对否认上面那段话，他这样说：

“但是必须说，托洛茨基在十月起义中没有起而且不可能起任何特殊作用，他当时担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只是执行了领导他的每一个行动的相应的党机关的意志。”^②

下面接着说：

“因为托洛茨基同志在十月革命时期是我们党内比较后起的人物，他无论在党内或在十月起义中都没有而且不可能起什么特殊作用。”^③

在提出这些证言的时候，斯大林忘记了他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六日所说的话；这就是说，正当革命一周年的时候，那时事实和事件在一切人的心中记忆犹新。甚至在那时，斯大林就已经开始了现在他如此规模宏伟地进行的反对我的活动。但是那时他不得不比现在小心和隐蔽地进行。下面是他那时写在《真理报》^④上的东西，题目是：《党最杰出的领袖们的作用》：

“起义的全部实际组织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可以确定地说，党应该把卫戍部队迅

① 第482页。

②③ 《斯大林全集》第六卷，中文版第284、285页。——中译者注

④ 第二百四十一号。

速轉到蘇維埃方面，軍事革命委員會的工作的出色執行，這些功勞主要地和首先歸于托洛茨基同志。”

這些話今天聽來絕對不會有人相信是從斯大林嘴里說出的，這些話絕不是為了贊揚而作的誇大——相反，斯大林當時的目的完全是另一回事，但是我不想談那方面。

很久以前就有人說過：誠實人有這個好處，他即使記性不好，但從來不會自相矛盾。一個不忠誠、無原則和不正直的人，必須經常記住他過去說了些什麼，以免使自己丟臉。

斯大林同志在雅羅斯拉夫斯基之流幫助下，正在試圖編造關於十月起義的組織工作的新歷史，他們以這個事實為基礎：黨建立了一個“起義的組織領導工作的實際中心”，似乎，托洛茨基不是這個中心的成員。列寧呢，也不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單單這個事實就表明，這個委員會只有從屬機構的作用，它沒有發揮任何獨立的作用。現在編造關於這個委員會的故事的唯一原因是，斯大林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它的全體成員是：“斯維爾德洛夫，斯大林，捷爾任斯基，布勃諾夫，烏里茨基。”^① 不管挖掘垃圾是多麼不愉快，但作為當時事件的直接參加者和目擊者，我必須提出下述的証言：

列寧的作用當然不需要再有任何說明。斯維爾德洛夫我是常見面的，並且我常常征詢他的意見和向他要人來幫助我。加米涅夫同志，眾所周知，他當時持有特殊的立場，這種立場的錯誤^②，他在很久以前就已經承認了，不管怎樣，他積極地參與了革命中的大

① 參看《斯大林全集》第六卷，中文版第284頁。——中譯者注

② 這個溫和的暗示所指的事實是：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反對十月奪取政權的行動，他們和孟什維克進行協商來反對這件事，並且在非布尔什維克的報紙上發表布尔什維克中央委員會號召起義的秘密決議。列寧在一封長信里罵他們是“叛徒”，“逃兵”，“工賊”等等，這封長信載在我的《列寧逝世以後》一書中。季諾維也夫以後曾聲稱，他平生兩個最大的錯誤是一九一七年反對列寧和一九二四年反對托洛茨基。他說：“我現在要和托洛茨基長期合作。”這話是在兩年以前說的，而他現在又一次地叛變了，正在斯大林的命令下寫“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文章。——英譯者注

事件。我和加米涅夫一起在軍事革命委員會的總部里，度過從二十五日到二十六日這個決定性的夜晚，我們用電話回答問題和發出命令。我願意盡力搜索記憶，但是我仍然不能回答這個問題：在那些決定性的日子裡，斯大林的作用究竟是些什麼？我從來沒有征詢他的意見，需要他的合作。他從來沒有表現過最起碼的主動。他從來沒有提出過獨立的建議。這個事實不是任何新型“馬克思主義歷史家”所能改變的。

一 点 补 充

如上所說，斯大林和雅羅斯拉夫斯基最近幾個月以來費了很大力氣證明，領導整個起義過程的，是黨所建立的包括斯維爾德洛夫，斯大林，布勃諾夫，烏里茨基和捷爾任斯基的組織工作中心。斯大林盡其一切可能地強調托洛茨基不是那個中心的成員這個事實。但是可惜，由於斯大林的历史學家的粗心，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日（這就是說，在我寫了這封信以後）的《真理報》上，出現了中央委員會一九一七年十月十六日到二十九日會議記錄的準確摘錄。

“中央委員會以下述成員組成一個軍事革命中心：斯維爾德洛夫，斯大林，布勃諾夫，烏里茨基和捷爾任斯基。這個中心是蘇維埃革命委員會的一個組成部分。”

蘇維埃革命委員會就是彼得格勒市蘇維埃所建立的軍事革命委員會。任何其他的領導起義的蘇維埃機構是不存在的。因此，中央委員會所指定的這五位同志是作為補充人員而參加到托洛茨基擔任主席的這個軍事革命委員會的工作者中間的，因此托洛茨基就沒有必要參加到他已經擔任主席的一個組織的工作者中間。總而言之，在歷史已經完成之後，要修改它是多么困難哪！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一日

我在布列斯特寫了一本十月革命簡史。這本書用各種文字出了很多版。沒有人告訴我其中有重大的遺漏——即：書中沒有指

出起义的主要领导机构“军事革命中心”，这个机构的成员有斯大林和布勃诺夫。如果我对十月历史的记忆这么糟，为什么过去没有人纠正我呢？为什么在革命最初的几年里，在所有的党校里都一点没有事地读着我的书呢？

甚至在一九二二年，党的组织局似乎还认为我相当知道十月革命的历史。下面是关于这一点的微小然而雄辩的证据：

“第 14302 号

1922年 5 月 24 日莫斯科

“致托洛茨基同志：

“中央委员会组织局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会议第十二号记录的摘录。

“委托雅科夫列夫同志于十月一日前，在托洛茨基同志主编下，编成一部十月革命历史教科书。

第二宣传部书记签字。”

这是一九二二年五月的事。我的关于十月革命的书和关于一九〇五年的书在那时以前已出过许多版了，组织局是很了解的——而组织局那个时期的首脑早已就是斯大林了。但是组织局却仍然认为必须由我来担任编写十月革命历史教科书的工作。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只是在列宁永远闭上了眼睛以后，斯大林和斯大林分子才对“托洛茨基主义”睁开了眼睛。

第五章 “遗失的”文件

十月革命以后不久，在我们和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关系问题上，党的领导人之间出现了尖锐的分歧。（我们是组织一个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呢，还是一个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联合的政府？）十一月十四日，列宁在彼得格勒委员会会议上说到了这个问题。中央委员会一九一七年会会议记录已经在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时出版了。十一月十四日会议记录原来是包含在内的。目录初校样中标明有这个记录。但是以后，遵照上面的命令，十一月

十四日記錄被刪掉了，並且向党隱瞞起來了。這樣做的原因是容易了解的。關於聯合政府的問題，列寧向委員會說了下面的話：

“關於聯合政府問題，我甚至無法嚴肅地來談這樣一個問題。很久以前托洛茨基說，聯合是不可能的。托洛茨基懂得這個問題，而從那時以來，還一直沒有比他更優秀的布爾什維克。”^①

這個講話以口號結束：

“絕不妥協！一個清一色的布爾什維克政府！”

他們告訴我們，刪掉這個記錄的命令是從黨史局來的，命令上的解釋是，列寧的這個講話的記錄“顯然”錯誤。當然，列寧的講話不會符合現在正在編造的十月革命歷史。

值得注意的是，這同一個會議記錄表明，當紀律被用來掩蓋明顯的機會主義政策的時候，列寧如何對待紀律問題。在費尼格斯坦同志講話以後，列寧宣稱：

“假使你們要分裂，就干吧。假使你們取得了多數，就把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權力拿去，並且保持下去。我們就到水兵中去。”

正是由於採取了這種勇敢的、堅決的、不調和的態度，列寧拯救了黨免于分裂。

鐵的紀律，是的，但是要以革命政策為基礎。

列寧在四月四日說道（這是在一個黨的會議上；斯大林向党隱瞞了這個會議記錄）：

“甚至我們布爾什維克也對臨時政府表示信任了。這只能用革命中升起了一股毒氣來解釋。這是社會主義的末日。同志們，你們對政府抱信任態度。假使是這樣的話，我們不能在一起工作。”

① 這個聲明由於下面的事實而具有特別的意義：恰好在這時，在這個問題上，列寧同他自己的五個追隨者鬥爭，其中包括李可夫，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他們因為列寧拒絕同其他社會主義政黨組成聯合政府而退出了中央委員會，李可夫並且辭退了政府的職位。列寧公開譴責他們是“逃兵”，並且號召工人，士兵和農民也來譴責他們。在這樣的情況下，他的有關托洛茨基的聲明——“從那時以來還一直沒有比他更優秀的布爾什維克”，就帶有了對他的追隨者正式通報的性質。——英譯者注

他繼續說：

“我聽說現在在俄國流行聯合，即同護國派聯合的思想。這是背叛社會主義。我覺得寧可只剩下自己一個人，像李卜克內西那樣——一個對一百一十個。”

為什麼列寧把這件事說得這樣激烈——一個對一百一十個呢？因為在一九一七年三月會議中，半妥協的傾向是很強的。

斯大林在那次會議上支持克拉斯諾雅爾斯克蘇維埃所提出的決議案：

“支持臨時政府的各種活動，只要它在正在進行的革命中，採取滿足工人階級和革命農民的要求的路綫。”

更有甚者，斯大林贊成和策烈鐵里^①聯合。這是一段會議記錄的準確摘錄：

“日程：策烈鐵里要求聯合的建議。

“斯大林：我們應該去。必須說明我們對聯合條件的建議。可以按照齊美瓦爾德—昆塔爾^②的條件，進行聯合。”

某些與會者認為這樣一個聯合，是不是派別太複雜了，斯大林對於這個反對意見回答說：

“不必跑得太遠和預料分歧。沒有分歧的黨內生活是不存在的。我們將在黨內克服這些不足道的分歧。”

同策烈鐵里之間的分歧，斯大林認為是不足道的。在同策烈鐵里的追隨者的關係上，斯大林是主張放寬民主的。他說：“沒有分歧的黨內生活是不存在的。”

黨史局的領導同志們，現在允許我問你們：為什麼我黨一九一七年三月會議的記錄至今未見天日？你們普遍散發各種問題的無

① 策烈鐵里是孟什維克的領袖，以後是格魯吉亞孟什維克政府的首腦，現在是第二國際的執行委員。——英譯者注

② 一九一五年九月在瑞士齊美瓦爾德村召集了國際主義者第一次國際代表會議，當時有左中右三派，左派以列寧為首。一九一六年在瑞士昆塔爾村召集了國際主義者第二次國際代表會議。昆塔爾宣言是根據代表會議上互相鬥爭的各集團妥協的結果而擬定的，較齊美瓦爾德宣言前進了一步。——中譯者注

数图表。你們搜集各种常常是最沒有意义的瑣事。可是你們为什么繼續隱藏对于我們党的历史有着不朽意义的三月會議記錄？这个記錄暴露出党内占支配地位的分子在列宁回国前后的情况。我在中央委员会書記处和中央監察委员会主席团里曾經一再問道：为什么党史局向党隱瞞意义如此重大的文件？你們是知道这个文件的。它是在你們的掌握中。你們不发表这个文件的原因很簡單，因为它无情地反映了斯大林在三月底和四月初——这就是說，斯大林試圖独立地制定政策的时期——的政治路綫。

列宁在这同一个四月四日會議講話中說道：

“《真理报》要求政府放棄兼并。这是廢話！……絕大的諷刺。”^①

这个講話沒有加以整理。这里有一处遺漏的地方。但是講話的一般思想和总的方向是絕對清楚的。当时《真理报》的編輯之一就是斯大林。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半护国主义的文章，和在“只要”等等說法下支持临时政府的文章。斯大林有保留地对克倫斯基和策烈铁里的告人民书表示欢迎，告人民书是虛伪的、社会护国主义的文件，它在列宁那里引起的只是憤怒。

党史局的同志們，这就是你們所以不发表我党一九一七年三月會議記錄而向党隱瞞这个記錄的原因，这就是你們所以如此做的唯一原因。

我在前面引用了列宁在彼得堡委员会十一月十四日會議上的講話。哪里发表了这个記錄呢？哪里也沒有。为什么？因为你們禁止。剛剛出版了一本第一个合法的彼得堡委员会的一九一七年文件汇编。十一月十四日會議記錄原来是包括在这个汇编里的，并且是在最初排印的目录中标明了的。但是以后，像我已經說过的那样，这个記錄在党史局的命令之下被从这本书中抽掉了，命令中有这样一个出色的解釋，說是列宁的这个講話“显然”是被秘书在記錄中曲解了。“显然的”曲解何在呢？它就在于：列宁的講話无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中文版第22、38頁。——中譯者注

情地駁斥了斯大林—雅罗斯拉夫斯基目前这个历史学派关于托洛茨基的捏造。每一个知道列宁讲演風格的人都將毫不犹疑地承认那句归为列宁說的話的真实性。在列宁关于妥协的那些話的后面，在列宁威胁說“我們要到水兵中去”这样的話的后面，你感觉到在那些日子的一个活生生的列宁。你們不让他和党見面。为什么？因为他的那句关于托洛茨基的評論。仅仅如此。

你們隱瞞一九一七年三月會議的記錄，因为它不利于斯大林。你們隱瞞了十一月十四日會議的記錄，因为它妨碍你們为反对托洛茨基而进行的伪造工作。^①

第六章 雅罗斯拉夫斯基的两种意見

雅罗斯拉夫斯基的誹謗和捏造，十分之九是对着作者的。很难想像有更加混乱和恶毒的謊言了。但是，不要弄錯，认为雅罗斯拉夫斯基总是这样写的。不，他曾經写过完全不同的东西。詞藻是同样的华丽，气味是同样的恶劣，但是意思恰好相反。一九二三年春天，雅罗斯拉夫斯基专文描述作者早期的政治活动。这是一篇喋喋不休的贊頌之辞，使人无法卒讀。引用它也要硬着头皮才行。不过还是得这样做。在扮演檢查官角色的时候，雅罗斯拉夫斯基特別乐于叫那些因散发列宁遺囑、列宁关于民族問題的信件、

① 允許我提到一件关于李可夫同志的偶然事件的插話。許多人對下面這件事感到惊奇：在列宁研究院的記錄里发表了一篇列宁的文章，其中有几句提到李可夫的很不愉快的話，列宁是这样写的：

“孟什維克执政派的机关报《工人报》，正在竭力攻击我們，因为警察在一九一一年逮捕了一个布尔什維克嫌疑犯李可夫，以便在第四届杜馬选举的前夕进行‘自由’活动（《工人报》對我們党的布尔什維克們特別強調了这一点）。”

因此，列宁在一九一一年是把李可夫算在非党的布尔什維克里面的。这些話現在怎么会見了天日呢？本来現在是只从列宁著作里引用斥責反对派的話的。涉及目前多数派的代表們，是只准引用贊美的話（假使有的話）的。但是上述的字句怎么会发表的呢？每一个人都对这件事作了完全相同的解釋：斯大林的历史学家认为必須（太快了！太快了！）对李可夫完全客观。

以及列宁敢于批評斯大林的其他非法文件而有罪的共产党人，在证人席上面对面地对质。現在讓我們叫雅罗斯拉夫斯基和他自己面对面地对质一下。

“托洛茨基同志的輝煌的文学—政論活动(雅罗斯拉夫斯基在一九二三年是这样写的)使他博得了傳遍世界的‘小册子大王’的名声。英国作家蕭伯納这样描写他。凡是注意到他在四分之一世紀过程中的活动的人，无不深信他这种政論家和辯論家的天才，是在我們无产階級革命的年代里特別燦烂地发展、成长和成熟起来的。但是即使在他活动的早期，我們也已經可以看到一种最深刻的天賦。处在沙皇檢查制度的严密箝制之下，每一个希望逃脫这种箝制并使自己高出一般水平的人的大胆的思想和大胆的形式都不免被檢查制度所損毀，尽管如此，可是托洛茨基那时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却仍然浸透着灵感，它們都具有形象，具有色彩。正在成熟的地下力量是这样的偉大，正在觉醒的人民的心的跳动是这样强烈地被感受着，正在发展的矛盾是这样的尖銳，以致世界上一切檢查制度都不能扑灭像当时列·达·托洛茨基那样光輝的人物所具有的創造力。

“大概許多人都已經看見过流傳很广的托洛茨基青年时代的像片，那时他第一次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看那一头怒发冲冠的头发，看那富有特点的嘴唇和高高的前額。在那一头的头发之下，在那高高的前額之下，一条不平靜的想像、思想、情緒之流甚至那时已經在沸騰着了——有时这条激流使托洛茨基同志稍微游离历史的大路，有时使他走了一条太长的弯路，或者，从另一方面說，使他大胆地采取了一条不應該走的捷徑。但是在所有这些探索的行动里，我們看到一个高度忠誠的革命者，天生的先鋒角色，用他那久炼成鋼、屈伸自如的鋒利辯才扫蕩着敌人，用他的一支笔洒布着(!)他的思想的財富，像精美的珍珠一样。”

接下去是：“我們手头的这些文章包括两年多的時間——从一九〇〇年十月十五日到一九〇二年九月十二日。那时西伯利亚的

同志們高兴地讀着这些才气焕发文章，难耐地等待着它們的出現。只有很少的人知道作者是誰，而那些知道他的人当时也沒有想到他会成为**最革命的軍隊和世界上最偉大的革命的一个公认的領袖。**”

結尾是：

“他反对散漫的俄国知識分子的悲观主义（唔！），托洛茨基同志以后证实了他的反对是有理由的。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事实上证实了这一点，和偉大无产階級革命中的革命无产階級肩并肩地证实了这一点。这是需要偉大的力量的。西伯利亚的村庄沒有消磨掉他的这些力量，反而使他确信，必須从根本上大刀闊斧地打碎那个有可能发生他所描写的事实的结构。”^①

虽然在他最近的那些估价中，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轉了个一百八十度大弯，但是我們必須承认，在某一方面他仍然絲毫未变，这就是：無論在誹謗上或者在贊頌上，他同样地令人难耐。

第七章 奥里明斯基和卢那察尔斯基 的两种意見

在“托洛茨基主义”的揭发者中，奥里明斯基^②占有相当突出的地位。我記得，他曾經在关于我的书《一九〇五年》的問題上特別热心，我这本书原来是用德文出版的。奥里明斯基在关于我的书的問題上有两种意見：一种是在列宁时代，一种是在斯大林时代。一九二一年十月的时候，有人提起了出版我的《一九〇五年》一书的問題，关于这个問題，奥里明斯基写給我下面的信：

“亲爱的列夫·达維多維奇：

“党史局当然乐于用俄文出版你的书，但問題是：誰来翻譯它

① 《西伯利亚的火花》，第一号和第二号，一九二三年一月和四月。

② 奥里明斯基現年九十岁。他是“党史和十月革命史研究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委员会就是我把它簡称为“党史局”的。——英譯者注

呢？你不能让随便什么人来翻譯托洛茨基写的书！那样就会丧失所有的美和独特的風格。或許你可以每天从你重要的国家工作中挤一点時間来做这个工作——順便說一下，这也是重要的国家工作——并把俄文譯文口授給一个打字員。

“还有一个問題：为什么不現在就着手筹备你的作品的完整文集？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委托一个人去担任这件事。現在是做这项工作的时候了。新的一代对党的历史沒有应有的了解，不熟悉領袖們过去和現在的著作，这样他們就会常常离开正軌。原书現送还，希望它很快譯成俄文回到局里来。

致以

最好的祝願

米·奥里明斯基

一九二一年十月十日”

这就是奥里明斯基在一九二一年底所写的——这就是說，在关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的分歧和关于职工会的分歧以后很久的时候，对于这些分歧，奥里明斯基及其同伙現在正力图給以极其夸大的重要性。一九二一年秋天的时候，奥里明斯基认为出版《一九〇五年》是“重要的国家工作”。奥里明斯基是首倡出版我的全集的人，他认为这是教育党员的工作所必需的。一九二一年秋天的时候，奥里明斯基已經不是一个小孩子。他了解过去的事。他比别的任何人都更了解我和布尔什維主义之間的分歧。他本人在过去就曾經参加过同我的論战。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沒有妨碍他在一九二一年秋天为教育年青党员而打算坚持出版我的全集。或者一九二一年时奥里明斯基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吧？

卢那察尔斯基同志現在也是反对派的揭露者中的一員了。他跟在別人之后指責我們悲观主义和缺乏信心。这个角色特别适合卢那察尔斯基^①。

① 这里对卢那察尔斯基的諷刺指的是这个事实：十月革命期間，在彼得堡傳說莫斯科的美丽的圣华西里教堂被革命者破坏了，卢那察尔斯基宣称，如果革命必須破坏艺术品，那么他就反对革命。

跟在別人的后面，卢那察尔斯基不仅从事对比“托洛茨基主义”和列宁主义，而且支持——在少許的遮遮掩掩之下——各种各样的人身攻击。也像某些人一样，卢那察尔斯基在同一个問題上既懂得怎样写反对的意見又懂得怎样写拥护的意見。他在一九二三年出版了一本小书《革命剪影》。其中有一章是談我的。我决不是为了这一章夸張的贊美辞令而引用它。我只引用卢那察尔斯基談到我对列宁的态度的两段：

“托洛茨基是个滿身是刺的专橫人物。只有在他同列宁联合以后，在他对列宁的关系上，托洛茨基从那时到現在都經常表現着一种柔順和动人的服从，并且承认列宁的上級权威，这种承认是出之于真正偉大人物所特有的謙遜。”^①

而在这段的几頁以前是：

“列宁受伤了，我們都担心这是致命伤，这时，沒有誰比托洛茨基更好地表达出我們对列宁的感情。在这场世界性事件的可怕風暴里，托洛茨基——俄国革命的另一个領袖——絕沒有趋向感伤主义，他說：‘当你想到列宁可能死去的时候，似乎我們生命的一切都沒有用了，你就不想再活下去’。”^②

这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他們在他們主人的指揮之下，像一个交际秘书似的，懂得如何写这样的东西或那样的东西。

第八章 关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 和职工会問題的爭論

上面我用一九一七年的一些例子所說明的情况，可以概括此后的所有年代。我的意思并非說在列宁和我之間沒有分歧。分歧是有的。关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的分歧延續了好几个星期，而且在好几天里具有很尖銳的性质。圍繞着这次分歧堆砌起

① 第25頁。

② 第13頁。

来的惊人的夸大之詞，已經在我的《文集》第十四卷和該卷注釋里用文献加以揭发了。这次分歧在我們私人关系上沒有留下任何不快的阴影。恰恰在和約签字几天以后，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指示下，我被派担任軍事领导工作。

在职工会問題上的冲突更加尖銳和持久。这个分歧的尖銳正說明当时国家經濟已經走入一个死胡同。但是，作为死胡同出路的新經濟政策是意見完全一致地通过的。^①几个月以后，同样一致地通过了关于职工会的新決議，代替了第十次代表大会的相反決議。

如果相信目前党的历史学家和理論家，你会以为在革命的最初六年中，完全充滿了关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职工会問題的分歧。其他的一切都不存在了：十月起义的准备工作，起义本身，創立政府，創立紅軍，內战，共产国际的四次代表大会，共产主义宣傳的全部文字工作，外国共产党和我們自己的党的领导工作。在所有这些工作上，在这些工作的一切根本問題上，我同列宁是完全团結一致的，除了目前的历史家所說的两个重大問題：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职工会。

① 斯大林主义的新理論家孟什維克馬尔丁諾夫，他是在新經濟政策的浪潮中参加到我們这面来的，他把关于职工会的分歧描写为关于新經濟政策的分歧。关于这个問題，馬尔丁諾夫在一九二三年写道：

“列·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期間的思想無論比布尔什維克或者比孟什維克都更合乎邏輯和始終一貫。但是他的思想的缺点也就是他太‘始終一貫’了。他所描繪的一幅图画精确地預示了十月革命最初三年的布尔什維克专政已經进入一条死胡同，使无产階級脫离农民，因此布尔什維克党不得不作长距离的撤退。”（《紅色处女地》，一九二三年第二号，第262頁）

新經濟政策以前是托洛茨基主义在統治着！布尔什維主义从新經濟政策开始！令人惊異的是馬尔丁諾夫用同样的方法說明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按照他的說法，在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这就是說，正在革命发动的高潮上——是托洛茨基主义在統治着。真正的馬克思主义政策只是在莫斯科起义被扑灭以后——差不多在第一屆国家杜馬的选举期間——才开始的。現在馬尔丁諾夫对比布尔什維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所用的道理正是他二十年前对比孟什維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那一套。而这些文章竟冒充是馬克思主义科学！就用它們来教育党的年青“历史家”！

斯大林及其僕从竭力把职工会的討論描繪成我对列宁的“尖銳”斗争。

这里是我在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矿工代表大会上說的話，当时正是这个討論的高潮：

“施略普尼柯夫同志^①在这里說——或許我把他的思想表述得粗略了一点——他說：‘不要相信托洛茨基同列宁的分歧。他們仍然要團結起来的，而斗争将只针对我們！’他說‘不要相信’。

“我不知道这相信和不相信意味着什么。当然我們要團結起来。在决定任何一个重要問題时我們可能发生爭論，但是这些爭論只能把我們的思想推向一致。”^②

列宁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的結束講話中总结了关于职工会的討論，这里是他关于这同一个問題所說的話：“施略普尼柯夫說：‘列宁将同托洛茨基联合起来。’托洛茨基回答說：‘凡是不懂得必須联合的人就是反党；当然我們要联合起来，因为我們是党人。’我支持托洛茨基。确实托洛茨基同我有分歧。但是每当中央委员会中形成双方票数大体对等的情形时，就要由党来决定，这时我們按照党的意志和指示联合起来，这样党就作出了决定。托洛茨基和我就是带着这样的声明出席了矿工代表大会，并且带着这样的声明到这里来了。”^③

这和最近出現的关于职工会討論的惡意編造的历史有什么共

① 施略普尼柯夫和亚历山德拉·柯倫泰領導着一个叫做“工人反对派”的派別，这个派別反对列宁，在一九一九年被列宁击败。——英譯者注

② 我在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全俄矿工代表大会上的結束語。

这里是我講話中的另外一段，列宁曾在他的小册子里引用：

“在我和托姆斯基同志进行最尖銳的辯論的时候，我常常說，对我來說这是很清楚的，只有具备托姆斯基同志的經驗和威望的人才可以充当我們工会的領袖。我在工会干部大会上說过这一点，刚刚不久我还在济米那剧院說过这一点。党内理論上的爭論并不意味着互相反对，而是意味着互相影响。”（十二月三十日討論記錄第34頁；《列宁文集》第十八卷，第一部分，第71頁）

③ 这是向党的代表大会所作的講話。（《列宁文集》第十八卷，第一部分，第132頁）

同之处呢？

当布哈林不加小心地企图利用职工会討論作为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武器时，事情就变得可笑了。这里是列宁对布哈林在討論中的地位所作的估价：

“在这以前托洛茨基一直是斗争中的‘主角’。而现在布哈林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托洛茨基，并且完全‘盖住了’他。布哈林在斗争中創造了一个全新的局面，因为他所犯的錯誤，比托洛茨基所有錯誤的总和还要大一百倍。

“布哈林怎么走到这种同共产主义分离的地步的呢？我們知道，布哈林同志非常溫和，这是他的一个非常使人喜欢而且不能不喜欢的特点。我們知道，人們常常开玩笑地把他叫做‘軟蜡’。似乎就是說，任何一个‘无原則的人’，任何一个‘恶意煽动者’，都可以在这块‘軟蜡’上任意雕刻。加米涅夫同志在一月十七日的爭論中使用了（而他是有权使用的）这些带引号的尖刻詞句。然而，無論是加米涅夫或任何別的人，当然都不会想到用无原則的恶意煽动来解釋布哈林的行为，不会想到把一切归結于这一点。”^①

第九章 同列宁在共产国际里

但是，职工会問題是在我和列宁合作的年代里党和苏維埃国家生活中的唯一問題嗎？在我党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九二一年这同一年里，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展开了一次有关共产主义政策根本問題的深刻的斗争。这个斗争轉到了我們的政治局。不久以前我在政治局的一次會議上曾經简单地談到过这个斗争：

“当时共产国际在政策上有可能采取德国三月事件路綫的危

^① 參看《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中文版第34—35頁。——中譯者注

險。這就是說，企圖人為地製造革命形勢——像一位德國同志所說的那樣，給無產階級‘充電’。這種情緒在代表大會上很普遍。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得出的結論是，如果採取這條路線，共產國際一定會走向毀滅。在代表大會之前，我把對三月事件的印象寫信告訴了拉狄克同志，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不知道這封信。當時考慮到情況很難應付，既不了解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意見，而又得知季諾維也夫、布哈林和拉狄克一致支持德國的左派，我自然不願公開表示自己的意見，於是給拉狄克同志寫了一封信（以提綱的形式），請他把他的意見告訴我。拉狄克和我意見不一致。列寧聽到了這件事，派人來把我找去，他把共產國際的情況描述為包含着極嚴重危險的那種情況。對這個情況及其問題的估計，我們是完全一致的。

“在我們會談以後，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派人去找加米涅夫同志，用意是要保證自己在政治局中占多數。當時政治局中有五個人。加上加米涅夫我們就有了三個人，因此是多數。但是在我們出席共產國際的代表團里，一邊是季諾維也夫、布哈林和拉狄克三位同志，另一邊是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我和加米涅夫。附帶說一下，這兩方面曾經舉行過幾次正式會談。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當時說：‘那麼，我們是在組織一個新派別了’。在談判將要提出的決議草案的時候，我代表弗拉基米爾·伊里奇這一派。拉狄克代表季諾維也夫同志那一派。

“季諾維也夫：現在情況已經改變了。

“是的，情況已經改變了，可是順便說一下，當時季諾維也夫同志相當尖銳地指責拉狄克同志，說他在談判中‘背叛’了他那一派；這就是說，做了過大的讓步。

“這次鬥爭是遍及共產國際各黨的一次巨大鬥爭，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同我商議，如果代表大會投票反對我們，我們應該怎麼辦。我們向代表大會屈服還是不屈服？而它的決議可能是具有災難性的。我們商議的情形你們可以在我講話的速記記錄中找到。

当时，在列宁的同意下，我說：‘如果你們，代表大会，通过一項反对我們的決議，那么我相信你們会給我們留下足够的余地，以便我們将来用以为自己的观点辯护’。这个警告的意思是相当清楚的。但是，我應該补充說，由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領導，当时我們代表团內部的关系，仍然一直是很好的同志式关系。”^①

在列宁的同意之下，我在党的执行委員會上，為我們的共同立場进行了辯护，这次會議是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前召开的。我向所謂“左派”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赶到执行委員會来，下面就是他那时在会上說的話：

“我来这里是为了对貝拉·庫恩同志的講話提出抗議，他在講話中反对托洛茨基同志，而不是維護托洛茨基同志，他本来是應該这样做的，如果他想成为一个真正的馬克思主义者的話。……”

“拉波尔特同志是絕對錯誤的，托洛茨基同志发言反对是絕對正确的。……托洛茨基同志說那句話的时候，他是一千倍地正确。这里还有一位卢森堡的同志，他譴責法国共产党，因为它不抵制对卢森堡的占領。你們瞧，問題就在这里。他像貝拉·庫恩同志一样，认为这是一个地理問題。不，这是一个政治問題，托洛茨基同志反对……是完全正确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自己有責任从根本上支持托洛茨基同志所說的一切。……”諸如此类。

在列宁关于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整个講話里，一再強調他同托洛茨基之間的充分团結。

这里是我們团結的另外一个例子。一九二二年，在特一瓦加尼揚同志倡議之下，創辦了一个《在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的杂志。在第一号上我发表了一篇文章，論到党的两代，老的一代和新的一代在教育条件上的区别，还論到必須采用特殊方法对年青一代进行理論教育，以便保持党的理論和政治傳統。在这个新杂志的下一号上，列宁写道：

^① 政治局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會議速記記錄，第 12—13 頁。

“关于《在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一般任务，所有要点已由托洛茨基同志在第一、二期合刊上談过了，而且談得很好。我只想談几个問題，把杂志編輯部在第一、二两期合刊的发刊詞中所宣布的工作内容和綱領規定得更确切些。”^①

我們在这些根本問題上的一致是偶然的嗎？只有我們的一致这次碰巧被清楚地記載在报刊上这个事实才是偶然的。在絕大多數的情况下我們的團結一致是表現在實踐中的。

第十章 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农民問題上

布哈林完全由于要么是輕視要么是忽視农民而提出了他的反动口号“发财吧！”从此以后，他就认为他用一句話糾正了他过去的全部錯誤。更有甚者，他认为在农民問題上也同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以及其他有部分分歧的問題上一样， he 可以用同一个調子唱列宁同托洛茨基之間的分歧的老調。布哈林学派在这个問題上散布的蠢話和无聊話是数不清的。要一一駁斥它們就得写一本专著。我現在只提出最重要的几点來談談：

(一)在这里我不去說革命前确实存在的那些老分歧。我只想說，这些分歧已經被斯大林的代理人和小小的布哈林学派夸大、歪曲和丑化得面目全非了。

(二)在一九一七年的时候，我和列宁在农民問題上沒有任何分歧。

(三)《社会革命的土地綱領》的“誕生”过程是列宁与我充分一致之下完成的。

(四)我最初閱讀的列宁所制定的有关土地問題的法令是用鉛笔写的。当时沒有任何分歧的迹象。我們是一个思想。

(五)农民問題在粮食政策中显然占有不小的地位。像馬尔丁諾夫这种无聊的人，正在說粮食政策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政

^①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中文版第198頁。——中譯者注

策^①。不，这是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我是同列宁密切合作参加制定这个政策的。当时没有一点分歧的影子。

(六)以中农为基础的路綫是在我最积极地参加之下确定的。政治局的委員們都知道，在斯維尔德洛夫死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首先想到的就是任命加米涅夫同志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选择一个“工农”人物的建議是我提出的。加里宁同志的名单是我提出的。他的“全俄之长”的头銜也是我給起的。所有这一切当然是些瑣事，不值得总是停留在这上面。但是在目前，这些瑣事，这些情况对于历史伪造者來說，却是致命的证据。

(七)我們全部的軍事政策和軍事組織归結起来，十分之九是工人对农民的关系問題。反对小資产階級游击习气和手工业方式的軍事政策是我在列宁的密切合作之下完成的。

(八)一九二〇年初^②，我根据自己对农民經濟情况的分析，向政治局提出了一系列类似新經濟政策的措施的建議。如果“不关心”农民是不可能有什么建議的。

(九)我已經說过，职工会問題的討論是为了寻找一条走出經濟上的死胡同的道路。新經濟政策这条出路是全体一致制定的。

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在无可怀疑的文件基础上加以证实。将来某一个时候是会得到证实的。这里我只作两点引证。

在回答我們对富农、中农和貧农的态度以及列宁同托洛茨基之間在农民問題上的所謂分歧的問題时，我在一九一九年写道：

“在苏維埃政权的中心里，在这个問題上过去或現在都不存在分歧。反革命分子的事业是越来越沒有希望了，他們只有欺騙工人群众，硬說將有一場所謂冲突从内部分裂人民委员会。”^③

关于这个問題，列宁在回答农民古洛夫的問題时，写了下面这些话：

① 見馬尔丁諾夫发表于一九二三年十一月《紅色处女地》上的文章。

② 在列宁提出新經濟政策并得到通过前一年。——英譯者注

③ 《消息报》，一九一九年二月七日。

“在二月七日的《消息报》上，登載了农民古洛夫的一封信，他提出了我国工农政府对待中农的态度問題，并談到一些謠言，如列宁同托洛茨基不和，恰恰在中农这个問題上他們之間有巨大分歧。

“托洛茨基同志在二月七日的《消息报》上已經作了答复。托洛茨基同志說，关于他同我有意見分歧的謠言，是地主和資本家或者是有意或无意帮助他們的人所散布的无耻謊言。从我这方面來說，我完全证明托洛茨基同志的声明是合乎事实的。他同我之間沒有任何分歧，在中农問題上不仅托洛茨基同我沒有分歧，而且我們两人所加入的共产党全党都沒有分歧。

“托洛茨基同志在自己的信中，詳細而清楚地說明了为什么共产党和由苏維埃和共产党員选出的現在的工农政府不把中农当作自己的敌人。我万分同意托洛茨基所說的一切。”^①

在这里我們看到了同样的事实。这个謠言最初是白卫分子散布的。現在斯大林—布哈林学派抓住了这个謠言，把它发展了，并且处心积虑地加以宣傳。

第十一章 我的軍事工作

以我从一九一八年春天开始的軍事工作为主题，在斯大林指导下，进行了重写历史的尝试。事实上，为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或者更老实地說，为了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进行了要重写全部內战历史的尝试。

如果在这里重述創立紅軍的故事和列宁同这个工作的关系，那就等于写出內战的历史。目前，古謝夫之流^②正在写。以后还有一些人也要来写。我只好限于談談两三件有文件证明的例子。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中文版第523頁。——中譯者注

② 古謝夫以前是托洛茨基手下的一个軍事工作人員，东綫革命軍事委员会的一个委員。——英譯者注

当喀山被我們的軍隊收復時，我收到了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賀電，當時他的病體正在迅速痊癒中：

“我熱烈祝賀紅軍的輝煌勝利。願它成為工人和革命農民聯盟徹底打垮資產階級，粉碎剝削者一切抵抗，保證世界社會主義勝利的一個先聲。工人的革命萬歲。

列寧

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九日”^①

列寧電報中高度滿意的口氣——“我熱烈祝賀”——說明了他認為收復喀山是意義重大的，事實也確乎如此。喀山的收復是一次最初的而且在本質上是決定性的考驗，它考驗了工人和革命農民聯盟的力量，它考驗了黨在帝國主義戰爭所造成的經濟破壞和可怕的廢墟中創建一支戰鬥的革命的紅軍的能力。創建紅軍的方法在收復喀山中受到了戰火的考驗，列寧深知這次考驗的意義。

在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上，有一批軍事代表曾經批評軍事政策。斯大林之流和伏羅希洛夫之流最近一直在說，似乎我不敢出席代表大會聽取這些批評。這說法距離事實是多麼遙遠！下面是中央委員會關於我在代表大會前夕動身去前綫的問題的決議：

中央委員會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六日會議記錄摘錄。出席人員：列寧，季諾維也夫，克列斯廷斯基，弗拉基米爾斯基，斯大林，施密特，斯米爾加，捷爾任斯基，拉舍維奇，布哈林，索科里尼科夫，托洛茨基，斯塔索娃諸同志。

議題：

(十二)從前綫來的一些同志得知要領導人立刻回前綫的決議之後，對這項決定的正確性提出了問題，這項決定可能被前綫組織解釋為中央政府不願意傾聽軍隊的呼聲。有些人甚至把它解釋為一種手段，因為托洛茨基同志的離會和不許軍隊代表與會，這就使得軍事政策問題即使提出來也沒有用處。托洛茨基同志對於把

^① 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八卷，中文版第76頁。——中譯者注

中央委員會的決議解釋為手段一事表示抗議，他並且要求注意由於從烏發和西方戰綫更遠處的撤退而引起的極端嚴重的局勢。他堅持離去。

決議：

(1) 托洛茨基同志立刻動身回前綫。

(2) 索科里尼科夫同志將在前綫領導人的會上宣布撤銷要他們離去的命令，現在決定，那些認為自己必須在前綫的同志可以立刻離去。

(3) 軍事政策的問題將列為代表大會日程的第一項。

(4) 按照他自己的要求，弗·米·斯米爾諾夫同志將留在莫斯科。

在這裡你們可以看到那時黨的制度的鮮明實例。所有那些因軍事政策而**攻擊**中央委員會的人，特別是軍事反對派的領袖弗·米·斯米爾諾夫，都被允許留下參加代表大會，儘管前方的局勢很困難。那些**支持**中央政策的人則在代表大會開幕之前被派回前綫。現在事情的做法是正相反的。

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軍事部分的記錄至今沒有發表。其中載有列寧的發言，他堅決維護我在中央委員會指導下所制定的政策。為什麼不發表？因為這些記錄將把斯大林和古謝夫在內戰時期的錯誤致命地暴露出來。

斯大林曾經盡力傳播把一九一九年初政治局因東綫問題而引起的軍事分歧誇大得荒誕可笑的敘述。分歧的實質是這樣的：我們是應該繼續向西伯利亞前進呢，還是應該固守烏拉爾而把我們的全部力量投入南方戰綫，以便解除莫斯科的威脅呢？在一段時間里，我是傾向第二個計劃的。許多軍事工作人員，其中有斯米爾加，拉舍維奇，伊·尼·斯米爾諾夫，科·伊·格倫斯坦等人，他們都贊成第一個計劃。第一個計劃被通過了，並且獲得了美滿的結果。在這次分歧里沒有任何根本問題。這完全是實際問題。這次進軍的嘗試說明了，高爾察克的軍隊已完全瓦解。向西伯利亞進

軍是完全成功的。

軍事工作是严厉的工作。进行这个工作不能不使用压力、压制及其他强制手段。許多人的自尊心受到损伤——这常常出于必要，但有时也出于錯誤。許多不滿出現了，当然有些不滿是完全正当的。当关于东方战綫的分歧发生，中央委员会决定調換总司令的問題时，我向中央委员会提出辞去軍事和海軍事务人民委員的职务。在这同一天，一九一九年七月六日，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項決議，它的主要部分如下：

“中央委员会組織局和政治局从各方面考虑了托洛茨基同志的陈述之后，所达到的一致結論是，不能接受他的辞职。

“中央委员会組織局和政治局将尽他們的一切可能使南方战綫的工作对托洛茨基同志更順利，对共和国更有成果，南方战綫工作是托洛茨基同志自己所选定的，这是目前最困难、最危險、最重要的工作。作为国防人民委員、革命軍事委员会主席、以及南方战綫革命軍事委员会委員，协同他自己所提名并由中央委员会所批准的南方战綫人民委員叶哥罗夫，托洛茨基同志可以自由行动。

“中央委员会組織局和政治局給予托洛茨基同志以充分的权力，他可以采取任何方式去改正他认为必須改正的有关軍事問題的政策，而且可以要求提前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如果他希望这样做的话。”

在这个決議上签字的是：列宁，加米涅夫，克列斯廷斯基，加里宁，謝烈布利雅柯夫，斯大林，斯塔索娃。这个決議本身已經說明了一切。它結束了分歧，工作按照应有秩序向前进行。

附帶在这里談一談，根据速記記錄，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九月八日政治局和中央監察委员会主席团的联席會議上断言，中央委员会当时“禁止”我插手南方战綫。对于這個問題，上述的決議提供了足够詳尽的回答。

但是关于东方战綫的分歧是唯一的那樣子的分歧嗎？絕對不是。

在反对邓尼金的战略计划上有过分歧。在彼得格勒問題上有过分歧——把彼得格勒放棄給尤邓尼奇呢，还是保卫它？在向华沙进军^①的問題上和在我们撤退到明斯克以后下一个战役的問題上有过分歧。这一类的分歧都是产生于实际斗争并且在斗争中解决的。

关于南方战线問題，必要的文件已經載在我所著的《革命是怎样武装起来的》^②一书里面。

当尤邓尼奇向彼得格勒推进的时候，列宁有一个时候认为不值得试图保卫这个城市，并且认为我们应该把防线移近莫斯科。我表示反对。季諾維也夫同志支持我，我想还有斯大林同志也支持我。十月十七日，列宁通过直接线路打电报給我，我当时在彼得格勒。这封电报的内容是：

“托洛茨基同志：

“昨夜我是在国防委员会度过的，我已把他們的決議用密碼拍发給你。

“你可以看到，你的计划已經通过了。但是向南撤退彼得堡工人的意見沒有被否決（他們告訴我，你同克拉辛和李可夫一起发展了这个意見）。在必要性出現之前談這個問題会分散对战斗的注意。

“包圍和切断彼得堡的计划当然要求相应的政策改变，这你会就地进行的。

“在当地执行委员会的各部門里指定一个人收集苏維埃的公文和文件，准备撤退。

“附上一篇宣言，这是国防委员会批准了的。我很匆忙，宣言不太好。你最好把我的名字放在你的名字后面。

“敬礼！

列宁”

① 托洛茨基反对向华沙进军，列宁贊成这个计划。以后列宁說那时他錯了，托洛茨基是对的。——英譯者注

② 第二卷，第一册，第301頁。

这一类的事情是很多的。它們在一定的時間里有很大实际意义，但是爭論却没有根本意义。这不是关于原則的斗爭，而是为在一定時間和地点击退敌人而制訂最好計劃的問題。斯大林之流和古謝夫之流試圖重写內战的历史，他們是不会成功的。

第十二章 斯大林分子的最卑鄙的謊言

在斯大林分子反对我的运动中，最卑鄙的部分是，他們誣蔑我曾經下命令枪杀共产党人。这个誣蔑是我們的敌人，所謂“新聞处”曾經傳播过的。这就是，白軍政治部門曾經尽力在我們紅軍士兵中散发傳单，指責紅軍司令部，特别是托洛茨基，杀人成性。斯大林的代理人現在正走着同样的道路。

姑且假設这个謊言是真实的。那么为什么斯大林、雅罗斯拉夫斯基、古謝夫，及斯大林的其他代理人，在內战过程中一言不发呢？現在出自斯大林代理人之口的这个为时过晚的“揭发”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

“工人們，农民們，和紅軍兵士們，党欺騙了你們，因为它曾經告訴你們，軍隊的司令托洛茨基是执行党的意志和政策的。党在它的无数关于托洛茨基的工作的文章里，在它历届代表大会和苏維埃代表大会的決議里，欺騙了你們，支持了托洛茨基，并且向你們隱瞞了像枪杀共产党人这一类的事实。列宁参加了这个欺騙，他曾經坚决地支持托洛茨基的軍事政策。”

这就是斯大林的为时过晚的“揭发”的真正意义。被他败坏名誉的不是托洛茨基，而是党，是党的領導。他破坏群众对一切布尔什維克的信任。因为，如果在过去，在列宁和他的基本核心同事領導着党的时候，都有可能把惊人的錯誤甚至罪行隱瞞起来，那么当現在，当中央委員會全体人員的威信已无限低下的时候，你还能指望什么呢？举例說罢，比如雅罗斯拉夫斯基在內战久已过去之后的一九二三年曾經唱过过分贊美托洛茨基、贊美他的忠誠、贊美他

献身工人阶级事业的革命精神的颂歌，那么今天有思想的青年党员要怎么說呢？他一定会問自己：“到底雅罗斯拉夫斯基什么时候对我說的是謊話——是他把托洛茨基捧上天的时候呢，还是現在給托洛茨基抹灰的时候呢？”

这就是斯大林的真正工作，也是他那些正在努力为他創作新傳記的代理人的真正工作。^①

众所周知，古謝夫特別致力于从文字上修改我們的历史。他甚至写了一本标题是《我們在軍事上的分歧》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最先出現的就是关于枪杀共产党人（不是逃兵，不是叛徒，而是共产党人）这种恶毒的流言蜚語。

古謝夫也像其他許多人一样，他倒霉的地方就在于，他把同一个事实和問題写了两次，一次在列宁时期，一次在斯大林时期。

下面是古謝夫在第一次写的东西：

“托洛茨基同志的到达（喀山附近）使局勢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托洛茨基同志的車厢停在斯維亞日克車站的岔道上，在这个車厢里，是胜利的坚定意志，是首創精神，是軍隊各方面工作的干劲。从最初的一天起，在这个成了政治部和人民委員部总部的、挤滿无数部队的铁皮車的车站里，和在十五俄里以外的团队里，每一个人都感到一个偉大的轉折点来临了。

“这首先出現在紀律方面……在这个游击习气，漫无紀律，和

① 斯大林关于米海依尔·罗曼諾夫事件的“揭发”也是这样的。关于这件事，斯大林实质上向党和共产国际說的是什么呢？他說：“关于加米涅夫，中央委员会欺騙了你們十年。《真理报》編者刊登了一个假否认。列宁欺騙了党。我，斯大林，参与了这个騙局，但是既然現在加米涅夫在实际观点上同我分歧，我决定揭发这整个騙局”。斯大林的大部分“揭发”，不可能得到党和群众的相信。唯一的可能是他們将减少对党的領導——昨天，今天和明天的——的信任。我們必須反对斯大林和斯大林分子而重新取得这种信任。

（这里涉及的事情是：加米涅夫从西伯利亚拍給米海依尔大公爵一封賀电，当时傳說大公爵将在俄国建立君主立宪制。有些人說，电报上的签名是加米涅夫任主席的一个會議，是在他离場后別人代他签上去的；另外一些人說，是他自己签的；还有一些人說，根本没有这么一封电报。——英譯者注）

小資產階級自我中心的時期，托洛茨基同志的嚴厲方法是特別地和超乎一切地有效和必要。你用說服的方法什麼事也做不了。並且，當時也沒有時間進行說服。在托洛茨基同志在斯維亞日克停留的二十五天的過程里，完成了巨大的工作。組織渙散和士氣敗壞的第五軍的團隊變成了富於戰鬥精神的部隊，並且作好了收復喀山的準備。”^①

從內戰中生活過來、還沒有失掉記憶力的每一個黨員都會說——至少向他自己，如果他不敢大聲說出來的話——，像古謝夫所寫的這類贊詞，你可以從出版物中引證幾千條。

在這裡我只限於引證最權威的贊詞。高爾基在回憶列寧的文章中寫道：

“用拳頭敲着桌子，他〔列寧〕喊道：‘指給我另外一個這樣能干的人，他能夠在一年之內組成一支几乎是模範的軍隊，就是模範軍隊，而且博得了軍事專家的尊敬。我們有這樣一個人。我們有一切，你將會看到奇蹟。’”^②

按照高爾基的記述，列寧在同一次談話中說：

“是的，是的，我知道。關於我同他的關係，他們說了一大堆謊話。好像，他們說了一大堆謊話，特別關於托洛茨基和我。”^③

是的，關於列寧同托洛茨基的關係，他們說了一大堆謊話。但是，你怎能將過去那種可憐的手工業方式的說謊同今天正式組織起來的、全俄和全世界規模的說謊相比呢？過去的說謊者是黑色百人團、白衛分子、一部分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現在採用這個方法的是斯大林集團。

① 《無產階級革命》，第二二五號，一九二四年。

② 馬克辛·高爾基：《弗拉基米爾·列寧》。

③ 同上。

第十三章 列宁的空白命令

一九二〇年一月十二日，列宁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布尔什维克党团會議上說道：

“假使說我們战胜了邓尼金和高尔察克，那是因为我們的紀律优于世界上所有的資本主义国家的紀律。托洛茨基同志采用了死刑，我們將支持他。他采用死刑是通过共产党人的自觉的組織和宣傳的道路。”

列宁为維護我在他充分同意之下所执行的軍事政策而作的其他許多講話，都不在我的手边。特別是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一些代表关于軍事問題的會議的記錄，始終沒有发表。为什么不发表这个會議記錄呢？因为列宁在这个會議上全力反对斯大林的同事們，这些人現在是这么卖力气地在伪造历史。

但是我手边有一个文件，它抵得过一百个。当雅罗斯拉夫斯基在奥尔忠尼启澤同志的反对之下发动了一場反对我的恶毒陰謀的时候，我曾經在中央監察委员会主席团里談到过这个文件。一九二七年八月，在上次联席全会上，当伏罗希洛夫站在雅罗斯拉夫斯基一边的时候，我又引证过这个文件。

列宁自己主动地給过我一張空白公文紙，下端写着这样几行字：

“同志們，我知道托洛茨基同志的命令的严格性质，我相信，絕對地相信他的命令的正确、得策和为了我們事业的必要，因此，我对于他所发布的命令給以充分的支持。

弗·烏里揚諾夫(列宁)”

关于這張空白公文紙的用意，我向中央監察委员会主席团这么解釋：

“当他給我這張在下端写着这几行字的空白公文紙的时候，我感到迷惑不解。他說：‘我已經聽說正在出現一些針對着你的謠

言，說你枪杀共产党人。我給你這張空白公文紙，声明我支持你的决定，并且这种公文紙你要多少我就給你多少，你可以在這張紙上写你要写的任何决定，我的签字是現成的。’这是在一九一九年七月。既然关于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关系，而更重要的是关于他对我的态度，現在到处傳布着流言蜚語，那么我要問，还有誰能拿出这样一張有列宁签名的、事先批准尚未作出的决定的空白公文紙給我看看。通过这些决定，不仅可以左右个别共产党人的命运，而且常常可以左右一件远为大得多的事情。”

第十四章 关于劳动軍事化的謊言

众所周知，馬尔丁諾夫^①坚持說，內战时期的共产主义和軍事共产主义是“托洛茨基主义”。这个理論現在广泛流行。建立产业軍、劳动軍事化以及其他一些措施，正如食物配給一样，都是由于那个时期的条件所必然产生的，但是这些都被那些市儈和卑鄙无聊的人描写成“托洛茨基主义”的表现。在这些問題上列宁是站在哪方面呢？

在苏維埃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組織會議上，我們爭論过領導中心的命令主义。我在講話里指出，命令主义会窒息我們的工业，集中并不是一个絕對的原則，應該在实际中貫徹地方主动性和中央領導之間的必要協調。列宁在他的講話里着重指出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見，他說：

“最后，我完全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这一意見：这里有人錯誤

^① 馬尔丁諾夫是俄国社会民主党老的領袖之一。在一九〇一年在倫敦召开的最初的党代表会上〔中譯者按——在倫敦召开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時間应为一九〇三年。〕，他是列宁的主要反对者，此后二十年間他是孟什維克的右派領袖。一九二三年，馬尔丁諾夫突然宣称他改变了思想，他同意布尔什維克。他回到俄国即被接收入党，在列宁死后他被任命为《共产国际》杂志的編輯。在这个地位上，他成为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政策上的主要指导者或理論辯护者之一。——英譯者注

地把我們的爭執說成是工人同农民的爭執，想把這個問題同无产階級專政問題扯在一起。”^①

“我們的爭執”指的是那些拖得很久的爭執，在這些爭執里，列寧和托洛茨基是一邊，李可夫、托姆斯基、拉林還有其他人是另一邊。斯大林同志在這些爭執里像在其他許多爭執里一樣，始終在幕後進行活動和等待時機。

在一九二〇年一月十二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幹部會議上，列寧說到我們同李可夫、托姆斯基及其他人之間的爭論：

“這場令人厭惡的官僚式的爭吵是誰挑起來的？不是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提綱里絲毫沒有這種東西。是洛莫夫，李可夫，和拉林這幾位同志。他們每一個人都占着最高的地位。都是全俄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團委員。他們中間還有委員會的主席，他的頭銜非常多，我如果要一一列舉，就會喪失我的十分鐘講話時間的一半。所以，無須說，對這個會議他是表現了極大的仁慈、謙虛和明顯的興趣，等等……。李可夫等人跑到這裡來掀起了一場咬文嚼字的爭辯。托洛茨基同志提出了一個新問題的論點，而他們掀起了關於蘇維埃第七次代表大會的官僚式的辯論。當然，我們知道，洛莫夫，李可夫，和拉林諸同志在他們的糊塗透頂的文章里並沒有直接這樣說。正如這裡有一位發言人所說：‘你們不要沉溺在關於蘇維埃第七次代表大會的辯論里面。’蘇維埃第七次代表大會發生了一個錯誤。那麼在這個會上改正那個錯誤，並且停止在集中和分散的問題上嚼舌頭。李可夫同志說，必須談集中和分散，因為托洛茨基沒有提到這一點。這位先生認為，坐這裡的人都愚笨到這種程度，以致連托洛茨基提綱的開頭幾行也忘了，它們說，‘經濟管理將採取一項總計劃’，等等。無比謙虛的李可夫，洛莫夫，還有拉林，你們會念俄文嗎？讓我們回到我們都只有十六歲的時候，再在集中和分散上嚼舌頭吧。這就是全俄國民經濟委員會的委員和主席團

^① 參看《列寧全集》第三十卷，中文版第 213 頁。——中譯者注

的領導工作嗎？這樣的胡說八道和可憐的廢話——在這上面浪費時間是一件可羞和丟臉的事！”

下面是：

“戰爭使我們獲得了一種最大限度地實行紀律和把幾十萬人——同志——集中起來的能力，這些人為拯救蘇維埃共和國而死去。如果沒有這種能力，我們就會完蛋。”

我要指出，這篇講話是在列寧研究院手中，至今沒有發表，僅僅因為它不利於黨現在的欺騙者。把一部分列寧的理論遺產向黨隱瞞起來，這是背離列寧路線這一行動的必要部分。上面所引的列寧講話將來會發表的，這就是當要免除李可夫的職務的時候。

第十五章 我同列寧在工業工作上的一致

關於我在鐵道部的工作，列寧在蘇維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說：

“同時，你們已經從葉姆沙諾夫和托洛茨基兩位同志的提綱中看到，我們在恢復運輸方面制訂了一個為期多年的切實計劃。第一〇四二號命令預計為五年，在五年當中我們就能恢復我們的運輸業，減少破爛機車的數目；我要強調一下，在提綱第九條里指出我們已經把這個期限縮短了，這一點也許是最困難的事情。

“當預計許多年的大計劃出現的時候，往往會有一些懷疑分子，他們說：我們哪里還能去預計許多年的事情，能完成現在要做的事情就不壞了。同志們，必須善於把這二者結合起來；沒有一個長期的旨在取得重大成就的計劃，就不能進行工作。運輸工作的明顯改進表明，實際情況正是如此。我提醒你們注意第九條的一個地方，那里說，恢復運輸業的期限原定為四年半，但是這一期限已經縮短，因為我們正在超額完成工作，期限現已確定為三年半。其他落后經濟部門也應當這樣工作。”^①

我要在這裡指出，在發布了第一〇四二號命令以後一年，在捷

^① 參看《列寧全集》第三十一卷，中文版第463—464頁。——中譯者注

尔任斯基同志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关于下一步工作的根本原则”的命令里，我們可以讀到下面的話：

“由于降低第一〇四二号命令和第一一七五号命令——有计划的工业工作的第一次的光輝实验——所規定的定額是暫时的，又由于目前的燃料危机……，因此必須采取措施支持和恢复設備和車間……。”

关于企图关闭普梯洛夫工厂的問題^①：在李可夫同志一九二七年十月——这就是說，在这个問題发生过四年以后——写的論文里，又出現了关于我要求关闭普梯洛夫工厂的故事。順便說一下，在这件事情里，也像在其他許多事情里一样，李可夫同志的行动是很不小心的，他搜集了不利于自己的材料。

事实是，关闭普梯洛夫工厂的建議是李可夫一九二三年初自己在政治局提出的，他当时是国民經济委员会的主席。李可夫解釋說，普梯洛夫工厂在十年过程中是不需要的，人为地支持普梯洛夫工厂对其他工厂会产生有害的影响。政治局——我和其余的人都在內——把李可夫引证的資料当成真貨。我投票贊成李可夫同志提出的关闭普梯洛夫工厂的建議，斯大林也投票贊成。季諾維也夫同志当时在休假。他反对这个決議。这个問題在政治局重新提出，決議被推翻了。李可夫是国民經济委员会的主席，这件事情的主动权完全在他手里。他在短短的四年之后竟敢把自己的“罪恶”推在我身上，他的有恃无恐一定到了很大程度。但是，不要着急。当撤换李可夫的那天到来时，这个事实必然以新的形式出現。你們不用等很久。

他們欺騙党，編造說，列宁怎样要把托洛茨基作为粮食供应人民委員派送到乌克兰去。在这个問題上他們把事实混淆和歪曲得令人无从辨認。我在中央委员会的指示下，作过許多次这样的旅

^① 有一万人在普梯洛夫工厂里做工。当托洛茨基为一般工人要求較好的条件时，有人硬說他要求关闭普梯洛夫工厂，企图通过这个說法使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反对托洛茨基。——英譯者注

行。在列宁的充分同意之下，我曾經到乌克兰去改善頓巴斯煤炭工业的組織工作。在列宁的充分同意之下，我曾經作为产业軍委员会主席在烏拉尔工作。列宁曾經坚持要我去乌克兰两个星期（两个星期！），去改善粮食供应的組織工作，这完全是真的。我和拉可夫斯基同志通了电话，他說，不用我帮助，他們已經采取了必要措施以保证工人中心的粮食需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始坚持要我去，但是以后放棄了这个意見。这就是这件事的全部情况。这是列宁认为在一定时期內最重要的一个实际斗争問題。

这里是列宁关于我去頓巴斯的問題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苏維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說的話：“由于派出了一个由托洛茨基同志担任主席的全权委员会到頓巴斯去工作，我們每月从頓巴斯得到的煤已由二千五百万普特提高到五千万普特。該委员会通过决定，把負責的和有經驗的工作人員派到那里去工作。現在已派皮达可夫^①同志到那里去领导。”^②

和这个問題有关的情况：皮达可夫同志后来被斯大林用阴谋从頓巴斯排挤出来。列宁认为这是对煤炭工业的严重打击，在政治局里批評了这件事，并且公开反对斯大林的瓦解活动。

“我們已經取得不少成績，这一点頓巴斯的例子表現得特別清楚。頓巴斯有許多同志无限忠誠地、卓有成效地工作着，如大工业方面的皮达可夫同志。”^③

“在‘中央煤炭管理局’工作的，都是些不仅絕對忠誠而且确实博学多能的人，甚至說他們是有天才的人也不过分，因此中央委员会把注意力集中到那里。……我們中央委员会还算有些經驗，一致决定不撤換領導人員。……我問过乌克兰的同志，并且特地問过奥尔忠尼启澤同志，中央委员会并責成他到那里去了解情况。显

① 皮达可夫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八年的整个时期內是反对派的一个成員，同托洛茨基立場一致。他最近在一份有保留的悔过书上签名。——英譯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中文版第462頁。——中譯者注

③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中文版第140頁。——中譯者注

然那里有过阴谋，情况一塌糊涂，如果党的历史工作者来研究这个问题，就是费十年工夫也搞不清楚。结果实际上不顾中央一致通过的指令，把这批人撤换了。”①

所有老的政治局委员都知道——斯大林比谁都清楚——，列宁那些说到阴谋反对忠诚、博学和天才的顿巴斯领导人的措词尖锐的话，指的是斯大林阴谋反对皮达可夫。

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苏维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列宁写了一些关于工业建设根本问题的论文。我记得我回答列宁说，这些论文很好，只有一点不足的地方，就是关于专家问题。（我用很少几句话指出了这个问题的要点。）同一天我收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下面这封信：

“绝密

“托洛茨基同志：

“我和加里宁同志一起正参加一个非党员的会议。他劝我作一个关于我所提出的决议案的简短讲话（对这个决议案你提出了关于专家问题的补充，这完全正确）。

“星期三你是否可以在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就这个决议案作一次很短的讲话？

“你的军事报告一定准备好了，那么星期二你就没有事了。

“我没有可能在代表大会上作第二次讲话。写给我几个字，或者打个电报给我。如果你同意，这再好没有了。并且可以通过电话由政治局投票批准。

列宁”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上，我们是这样地完全一致，以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可以授权我来代替他讲这些问题。我记得我通过电话说服他亲自来讲这件重要的事情，只要他的健康允许的话。最后就是这样做的。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中文版第264页。——中译者注

第十六章 列宁患病以后

有关列宁生命最后一段时期的伪造和杜撰是特别多的。按說斯大林对这段时期應該极其小心，因为这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于斯大林已經得出了一定的最后的結論。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健在期間的政治局內部历史，当然是很难詳細說明的。当时沒有速記記錄，只把決議写下来。所以这就便于搬出一些零零碎碎的、完全沒有意义的插話^①，加以歪曲，加以夸大，或者干脆杜撰一些“分歧”，其实根本不存在任何分歧的迹象。

当然，政治局里經常发生实际問題上的分歧，其中也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我之間的分歧。全部的問題在于这些分歧在一般工作中占什么位置？在分歧这个題目上，斯大林集团毫无顾忌地散布恶意的傳說，这些傳說一接触事实即被粉碎，并且最后会使斯大林自食恶果。

要駁斥这些傳說必須首先提到列宁患病时期——更确切地說，两次严重发病之間の时期，这时医生允許列宁参加工作，許多

① 愚蠢到可耻程度的一个傳說是关于“布谷鳥叫了”，据說这指的是我过去的“悲观主义”。当道理和事实把斯大林和布哈林迫得无路可走的时候，他們就拿出“布谷鳥叫了”这最后的一手。“布谷鳥叫了”是从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新經濟政策初期的一次談話中引用来的。在这个困难时期，一方面从工人政府已經很有限的資源的浪費情形看，同时另一方面从私人資本迅速积累的可能性看，我国有限資源的分配情形使我感到了严重的危險。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止一次地談到这个問題。为了檢查我国工业发展的进程，当时我組織了所謂“莫斯科联合托拉斯”。有一次我和列宁談話，提到了某些銷售混亂的严重例子，我大概說过这样的話：“如果我們这样經營事情，布谷鳥的叫声很快就要成为我們的丧钟了。”大概就是这一类的話。像这样的話我們每一个人都重复了不止一次。列宁就曾經惊呼过許多次：“事情如果这样子，我們准完蛋。”这是語气很强的話，但絕不是“悲观的”預言。

这大体上就是“布谷鳥叫了”的历史，斯大林和布哈林想从这里占到便宜去补偿他們在中国革命，英俄委员会，經濟领导，和党的制度上所欠的債。

重要問題是用通訊方式來決定的。在這些信件里——這就是說，在無可懷疑的文件里——可以看到中央委員會里面出現了什麼有爭論的問題，誰和誰有分歧，同時也可以部分地看到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對一些個別同志的態度。我將引用少數幾個例子。

對外貿易壟斷制

一九二二年末，中央委員會在對外貿易的壟斷制問題上發生了根本性的分歧。在追溯中我不想誇大它的意義；但是在中央委員會里圍繞着這個問題所形成的政治結合却是很能說明問題的。

在索科里尼可夫同志的首先提議之下，中央委員會通過了一個意味着破壞對外貿易壟斷制的決議。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堅決反對這個決議。列寧從克拉辛那里得知我沒有出席中央委員會，並且我表示反對這個決議，於是列寧就同我通信。這些信件以及列寧關於對外貿易壟斷制問題給政治局的信都至今沒有發表。加于列寧遺著之上的檢查制度現在是嚴酷無情的。列寧所寫的片紙只字，只要它們直接或間接地有損於反對派，你們就發表。但是具有巨大根本意義的文件，只要它們直接或間接地有損於斯大林，你們就不發表。

現在我引用列寧有關上述問題的一些信件：

“托洛茨基同志：

“我把克列斯廷斯基的來信送給你。請立刻回信。你同意嗎？我將在全會上為壟斷制問題而鬥爭。你呢？”

你的列寧

“附言：閱後儘快送還。”

“致弗魯姆金和斯托莫尼雅科夫^①，抄送托洛茨基：

“鑒於我的病情加劇，因此我將不能出席全會。我意識到我現在的舉動在同你們的關係上是很尷尬的，甚至比尷尬還壞，但是雖

^① 這兩個人都不是中央委員會的委員，但是列寧和他們一起“陰謀”反對中央委員會的多數。

然如此，我却只能这样。

“今天我收到托洛茨基同志一封信，也许除了最后说到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几行之外，信中全部主要内容我都同意。我将要写信给托洛茨基，告诉他我同意他的意见，同时要求他鉴于我的病状而承担起在全会上为我的立场辩护的责任。

“我想应该分三个部分来进行辩护：第一，维护对外贸易垄断制这个根本原则——充分地 and 最后地肯定这个原则；第二，把阿维涅索夫所提出的实现垄断制的实际计划，委托一个委员会去作细节的考虑；这个委员会应该有不少于百分之五十的委员是来自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的；第三，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问题应该另外研究。另外，我认为我和托洛茨基之间将不会有分歧的，只要他只限于要求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发展国家工业的前提下进行工作时应该对于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所有各方面的活动提出自己的意见。

“我希望今天或者明天再写信给你们，并且把我将在中央全会发表的关于上述问题的实质的声明送给你们。无论如何，我认为，这个问题是这样地重要，假使我不能取得全会的同意，我将把它提到党代表大会上去，并且在此之前，在本届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我们党团中宣布现存分歧。

列宁

口授，勒·福·记录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致托洛茨基同志，抄送弗鲁姆金和斯托莫尼亚科夫；

“托洛茨基同志：

“我已经收到你对于克列斯廷斯基的信和阿维涅索夫的计划的评论。我认为，我们是完全一致的，并且我认为，国家计划委员会问题在一定情况下不包括（或者推迟）国家计划委员会是否需要行政权的争论。

“无论如何，我恳切地要求你把在即将召开的全会上，捍卫我

們关于必須无条件地保持和加强对外貿易壟断制的共同意見这个任务担当起来。鉴于上次全会通过一項完全同对外貿易壟断制背道而馳的決議，而且既然在这个問題上是不能屈服的，因此我想，正如我在給弗魯姆金和斯托莫尼亚科夫的信中所說的，如果我們失敗了，那么我們必須把这个問題提到党代表大会上。为此，我們需要在本屆苏維埃代表大会的党团內，作一次关于我們的分歧的簡短說明。如果我能够，我将要写这个說明；如果你願意做这件事，我会非常高兴。在这个問題上动摇就会給我們巨大的損害。反对壟断制等于指責我們机构无能。我們的机构是有无能的地方的，但是，为了机构的无能而取消壟断制，无异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潑掉。

列宁

電話口授，勒·福·記錄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托洛茨基同志：

“我現在把今天收到的弗魯姆金的來信送給你。我也認為徹底地解決這個問題是絕對必要的。如果有人擔心這個問題將使我激動起來，因此對我的健康會有壞影響，那麼我認為這想法是完全錯誤的。因為，如果拖延不決而使我們的政策在一個根本問題上動搖不定，那我的激動就會在一萬倍以上。所以我提請你注意附上的信件，並且誠懇地要求你贊成即刻討論這個問題。我確信，如果我們有失敗的危險，那麼就在黨代表大會之前失敗，然後立刻提到代表大會的黨團上去，這比在代表大會之後失敗要有利得多的。這樣一種妥協或許會被接受：現在通過批准壟斷制的決定，但是仍然把這個問題提到黨代表大會上去，而且立刻達成這個協議。照我看來，在任何情況下，只有這樣的妥協是對我們有利的。

列宁

電話口授，勒·福·記錄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托洛茨基同志：

“我认为我們已經达到了充分的一致。我要求你在全会上宣布我們的一致。我对于我們決議案的通过抱有希望，因为一部分在十月份投反对票的人現在已經部分地或全部地同意我們这方面了。假使我們的決議案竟然不能通过，那么我們將提給苏維埃代表大会党团，并且宣布我們要把這個問題在党代表大会上提出。

“如果发生上述情况，請通知我，我将送出我的声明。如果這個問題被从目前全会的日程上取消（我料想不至于如此，当然，对于这种情形，你必須用我們共同的名义全力抗議），那么我认为我們必須照样提給苏維埃代表大会党团，并且要求把這個問題轉給党代表大会。再有任何动搖都是絕對不能允許的。

“你可以把我送交你的全部材料保留到全会以后。

你的列宁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列夫·达維多維奇：

福斯特教授今天允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口授一封信，于是他向我口授了下面这封給你的信：

“托洛茨基同志：

“看来，我們一枪未发而仅仅用迂迴动作就攻克了障地。我提議，我們不要停下来，而要繼續进攻，为了这个目的，要提出这样一項決議案——向党代表大会提出加强对外貿易壟断制問題以及如何更好地执行对外貿易壟断制的措施問題。在苏維埃代表大会的党团內宣布这个決議案。我希望你不反对并且不会錯過机会在党团內作一次講話。

尼·列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要求你回一个电话。

娜·康·烏里揚諾娃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这些信件的内容和語气，都不必再加說明了。

关于对外贸易问题，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个新的决定，取消了旧有的决定。列宁信中“一枪未发”而得胜的趣话就是指这个。

还有一个问题：假使在投票赞成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决议案的人们中出现了托洛茨基的名字，而斯大林则同列宁一致主张取消这个决议案，那么，将会写出多少大本、小本的书藉以及小册子来证明托洛茨基的小资产阶级和富农“倾向”呢？

第十七章 国家计划工作

我曾把我们销售的紊乱状况归于国民经济一般的无计划性。在计划工作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作用问题上，政治局曾经有过争论。其中包括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之间的争论。在计划委员会的人员问题上，也有过争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问题给政治局委员的信中写道：

“关于使国家计划委员会具有立法职能这个思想是托洛茨基同志提出来的，大概已经很久了。我当时反对这种思想，因为我认为，这样一来，在我们立法机关系统中将出现很大的不协调现象。但是经过仔细研究，我发现这里实质上有着健全的思想，就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作为领导人、专家、科学技术代表的总和，虽然实质上掌握正确判断事情的大量材料，但它多少是撇在我们的立法机关之外的。……我想，可以而且应该同意托洛茨基的正是这一方面，而不是下述方面：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一职，或者由我们政治领袖中的某个人担任，或者是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担任。”^①

上文在列宁关于对外贸易垄断制问题给我的信中，已经提到过这些分歧了。列宁在那封信里建议推迟那个问题，不太确切地把它说成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行政权问题。我坚持全面加强国家计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中文版第621—622页。——中译者注

划委员会，把各个部的计划工作都隶属在它下面，我并没有建议赋给国家计划委员会行政权，我认为行政权应该仍旧集中在劳动国防委员会手中。但现在这不是根本的问题。无论这封信的性质也好，语气也好，都是多么心平气和，列宁把我们以前存在的分歧只看作一件事物的讨论，他建议政治局按照接近我所维护的观点的方向，来解决那些分歧。在这个问题上，党听到了多少谎话啊！

第十八章 同列宁一起反对斯大林

我不在这里引用列宁在民族问题上反对斯大林的重要信件。这封信已经印入七月二十六日全体会议速记记录，并且还用单页的形式散发过。他们没办法隐藏这封信。但是关于这同一个问题另外还有一些文件，党却完全不知道。阿尔希瓦里亚斯和斯大林学派的历史学家们正用一切办法不让这些文件问世。他们将继续这样干下去。事实上，他们完全可能把这些文件干脆销毁。

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在这里引述列宁关于苏联结构问题的最早的那封信的一些最重要的摘录，以及斯大林的回信。列宁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的信是写给加米涅夫同志的，同时信的副本抄送给了全体政治局委员。下面是信的开端部分：

“你也許已經从斯大林处收到他所领导的委员会拟定的关于接受独立共和国参加苏联的决议草案。

“如果你还没有收到，那么向书记处要，并且请你立刻读它一遍。昨天我和索科里尼可夫谈到这个决议草案，今天又和斯大林谈了，明天我要和穆吉瓦尼（一个格鲁吉亚的共产党人，他被人怀疑是主张“独立”的）见面。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是无比重要的。斯大林有一点急躁。你，还有季诺维也夫，要好好考虑这个问题。（你有一次曾经想要研究这个问题，并且已经多少做了一些。）

“斯大林已经同意做一个让步，在第一条里不写‘参加’俄罗斯

苏維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而写同俄罗斯苏維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在一个欧亚苏維埃共和国联盟中‘正式联合’。我认为这个让步的精神是很明显的。我們承认自己同乌克兰共和国和其他共和国是平等的，而且我們和他們一起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一个新的联盟，一个新的联邦——‘欧亚苏維埃共和国联盟’。”

这后面是列宁以同样精神所作的一系列改正。列宁在信的結尾部分写道：

“斯大林同意推迟到我到达后才把这个決議草案提到政治局。我将在十月二日，星期一到达。我希望同你和李可夫会談两小时——比方說早晨从一点到两点，如果必須在晚上，那么五点到七点，或者六点到八点。

“这是我的初步計劃。我将根据同穆吉瓦尼和其他同志的談話来为这个決議草案而斗争，并且要改变它。我要求你也这样做，候复。

你的 列宁

“附言：此信抄送政治局**全体委員**。”

斯大林在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七日这同一天，把他給列宁的复信分送給政治局委員。下面摘引斯大林复信中重要的两段：

“列宁对第二条的修正，建議在俄罗斯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外再建立一个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我看来，这个修正不應該被采納。莫斯科存在两个中央执行委员会，一个显然像是‘下院’，而另一个像是‘上院’，这只能給我們带来冲突和爭辯。”

接下去是：

“四、关于第四条的問題，在我看来，列宁同志自己有一点‘急躁’，他要求把財政、粮食、劳动和国民經济人民委员会同联邦各人民委员会合并。毫无疑问，这种‘急躁’将为‘鼓吹“独立”的人火上添油’，而有損列宁的民族自由主义。

“五、列宁对第五条的修正，在我看来，是多余的。

約·斯大林”

像其他許多文件一样对党隱瞞起来的这些特別能說明問題的通信，都是早于列宁那封著名的关于民族問題的信的。列宁关于斯大林的草案所說的話都是非常有限制的，語气是緩和的。那时列宁仍然希望不經過大的冲突而糾正這個問題。他溫和地批評斯大林“急躁”。列宁把斯大林指責穆吉瓦尼主張“独立”的話加上引号，显然表明他自己是和这个指責无关的。此外，列宁特別強調，他要在同穆吉瓦尼和其他同志談話的基础上提出他的修正案。

斯大林的回信完全相反，是以粗暴为特点的；第四点的最后一句特別值得注意：

“毫無疑問，这种‘急躁’将为鼓吹‘独立’的人火上添油，而有損列宁的民族自由主义（！）。”

这样一来，列宁就等于被指責犯有民族自由主义的錯誤。

关于民族問題的斗争的进一步发展使列宁看到，他不能用內部方式，或者說用在家庭內部影响斯大林的方法解決問題；必須把問題向代表大会、向党提出。为此，列宁写了几封关于民族問題的信。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格魯吉亚”問題有极大的重要性，这不仅因为他担心錯誤的民族政策在格魯吉亚的后果——这种担心已經完全得到了证实——，并且因为在这个問題上他看出了斯大林在民族問題上（而且不仅在民族問題上）整个路綫的錯誤。列宁关于民族問題的意义重大的信件直到今天还对党隱瞞着。借口列宁当初并不打算把这封信向党宣讀，这是彻头彻尾的謊話。难道列宁当初打算把他在記事本上和他所讀过的书的頁边上所作的札記出版嗎？事实是，凡是直接或間接打击反对派的东西你們都发表，但是你們却把列宁关于民族問題的根本綱領的信隱藏起来。

这里是这封信的两段摘录：

“我想，在这里，斯大林的急躁和在采取行政措施上的任性以及他对臭名昭彰的‘社会沙文主义’的忿恨，起了决定作用。忿恨通常在政治上一般都起最坏的作用。”（引自列宁一九二二年十二

月三十日的信)①

下面的話更加严厉：

“当然，应当使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对这一真正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运动負責任。”（引自列宁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信）②

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觉得自己大概不能出席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时候，他立刻把这封信送给我。下面是列宁在他参与政治生活的最后两天中给我的信：

“絕密。本人亲启。

“尊敬的托洛茨基同志：

“我恳切地要求你把在党的中央委员会上辯护格魯吉亚事件的责任承担起来。这个事件目前正由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負責‘起訴’，我不能信賴他們的公正无私。的确，恰恰相反。假使你担任辯护，我就安心了。如果为了某种原因你不同意，那么把全部文件退还给我。我将认为这是你不同意的表示。

“致以崇高的同志般的敬礼，

列宁

米·伏·记录

一九二三年三月五日”

“給托洛茨基同志：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我在他的信（該信已用电话轉达給你）上附告，加米涅夫同志星期三到格魯吉亚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我問問你是否有什么东西要帶到那里去。

（签字）米·伏罗基契娃

一九二三年三月五日”

① 參看《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中文版第 629—630 頁。——中譯者注

② 參看同上書，第 633 頁。——中譯者注

“給穆吉瓦尼，馬哈拉澤等同志（抄送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同志）：
“尊敬的同志們：

“我正在全心全意地為你們工作。對於奧爾忠尼啟澤的粗暴行為以及斯大林和捷爾任斯基的縱容態度，我極為憤怒。我正為你們草擬信件和講話。

“敬禮

列寧

一九二三年三月六日”

“致加米涅夫同志（抄送托洛茨基同志）：

“列夫·波利索維奇：

“為了補充我們的電話談話，我現在把下面的情況通知給作為政治局代理主席的你：

“我已經通知過你，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口授了一篇關於民族問題的文件。

“這個問題一直使他極為憂慮，他準備在黨的會議上談這個問題。在他上一次發病前不久，他告訴我，他將要發表這篇文件，但是要再過一些時候才發表。以後他就病了，沒有給我最後的指示。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認為這篇文件是有指導意義的，並且非常重要。按照他的指示，曾把這篇文件抄送托洛茨基同志。鑑於他們在這個問題上的一致，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委託托洛茨基在黨的會議上為他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辯護。

“我手中所有的這篇文件的唯一副本，現已按照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指示，收藏在他的秘密檔案里。

“我提請你注意上述事實。

“我無法早一些通知你，因為我今天才剛剛病愈恢復工作。

列寧同志私人秘書 莉·弗齊也娃

一九二三年三月十六日”

在他們圍繞着列寧對我的態度的問題所進行的一切誹謗之

下，我不得不提請大家注意列宁第一封信的結尾——“致以崇高的同志般的敬礼”。凡是知道列宁用字节約和談話方式的人都会看出，列宁在他的信上写这些字并不是偶然的。当斯大林被迫在一九二六年七月全会上宣讀这封信的时候，他把“致以崇高的同志般的敬礼”这些字换成“致以共产主义敬礼”的客套，这也不是偶然的。斯大林在这里又一次表現了他的本色。

第十九章 同列宁一起反对斯大林，李可夫，加里宁和布哈林

列宁的改組工农檢查院的建議受到斯大林集团的极其敌意的对待。我曾在早先給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里用很有节制的話談到这件事。現在我把这一段重抄在下面：

“对列宁改組工农檢查院的計劃，政治局的反应是怎样的呢？布哈林同志^①对于发表列宁的文章躊躇不决，而列宁則坚持立刻发表。娜·康·克魯普斯卡娅^②用電話告訴了我这篇文章，并且要求我設法使它尽快发表。在因我的要求而立即召开的政治局會議上，所有出席的人——斯大林，莫洛托夫，古比雪夫，李可夫，加里宁，布哈林諸同志，不仅反对列宁的計劃，而且反对发表这篇文章。書記处成員更是毫不容情地明白表示反对。由于列宁坚持必須給他看到印出来的文章，古比雪夫同志（不久担任了工农檢查院的首脑）提議，專門印一份載有列宁文章的《真理报》給他自己看，而这篇文章必須对党隱瞞起来。

“我表示，列宁同志所提出的这个根本改組的建議本身是进步的，如果能正确执行的話；但是，即使不是这样，不让党知道列宁同志的建議也是荒謬可笑的。我得到了同样形式主义精神的答复：‘我們是中央委员会。我們將負这个責任。我們將要作出决定。’

① 《真理报》編輯。——英譯者注

② 列宁的妻子。——英譯者注

只有加米涅夫同志支持我，他是在政治局會議舉行了幾乎一個小時以後才到場的。

“在無論如何不应当向黨隱瞞列寧寫的文章這個主要道理之下，他們被說服了，同意發表這篇文章。後來，這篇文章變成了那些當時不願發表它的人們手中的特別武器，企圖用來**反對我**！古比雪夫同志當時是書記處書記之一，被任命為中央監察委員會^①的首腦。一種‘拔掉牙齒’的政策被採取了，用以代替反對列寧計劃的鬥爭。工农檢查院是否這樣就具有了獨立不倚和公正無私的特性，是否抵擋住了各種各樣的濫用行政權力而維護和堅持了黨紀和統一，這個問題是不需要深入研究的，因為答案非常清楚。”^②

斯大林在這個問題上的行為首先向我清楚地表明，列寧的改組中央監察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的建議完全是針對着斯大林的當時已經過度的官僚主義權力，針對着他的不忠順。所以斯大林頑固地反對列寧計劃。

第二十章 我和列寧之間的最後談話

最近我在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談到**我和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之間的最後談話**，這是在他第二次發病以前不久的事。我現在把它引述在下面：

“列寧在克里姆林宮他的房間里召見我，談到官僚主義在我們蘇維埃機關里的驚人發展，同時談到必須尋找一個杠桿來觸動這個問題。他提議設立一個中央委員會的特別委員會，並且邀我積極參加這個工作。我回答他道：‘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按照我的判斷，目前同蘇維埃機關的官僚主義鬥爭中，我們必須不要忘記，無論在外省或者在中央，圍繞着某些黨的領導人和領導集團，——在省里、區里、黨支部里，在中央，這就是說中央委員會——有一批

^① 黨的一個組織，和工农檢查院共用一套人員。——英譯者注

^② 引自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給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的信。

特选的干部和专家，党的，非党的和半党的专家。你要攻击苏維埃的干部，就会碰到党的领导人。专家也是他的随从中的一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能担任这项工作。’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想了一会，然后說道（我在这里几乎逐字逐句引用了他的原話）：‘这就是說，我提議和苏維埃的官僚主义斗争，而你要加上党的組織局^①的官僚主义。’

“我因为这句话的出乎意外而笑起来，我的头脑中还没有这样成熟的观念。

“我回答道：‘我想是这样。’

“然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說道：‘那么，好的，我提議組織一个集团。’

“我說：‘我总是願意和一位好人組織集团的。’

“在我們談話結束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說，他将要提議由中央委员会建立一个和‘一般’官僚主义斗争的委员会，我們可以通过这个委员会触及党的組織局。他答应‘进一步’考虑組織方面的問題。说到这里我們就分手了。以后我有两个星期等着他召見，但是伊里奇的健康状况繼續恶化，不久就臥床了。这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他关于民族問題的信通过他的秘书送交給我。这样，那項工作就再也没有进行。”

从实质上来說，列宁的計劃完全是針對斯大林的。

第二十一章 列宁和斯大林最后决裂

是的，我和列宁之間有过分歧。但是斯大林根据这些东西来歪曲我們关系的一般性质的企图，一碰到我所提到的时期中的一些事实，就化作齏粉；在这个时期中，我已經說过，决定問題不是用不留记录的談話和投票，而是用通信的方式；这也就是列宁第一次和第二次患病之間的时期。其間的事实概括起来如下：

^① 作为总书记的斯大林是这个局的首脑。——英譯者注

(一)在民族問題上，列宁准备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进行一次决定性的攻击。关于这件事，是列宁的秘书以他的名义并在他的指示下告诉我的。她重复得次数最多的一句话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正在准备一枚攻击斯大林的炸弹。”

(二)列宁在論工农检查院的文章里說：

“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会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搞得更坏的机关了，在目前情况下，对这个人民委员会没有什么要求可提。……一个人民委员会，如果工作马马虎虎，得不到任何人信任，并且说话毫无威信，那又何必组织它呢？……”

“我要問一問工农检查院現在的領導人或任何与之有关的人，他能不能真心地告訴我，像工农检查院这样的人民委员会实际上有什么用处呢？”^①

在革命后的最初几年間，斯大林始終是工农检查院的首腦。列宁在这里的打击完全是针对他的。

(三)同一篇文章說：

“(官僚主义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②

这些话本身已经够清楚了，如果把它们同我在上面引述的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之间的最后谈话联系起来，意思就特别尖锐；在那次谈话里，他说到我们组织一个集团来反对作为官僚主义发源地的组织局。括号中的列宁式的朴实语言完全是针对斯大林的。

(四)关于遗嘱不需要多說。其中充满对斯大林，对他的粗暴和不忠順的丧失信任。其中說到斯大林可能濫用权力以及因此引起的党的分裂的危險。从遗嘱的所有性格描述中引出的唯一組織結論是：“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位置調开。”

^① 參看《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中文版第444頁和第445頁。——中譯者注

^② 同上書，第449頁。——中譯者注

(五)最后，列宁在世时所写的——或者不如說所口授的——最后一封信，是給斯大林的断絕和他之間一切同志关系的信。加米涅夫同志在这封信写成的同一天夜里（一九二三年三月五——六日）告訴了我这件事。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加米涅夫同志述說过这封信。瑪·伊·烏里揚諾娃^①的证詞的速記記錄证实了这封信的存在。

季諾維也夫同志在一九二六年七月全会上历数列宁給斯大林的“警告”时說：

“第三个警告是这样的：一九二三年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給斯大林的一封私人信中，断絕了和他之間的一切同志关系。”^②

瑪·烏里揚諾娃试图把事情說成是，列宁在逝世前給斯大林的最后一封信中声明断絕一切同志关系这件事，是由个人的原因而不是政治的原因引起的。^③难道有必要指出，列宁的个人动机永远产生于政治的、革命的、党的原因嗎？“粗暴”和“不忠順”也是个人品质。但是列宁却在这上面警告党，不是为了“个人的”原因，而是为了党的原因。列宁断絕和斯大林間的一切同志关系的信有着完全相同的性质。那封信是在关于民族問題的信以后和在遺囑以后写的。要减低列宁最后这封信的道义分量的图謀，一直在煞費心机地进行着。可是党有权利知道这封信！

这就是事实真相。这就是斯大林怎样地在欺騙党。^④

第二十二章 几点結論

我可以引证許多事实、证辞和引語来駁倒斯大林、雅罗斯拉夫

① “有关这个事件的文件是存在的。”——引自瑪·伊·烏里揚諾娃在联席全会上主席团上的声明。（瑪·伊·烏里揚諾娃是列宁的姐姐。——英譯者注）

② 速記記錄，第一号，第 32 頁。

③ 速記記錄，第四号，第 104 頁。

斯基及其同伙所伪造的近十年的历史，上面所引证的不过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

我必須补充一下，伪造并不限于这十年，而是遍及党过去的全部历史，把它說成是一場布尔什維主义同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斗争。在这个范围内，伪造者感觉特別自由，因为事件都是屬於遙远的过去，并且他們可以任意挑选文献，用片面选择引語的办法伪造列宁思想。但是，我現在不深入談我的前期革命活动（一八九七年到一九一七年），因为这封信是由于你們征詢关于我参加十月革命以及我同列宁之間的会見和关系等情形而引起的。

关于十月革命以前的二十年，我只稍許談几句。

我曾經屬於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少数派”，孟什維主义就是以后从这里发展出来的。我在政治上和組織上始終同少数派联結在一起，直到一九〇四年，大約是所謂《新火星报》的“土地运动”的时候，这时我在資產階級的自由主义和革命前途問題上同孟什維主义的不可調和的冲突明确化了。一九〇四年，这就是說二十三年以前，我在政治上和組織上同孟什維主义断絕了关系。我从来沒有自称或者认为自己是一个孟什維克。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九日在共产国际中央委员会全体會議上，我就“托洛茨基主义”問題发表了下述声明：

“一般說来，我认为查个人历史并不能使我們在原則問題上作决定。我确实在許多問題上犯过錯誤，特別是在我反对布尔什維主义的期間。但是，不能从此得出結論，政治問題不应当按照它的內容，而是按照个人历史加以审查。否則，我們就必須要求公布全体

④ 讀者如果有兴趣追索此后的反斯大林官僚主义陰謀的斗争史，可以在我的小册子《列宁逝世以后》中找到有确实文件证明的这段历史。我的书的最初几章現在是多余的了，因为托洛茨基在这里已經把我只提供了一个准确梗概的那些文件全部披露出来。但是，他也用和我同样的方式解釋这些文件。因此，由于我的书的出发点得到了这样的肯定，所以它的主体部分仍然是很重要的。它是列宁逝世后俄国共产党內最重大事件的現存的唯一历史。——英譯者注

代表的个人历史。……^① 我已經声明过許多次，在我同布尔什維主义有分歧的一系列根本問題上，錯誤在我这方面。为了把我同布尔什維主义之間以前那些分歧的性质和程度用几句话概括一下，我要这么說：

当我站在布尔什維克党外的时期，当我同布尔什維主义之間的分歧达到最高峰的时期，我同列宁观点之間的距离也从来没有像現在斯大林—布哈林的立場同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的基础之間的距离那样大。

党和革命发展中的每一个新阶段，每一本新书，每一种新的流行的学說都引起布哈林那方面的新搖摆和新錯誤。他的全部理論和政治历史是一长串在布尔什維主义的形式上的圈子內所犯的錯誤。自从列宁逝世以后，布哈林的錯誤的程度，特别是它們的政治后果，都远远超过他以前的錯誤。这位訓誥学者挖空了馬克思主义的具体现实內容，把它变成了儿童的概念游戏，变成了仅仅是口头上的詭辯，这样的訓誥学者在党領導从无产阶级的軌道上滑到小资产阶级的軌道上的时期，自然是最合适的“理論家”了。沒有詭辯是不能滑过去的。这就是目前布哈林在“理論”上的作用。

在所有那些(也有限)問題上，凡是斯大林企图持独立立場，或者仅仅企图在沒有列宁及时指导的情况下独自回答重大問題时，

^① “我个人可以提出一个相当偉大的先例。德国有一个叫做弗兰茨·梅林的有教养的人，他是在长期和激烈地反对社会民主党(以前我們都自称社会民主党人)以后，在中年才参加社会民主党的。当梅林最初写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的时候，他是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敌人，作为資本主义的走狗对党怀着知識分子式的反对来执笔的；但是以后，当他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那本名著中重写这个党的时候，却是作为党的真正的朋友来写作了。另一方面，考茨基和伯恩施坦从来没有公开反对过馬克思，并且他們都长期在恩格斯的鞭策之下。不仅如此，而且伯恩施坦因为是恩格斯的遺稿保管人而很出名。但是，弗兰茨·梅林是作为一个馬克思主义者而逝世和下葬的，而另外的两个人考茨基和伯恩施坦呢，却繼續过着改良主义走狗的生活。个人历史当然是个重要因素，但它本身并不能决定什么事情。”

他总是毫无例外地，可以說本能地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場上。

斯大林在流放中对列宁反对孟什維主义、反对前进派和調和主义的斗争加以攻击，說它是侨民的“杯水風浪”。^①

就我所知，除了一篇多少有些正确但充滿学生腔的关于民族問題的文章以外，关于斯大林一九一七年以前的思想情况，再沒有其他政治文献了。

斯大林在二月革命开始时的独立立場(列宁回国以前)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立場。

斯大林在一九二三年德国革命問題上的独立立場整个渗透着袖手旁观和妥协精神。

斯大林在中国革命問題上的独立立場不过是一九〇三到一九〇五年間的馬尔丁諾夫的孟什維主义的廉价翻版。

斯大林在英国工人运动問題上的独立立場是一次中派主义向孟什維主义的投降。

你們在引证的时候可以偷天換日，隱藏你們自己講話的記錄，禁止发表列宁的信件和文章，大量制造不正直地挑选出来的引語。你們可以扣压、隱藏、燒毀历史文件。你們可以把你們的审查制度扩展到記錄革命重大事件的像片和电影方面去。所有这一切都是斯大林正在做的。但是結果并不能符合他的希望。只有像斯大林这样思想狹隘的人才会认为这些可怜的阴謀詭計能使人們忘記現代史的重大事件。

正如我們大家所知道的那樣，一九一八年的时候，在斯大林反对我的运动的最初阶段，他觉得有必要写出下面这些話来：

“起义的全部实际組織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維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可以确定地說，卫戍部队迅速轉到苏維埃方面，軍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的出色执行，党应该把这些功劳主要地和首先归于托洛茨基同志。”

^① 参閱《东方黎明报》，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我對自己的話完全負責，我現在必須說，在中國革命三次最重要的轉折點上，中國無產階級遭到野蠻的屠殺，在一九二六年總罷工以後，英帝國主義的工會代理人的地位得到了加強，以及共產國際和蘇聯地位的一般削弱，黨應該把這些功勞主要地和首先歸于斯大林同志。

列·托洛茨基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



附录一

列宁遗嘱

〔五年以前，列宁病危躺在床上，已经失掉说话的能力，他写了一封信，预言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将发生不可避免的斗争，分析这两个人的性格，并且指出党为了避免分裂而应当采取的行动。列宁这种几乎是神秘的政治上的明智从来没有像在这封被称为他给党的遗嘱的短信里表现得那样显明。这封信被斯大林及其当权的同伙锁在保险柜里，并且宣称并不存在，因为它里面包含着对斯大林本人的尖锐批评，以及把他从党的总书记这一领导地位上调开的忠告。一九二五年，我在我的书《列宁逝世以后》里面，曾经提供了这封信的一些确切摘录，但当时我不得以自己的名义提供。我的摘录受到了全世界共产党官方报纸，其中包括莫斯科政治局的攻击和否认。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八日——这时反对派要求执行列宁关于总书记问题的遗嘱的战斗努力达到了高潮，我利用从深入宣传布尔什维克观点而得到的金钱，在《纽约时报》刊出了下面这个遗嘱全文的译文。这个文本是完全的，准确的，非常可靠的。——麦·伊·〕

“我上面所说的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是指防止分裂的措施，只要能够采取这种措施。因为，一个白卫分子（我想是谢·费·奥尔匈布尔格）在《俄国思想》杂志上说得很对，第一，在他们反对苏俄的阴谋中他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党的分裂上，第二，他又把分裂的希望寄托在党内极严重的意见分歧上。

“我们党依靠的是两个阶级，因此，假如这两个阶级不能一致，

它的不稳定是可能产生的，它的垮台也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下，采取这种或那种措施，或者一般地来議論我們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都是无益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措施都不能防止分裂。但是我希望，現在談起来，这是极遥远的未来的事，这是难以置信的事件。

“我說的稳定性是指保障在最近时期不鬧分裂，我打算在这里分析一下对純粹个人特性的一些看法。

“我想，从这个角度看，稳定性問題的基本因素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員。在我看来，分裂的危險，一大半是由他們之間的关系构成的，而这种分裂是可以避免的。在我看来，可以用把中央委員人数增加到五十人或一百人的办法避免这种分裂。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書記，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够永远十分謹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沒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铁路人民委員部問題上对中央进行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卓越的才能，也許他还是現在中央中最能干的人，但是他过分自負，过分热中于事情的純粹行政方面。

“現時中央两位卓越領袖的这两种品质会无意地造成分裂，如果我們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

“我不打算再評述其他中央委員的个人品质了。我只提醒一下，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事件当然不是偶然的，但是这种事件也可以少归罪于他們个人，正如非布尔什維主义可以少归罪于托洛茨基一样。

“在年輕的中央委員中，我想就布哈林与皮达可夫談几句。在我看来，他們是最卓越的力量(在最年輕的力量中)，對他們应当注意下列情况：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可貴和最大的理論家，他也应当被认为是全党所喜欢的人物，但是要把他的理論观点算作完全馬克思主义的，那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在他那里有一种煩瑣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沒有学过辯证法，并且我想，他从来不完全了解辯证法)。

“其次是皮达可夫——他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卓越才能的人，但是太热中于行政手段和事情的行政方面。在严重的政治問題上是不能信賴他的。

“当然，对两人的評語只是就現時来說的，同时假定这两个卓越的忠誠的工作者不去找机会来充实自己的知識并消除自己的片面性。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附言：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議同志們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調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都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順，更和藹，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这种情况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說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說，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列宁

一九二三年一月四日”^①

附录二

阿道尔夫·越飞遺书

〔阿道尔夫·越飞的自杀事件是布尔什維克政府自列宁逝世以来的人事和政策变化的悲剧象征。越飞是革命时期列宁身边最坚强和最能干的人之一。和拉科夫斯基一样，他曾經学医。他是一个沉着和勇敢的人。他一生献身于共产主义运动，积极参加了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他不仅在監獄服刑，还在西伯利亚做过苦役。

^① 參看《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中文版第616—618頁。——中譯者注

在十月革命和此后战斗的日子里，越飞起过重要作用。他是軍事革命委员会的領袖之一，根据一些記載，这个委员会在实际起义以前已經实现了彼得格勒的政权轉移。列宁挑选他担任最初的和极其重要的两个非布尔什維克莫屬的外交职位——去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代表团团长和駐德国大使。他是出席热那亚会议的代表之一，此后他是駐日公使。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越飞用手枪对准太阳穴打死了自己。在他身边的桌上，他留給托洛茨基一封信，解釋自己的行动。我按照《民族周刊》发表的文本把这封信附录在这里，只作了一些不重要的删节。——英譯者]

“給列夫·托洛茨基。

“亲爱的列夫·达維多維奇：

“我一生都在想，干政治的人应当知道怎样适时地引退，像一个演員退出舞台一样，并且宁可过早走开，不要过迟。

“三十多年以前，我信奉了这样的哲学思想，人的生活只有在为某一件无限的事情服务时才有意义。对我们來說，人道是无限的。此外都是有限的，因此为人道以外的东西的工作是沒有意义的。即使人道也应该有一个超乎它本身以外的目的，但是那个目的的出现将在如此遙远的将来，因此我們可以把人道看作絕对的无限。正是在这上面，并且仅仅在这上面，我經常看到生活的意义。那么現在，回顾一下我的过去（其中有二十七年是在我們党的队伍里度过的），似乎我有权利說，在我自觉生活的**全部**过程里，我始終忠于这个哲学。我一直按照这个生活意义而生活：为了人道而工作和斗争。我认为我有权利說，我的生活沒有一天是沒有意义的。

“但是現在，看来我的生活失掉意义的日子来临了，因此我觉得必須放棄它，結束它。

“几年以来，我們党现在的头头們，按照他們不給反对派共产党人工作的总政策，既沒有給我政治工作，也沒有給我苏維埃工作，这些工作的范围和性质本来可以使我的能力最大限度地發揮

作用。在去年一年里，如你所知，政治局把我作为一个反对派从一切政治工作中砍掉了。

“我的健康状况一直继续恶化。大概在九月二十日，我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中央委员会的医务委员会叫我去受专家检查，他们断然告诉我，我的健康状况比我自己所设想的要坏得多，我一定不要毫无益处地再在莫斯科呆一天，甚至不要再呆一个小时，而得不到治疗；必须立刻到国外去，进一个适当的疗养院。

“对于我的直接问题——‘我有什么希望可以在国外见好？我不能在俄国照顾自己同时不放弃工作吗？’医生们和助手们，中央委员会的应诊医生阿布罗索夫同志，另一个党员医生，克里姆林医院院长，所有的人都简单回答说，俄国的疗养院绝不能对我有帮助，我必须依靠西方的治疗。他们还说，如果我遵照他们的指示，他们毫不怀疑我将能工作很长一个时期。

“尽管那次就诊是中央委员会的医务委员会自己主动安排的，但是大概有两个月，他们无论对我出国的事情或者对我在国内治疗的问题，都没有采取步骤。正相反，克里姆林宫的药房，它过去经常按照处方给我药，现在被禁止这样做了。事实上我被剥夺了免费药物的福利，这是我一直在享受的。我不得不从市内的药房购买必需的药物。看来这情况发生的时间，正是当权集团开始用‘对准肚子打反对派’的政策对待反对派同志的时候。

“只要我稍微健康一些能够工作，我对这一切是不在意的，但是我的健康状况继续坏下去，我的妻子去找中央委员会医务委员会交涉，并且见到了谢马什科博士，这个人为了实行他的公式——‘拯救老近卫军’，常常公开走极端。不管怎样，这件事仍然是无限地拖延下去，我妻子所能得到的不过是一纸医生会议决定的摘要。这个摘要列举了我的各种慢性病，并且说，会议坚持我必须到国外去，进一个‘费利得兰得尔教授所办的那种疗养院’，可能要住一年的时间。

“同时，几天以前由于我的全部慢性病发作起来，并且恶化（这

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常有的情形)，我终于躺倒了，尤其可怕的是我的痼疾多发性神经炎又发作了，使我受到一种极难忍受的疼痛，甚至使我不能下地行走。在这几天里，我没有得到任何治疗，而我出国旅行的问题至今没人提起。没有一个中央委员会的医生来看我。达维金科教授和列文博士被请到我的床边，开了一点普通药，这显然对我没用，他们说，‘没什么办法了’，出国旅行是当务之急。列文博士告诉我妻子，这件事之所以拖延，因为医务委员会显然认为我的妻子要跟我一起去，‘这样一来花钱就太多了’。我妻子回答说，尽管我的状况很可悲，可是她绝不要求由她或由其他任何人陪伴我。于是列文博士向我们保证，在这种情况下，这件事将会很快解决。列文博士今天又向我说，医生已经束手无策，唯一的办法是立刻出国。当天晚上，中央委员会的医生波琼金通知我的妻子，中央委员会医务委员会决定不送我出国，而在国内给我治疗。原因是，专家坚持要有一个长时期的国外治疗，他们觉得短时期是没用的，再就是，中央委员会最大限度只愿给我一千美元医疗费，不能多给。

“不久以前我在国外的時候收到过一封信，保证为我的回忆录给我两万美元的稿费，但是〔考虑到书要受政治局的审查和〕鉴于党和革命的历史在我国是怎样地被伪造，我认为我不能帮助这样的伪造工作。政治局的全部审查制度是，不许真实地评价人物及其行动，不论是这一边的或那一边的，既不许真实地评价真正的革命领袖，也不许真实地评价那些现在有这种荣誉的人。因此我觉得，得不到中央委员会的钱就没有办法治病，尽管我从事了二十七年的革命工作，但中央委员会认为我的生命和健康最多值一千元。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必须结束这种生活的时刻已经到来。我知道，党一般的观点是反对自杀的，但是我相信，没有一个了解我的处境的人会为这件事责备我。如果我是健康的，我会找到体力和精力去斗争，以反对党内目前的情况。但是处在我目前的状态，

我不能忍受党默默地容忍从它的队伍里把你开除这种情况，虽然我绝对相信，一场危机或迟或早必将到来，它将迫使党摒弃那些把它引入这样一种可耻地步的人。在这个意义上，我的死是对那些人的一个抗议，他们把党引入这样一种情况，以致使它对这件丑闻不能有任何反应。

“如果允许我把伟大的东西和渺小的东西并列的话，那么我要说，你的被开除以及季诺维也夫的被开除这个无比重要的历史事件，它不可避免地必将开始一个我们革命中的热月政变时期；加上我在党内负责岗位上作了二十七年革命工作之后，现在被贬低到一无所有，只好用一颗子弹打穿自己的脑袋这个事实——这两件事说明了同一个东西——我们党的现在的制度。也许这两个事件，一件伟大的和一件渺小的合在一起，将要惊醒党，在导向热月政变的路上阻止它。

“亲爱的列夫·达维多维奇，十年来共同的工作，我希望，同时还有私人的友谊把我们结合在一起，这使我在临别的时刻有权利告诉你在我看来是你的弱点的东西。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所指出的道路的正确性，并且你知道，自从‘不断革命论’出现以来，二十多年里，我始终是和你站在一起的。但是我经常觉得，你缺乏列宁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那种不妥协性，那种如果必要的话，他就留在他所指出的道路上独自工作的坚决的态度，确信将来可以取得多数，所有的人都会承认他的道路正确。从一九〇五年开始，你在政治上经常是正确的，我常常告诉你，我亲自听到列宁承认，一九〇五年正确的不是他，而是你。面临死亡的人是不会说谎的，我现在向你重提这一点。

“但是你常常为了同那些你对其价值估计过高的人取得一致、取得妥协而放弃你的正确立场。这是错误的。我再说一遍：你在政治上一直经常是正确的，而与以往相比较，你现在更加是正确的。党总有一天会了解这一点的，而历史将被迫承认它。

“此外，如果现在有些人背弃了你，尤其是如果多数人没有像

我們所希望的那樣快地向你走來，不要氣餒。你是正確的，不過你的真理取勝的保證，恰好在於絕不調和，極端嚴格，拒絕一切妥協，這正是伊里奇經常取勝的秘密所在。

“我常常想告訴你這一點，但是只到了告別的時候我才做到。

“祝你精力和勇氣一如以往表現的那樣，並祝勝利早日到來。擁抱你。再見。

你的 阿·越飛

“再啟：我在十五日 and 十六日之間的夜里寫了這封信，今天——十六日，瑪利·米哈伊洛夫娜到醫務委員會去要求他們送我到國外去，即使只去一兩個月。他們回答她說，按照專家的意見，在國外短時間呆一下是完全沒用的。他們告訴她說，醫務委員會已經決定立刻把我送進克里姆林醫院。雖然所有的醫生一致認為，在俄國治療是沒用的，對我毫無益處，但是他們還是不讓我為了我的健康即使作一次短期旅行。

“再見，親愛的列夫·達維多維奇。堅強起來，你需要那樣，而且要振作起來。對我不要記恨。

阿·”

附 录 三

斯大林—布哈林和中国革命

阿尔伯特·德兰特

〔作为法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員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員會委員，阿尔伯特·德兰特在四年之間曾經是斯大林政权的忠实支持者和助手。但是，由于斯大林和布哈林纵容屠杀中国工人和农民，連德兰特也反叛了。在他給法国党内同事的一封信里，他揭发了这件事的全部历史，当然他現在是在党外了。为了补充本书正文中关

于中国革命的簡短叙述，我从他的信里摘引了下面这些段落。

——英譯者]

斯大林—布哈林集团在中国的机会主义政策和真正列宁主义之間流滿了中国工人的鮮血。中国工人被拋棄在資產階級的鎮壓之下，而全世界的共产党人一声不响，因为他們对实际情况一无所知。对这样的政策絕不能妥协。……

在整整一年的時間里，斯大林—布哈林集团〔不仅欺騙了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及其各国支部，而且欺騙了共产国际主席团的多数〕，不让它們知道蔣介石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发动的第一次政变。那一次的政变使政权轉入反动派手中。民团（即由大地主豢养的雇佣軍队）解除了农民的武装，同时对工人肆虐。……国民党和广州政府在一九二六年七月和八月里，又鎮壓了工人和农民的运动。在广西梧州，共产党人被逮捕和枪杀。……广州政府要求农民协会把它的綱領里所有政治內容都去掉。……蔣介石八月六日命令工人解除武装，并以軍法从事威胁那些武装反抗資本家的雇佣兵的人。……第三軍第二十六团的一支队伍在夜間侵入铁路工厂，向工人开火，并且在死伤的人堆上睡觉。……在 Na Chin Tong^①，軍队向工人示威队伍开火，十人被杀。……在湖南，农民組織被解散，它們的領袖被吊死。……这样的事件在整个国民政府的領域內屢見不鮮。……

“斯大林—布哈林集团对广大的共产党人隱瞞这些事件〔同时繼續实行他們同蔣介石合作的政策〕。……

“一九二七年三月，蔣介石占領上海以后，发表忠于和服从国民党的宣言，为的是掩护他的政变的准备工作。斯大林—布哈林集团把这个宣言解釋为可以同蔣介石繼續合作一个时期的证据。四月五日，中国党的書記签署了一项宣言，宣称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間只在一些細节問題上有不同意見。斯大林—布哈林集团虽

① 地名不詳。——中譯者注

然知道这些細小的不同是关乎枪杀工人和农民的，但他們繼續保持緘默。

“这不过是对广大共产党人隱瞞的事情中的一部分，还不是全部經過。

“斯大林—布哈林集团尽其可能地把全部載有这些事件的文件隱藏起来。这个集团隱藏了季諾維也夫关于中国局势的提綱……这个提綱对整个局势作了正确的估計，并包含有准确的預言。……这个集团对托洛茨基針對斯大林的提綱所作的批評，对托洛茨基关于某些禁止在共产党報紙上发表的来自中国的电訊所作的一些評論保持了緘默，所有这些文件都是上届执委会的官方文件。它們包含着对即将发生的情况的准确預言。斯大林—布哈林集团把这些表明他們对形势的判断完全錯誤的文件隱藏起来。斯大林甚至走得更远，他隱藏自己的講話。斯大林本人在**共产主义科学院**三千个党的干部之前所作的講話，从来沒有发表。它所以从来沒有发表，是因为十天以后蔣介石发动的政变毫不留情地駁斥了斯大林的話。而拉狄克，他在**共产主义科学院**的講話中反对斯大林，并且指出，蔣介石的叛变在那时已經只是几个星期，或者几天的時間問題，因为他的預見是正确的，所以被撤銷了中山大学校长的职务。……

“为了隱瞞这些事实，为了打破那些知道这些事实的人的反抗，为了使人們不相信他們，因此必須在俄国党内和共产国际内部建立一种日益令人不能容忍的組織制度。

“斯大林主义就是这种在俄国党内和共产国际中为了有利于一种机会主义政策而实行官僚主义的扼杀和行政恐怖的制度，党和共产国际如果能确切了解实际情况，那么它們本来会馬上摒棄这种政策的。……

“斯大林—布哈林政策所造成的混乱使法国共产党的領導在蔣介石进入上海的时候，把他作为中国公社的代表而向之致敬。当蔣介石进入上海的时候，他其实是**中国公社的加里腓**^①，正在准

备血腥地镇压中国公社。斯大林—布哈林集团的政策引导法国共产党的领袖们走入歧途，竟然到了分不清加里腓和公社，刽子手和牺牲者的地步。产生这样一些结果的那种政策，本身就孕育着自己的灭亡。……

“斯大林—布哈林集团在七月政变以后的政策是退出政府，但是仍留在国民党内，不管有清党运动而留在那里；再就是在七月二十五日宣布苏维埃主张，而这种主张在二十四日晚上还似乎显得过早似的。所有这一切不仅证明是严重官僚主义的短视，而且差不多是彻头彻尾的愚蠢。

“要留在国民党内，就必须不仅抵抗国民党执行委员会所发动的清党运动，而且要抵抗国民党将军们所指挥的军事运动，它的目的是要消灭工会，农民协会，共产党人集团，以及反对执行委员会和将军们的国民党基层组织。这实际上是一个武力摧毁的问题。

“为了处于能够对这种情势进行有效抵抗的状态，就必须不再听从斯大林—布哈林集团的意见——这就是做资产阶级的尾巴，而必须确实地听从列宁的忠告——这就是，鲜明地站在工农群众运动的前面，在适当的时候建立苏维埃，它首先将作为工农民主专政机关而开始工作，它将武装群众，指导战斗，并从而将把踌躇的小资产阶级拉进革命队伍里来。

“人们对斯大林—布哈林集团的这种最新发明怎么说呢？当群众革命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当工会本身直接来阻止革命敌人的时候，当千百万农民开始没收大地主庄园的时候，斯大林—布哈林集团却拒绝发布建立苏维埃的命令。因为服从斯大林—布哈林的政策，这个群众运动遭到了压制。它当时遭到资产阶级的镇压，但斯大林—布哈林集团保持了同谋者的缄默。而现在，这一切已经

① 加里腓(一八三〇——一九〇九)，法国将军，一八九九年任国防部长。是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中译者注

导致一个可耻的失败，现在工人的勇气受到了挫伤，听任自己被人解除武装，现在将军们正在夺取工会的房屋，现在农民起义在许多地方暂时被打垮了；现在，斯大林—布哈林集团却在这个不适当的时候毫不迟疑地发布了建立苏维埃的命令，并且要一个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以前在群众中永远不会有丝毫威信的党宣传这个主张，尽管群众运动完全低落。要使苏维埃在中国群众的眼里丧失威信，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

“必须让共产国际和它的各国党得到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直接、准确和完全的情报；因此必须在包括俄国党在内的所有的党进行一系列认真的和充分自由的讨论之后，召开国际特别代表大会。这是定出一项正确政策的唯一道路。……”

“目前的危险是斯大林主义，这就是存在于俄国党内和共产国际里的官僚主义的扼杀和行政恐怖的制度，其目的是机械地防止和打击对现行机会主义政策的任何反对，并且延缓这个政策的破产，但是这个政策的破产却越来越彻底和无法挽救。

“我们必须立刻对这个危险无情地宣战。”

附录四

法国共产党人对俄国 局势的评论

〔美国离俄国很远——离革命也很远——，并且一般说来，美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的思想方法方面很少锻炼。因此，关于俄国共产党内的政治斗争在经济上的真正意义，在美国除了外文报纸，比如《纽约人民报》^①以外，很少发表什么东西。在法

① 在纽约出版的一种德文报纸。——中译者注

国已有四种由被开除的共产党员出版的革命报纸，可以在这些报上看到斗争事实的公正报道，以及努力了解其阶级原因的科学探索。《共产主义公报》是由保里斯·苏瓦林出版的，他是在大战时为法国共产党奠定基础的第三国际委员会这个机构的书记和组织者，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思想上和道义上一样有勇气。《无产阶级革命》是由彼埃尔·莫那特主编的，他是工团主义者的领袖和导师，他称自己的集团为工团主义—共产主义集团。《反潮流》是由包括老革命家劳里奥特和馬德兰·馬尔克斯在内的最近被开除出党的一个集团出版的。里昂的一个共产党人集团最近宣布了另一个刊物的出版，并且我了解到，阿尔伯特·德兰特也创办了他自己的报纸。为了鼓励那些在正直思考的努力中感到孤独并对俄国事件具有一点科学理解的美国共产党人和“激进分子”，我从刊载在《反潮流》第一期上的劳里奥特集团的一个宣言里摘引了如下的段落。——英译者注]

“自从列宁逝世以后，俄国党从危机走向危机，终于达到了分裂。这就是事情的目前状态，我们不能欺骗自己。我们面临的，既不是对这一个或那一个违犯纪律的同志所采取的措施，也不是私人之间的争吵，而是从党内割除它的全部左翼的决定。现在俄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斯大林派带有伪装的修正主义同反对派所维护的共产主义之间一场无法调和的斗争。这个斗争的争论之点是十月革命的整个前途。

“目前时刻，当权派在反对它的敌对者的斗争中，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他们在党内采用了大棒制度，秘密外交制度，恐怖制度。把中央正在发生的真实情况对党隐瞒起来。提供给党的唯一材料是‘官方’文献，‘官方’提纲，‘官方’观点。凡是接受它的就是‘布尔什维克’，凡是讨论它的就是孟什维克，反革命分子，白卫分子。他们非常清楚，如果党员能够发言，反对派会有怎样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因此他们在党内实行恐怖。属于反对派的工人被解雇，被投入饥饿状态，被交付国家政治保卫局。他们被追捕和投入监狱。最

优秀的布尔什维克被成百成百地开除出党。忠于党的干部被加以侮辱后流放。反对派的领袖们被撤掉政府的职务和驱逐出党。他们的生命已经处在危险之中。……

“在一个像苏联这样的农业国里，在新经济政策之下，富农不可避免地要对国家政权和作为政权工具的共产党这个唯一合法的党施加压力。这种压力是可以减弱的，只要在农村实行一项正确的政策——这就是说，只要国家在反对富农的斗争中牢牢地依靠贫农，成功地团结中农。如果在国家这方面是像苏联那样，掩饰新经济政策下加速发展的阶级分化，那么，当它掩饰阶级分化，寻求同一般‘农民’联盟的时候，它同贫农的紧密联盟就松弛了——因为只有反对富农的斗争里这种联盟才能加强；它同中农的联盟也受到了影响——因为富农正在把中农拖在自己后面。

“因此，富农和富裕中农对国家政权日益增多地施加压力；他们用尽全力影响党；他们设法在党内取得地位，这种地位再加上他们的‘影响力’，就使他们在新经济政策下所能得到的利益有了保证。对于这些类别的农民来说，保证的首要条件自然是从党内割除左派分子，这就是那些反对滑向富农的人，那些维护无产阶级政策的人。在这方面，富农和富裕中农得到了庞大的苏维埃官僚队伍的帮助，后者也有它的既得利益要维护。

“农民中的富农和富裕中农阶层，小资产阶级，官僚，这些就是通过党的官僚机构进行活动，对反对派展开无情斗争的社会力量。

“因此对我们来说，对每一个想要明了这个冲突的根本因素的工人来说，问题不在于判定俄国反对派是否‘百分之百的正确’。问题在于懂得，目前反对派是代表着共产党人在自己党内发表意见的权利，代表着工人阶级在本阶级的党内决定其政治路线的权利。问题在于看到，十月革命的胜利果实受到了威胁，如果反对派被击败，那是因为他们保卫这些胜利果实，是因为他们反对政治轴心的转移，它现在不是以无产阶级和贫农，而是以小资产阶级，专家，官

僚，富农为基础。

“我們毫无保留地一致支持俄国反对派的斗争。……只有一件事可以使通过正常途径对苏联非无产阶级成分的压力加以胜利的反击成为可能，这就是阶级力量在党内的自由发挥。……

“在一个共产党里面，有一个权力无限的官僚机构把它的独裁制度强加于党，这就是在那个共产党里面，无产阶级已经遭到严重的失败，这个失败准备和预示着其他的失败。……党内的官僚主义制度只是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的序幕，不管那些擅自取代工人阶级党员地位的人有多大价值，事情仍然如此。这些人的政策可能在一定的时期内符合无产阶级利益，但是必不可免地很快就不再是工人阶级的政策了，它将在不同的社会力量的压力下沿着一条摇摆的路线，向机会主义移动。……

“把这情况概括起来就是：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当权派正在执行一项向右滑动的政策，无论在行动上或者在理论上。而且，为了掩盖这项政策，它打击左派，用尽一个主权国家所具备的一切手段——报刊，警察，恐怖。

“面对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在这个急迫的危险之前该怎样有效地行动呢？

“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使无产阶级掌握事实，使它反击这种包含着共产主义运动垮台危险的严重右倾（这种右倾是把自己隐藏在列宁主义的标签下面的，所以它就更加危险）。……因此我们建议，在这个机关报上，发表被党官僚对工人阶级隐瞒起来的文件，研究无产阶级斗争的重大问题，揭发事实，以共产主义的观点反对官方机关报所表现的机会主义或煽动主义观点；总之，要造成一个无产阶级纠正错误的中心。对党和共产国际来说，这是唯一的斗争方法。

“我们不向自己隐瞒我们在自己的道路上将要遇到的一切障碍。我们早已知道那些将要针对我们而来的一切攻击。它们将以指责我们是宗派主义而开始。这种指责在那些善于思考的工人的

眼里有什么价值呢？他們将会明白，只有党的领导人才是宗派主义者，他們为了自己派别的利益壟断党的报刊；他們嘲弄党，欺騙党，使党混乱，他們窒息来自下面的每一个声音，他們用他們个人的政策代替工人階級政治組織的政策。……

“他們还会指責我們‘干着有利于資產階級的勾当’。为什么？因為我們揭发出党内冲突的真实性质嗎？但是究竟是誰故意把党内冲突公开化的呢？难道《真理报》不是几乎四年来每天不停地宣称，党内有孟什維克，有資產階級的盟友，有張伯倫的同謀，有廢物，有叛徒嗎？

“此外，对机会主义政策加以攻击是永远不会有利于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暂时会很高兴，正如它对我們队伍中分歧的每一个表現都很高兴，但是党从目的在于糾正其階級路綫的行动中所得到的利益，比起因暴露党的錯誤而引起的不利来，要大到无数倍。

“斗争的困难，事件的悲剧性，使人想起工人階級历史上的一个同样黑暗、同样危险的轉折点：战争。这是个很奇特的类似。今天，像十三年以前一样，領袖們不配担任委托給他們的任務，群众受了欺騙，被弄得莫名其妙；今天和那时一样，到处是混乱，謊言，狂热。但是今天也有少数人，在同各种誹謗和各种攻击进行搏斗，坚定不移地面对危险。

“反对当前的潮流！像布尔什維克在一九一四年那样！反对当前的潮流！用和一九一四年时同样的力量！正如齐美瓦尔德分子被人罵作‘Boche’^①，他們会罵我們是‘反革命分子’。……有什么关系呢？我們將等待那个时刻，那时，群众一定会清醒过来。”

① 法語，意思是大兵，丘八。是世界大战时法国人用来罵德国人的話，意为“德国鬼子”、“德寇”。——中譯者注

附录五

托洛茨基的放逐

〔下述放逐托洛茨基和反对派其他领袖的报道是采自一封俄国共产党人所写的私人信。我已用法国反对派报刊上的材料对证和校正过。托洛茨基把自己锁在他所居住的姆拉洛夫公寓的一个房间里，一个名叫阿伯拉姆·别林基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特务打破了房门，带着兵士来把他抓走。付给被流放者的三十卢布的津贴只够付房租。例如，斯米尔加发现，在他的目的地，所有的住处都被流放的耐普曼和罪犯占了，费了很大劲才找到一间租费二十五卢布的房子。赤裸裸的事实是，十月革命的真正领袖现在在流放中依靠他们朋友的私人捐款活着。——英译者〕

“反对派的领袖是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行政命令之下被流放的，和沙皇时代一模一样，一纸命令限二十四小时内准备好。第一批被送走的是三十人，其中包括拉科夫斯基，列宁去世前一直是乌克兰政府和乌克兰政治局的首脑；卡尔·拉狄克，共产国际的组织者之一，从一九〇二年起就是列宁党的党员，列宁去世前一直是党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伊·恩·斯米尔诺夫，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的首脑和西伯利亚苏维埃政府的组织者，被人称作‘西伯利亚的列宁’；弗·恩·斯米尔诺夫，十月革命时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委员；萨普朗诺夫，莫斯科十月革命的组织者之一；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一九〇三年的党员，乌拉尔十月革命的组织者，列宁领导下的党的书记；谢烈布利雅柯夫，一九二〇年时列宁领导下的党的书记；斯米尔加，芬兰十月革命的领袖和组织者，列宁去世前一直是俄国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索斯诺斯基，一九〇三年的党员，《真理报》的创办人之一，列宁去世前一直是《真理报》的主要特约撰稿人；拉法伊尔，列宁领导下乌克兰共产党的书记，以及其他一些同样出名的人。

“流放地和过去沙皇制度下是同样的。每一个人都是由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务押送到流放地。每个人都是单独押送，每月給三十卢布(十五美元)的津貼。不給他們工作。

“最初企图在流放方法上有所区别。有人提議，流放比較著名的领导人只由中央委员会下命令，流放其他的人由国家政治保卫局办理。当拉狄克帶着一些同志到中央委员会对这种区别提出抗議，要求所有的人应以同样方式流放的时候，中央委员会的書記用这样的話把他打发走了：‘你們到中央委员会来胡鬧什么？如果你們要求平等的話，那么你們可以都經国家政治保卫局之手送去。’

“最后一个被流放的是托洛茨基。他离开的情况如下：他們命令他准备好在一月十六日去維也尔尼，在土尔克斯坦，靠近中国边境。莫斯科工人知道他要离开，就开始訂去彼罗沃的車票。彼罗沃在城郊，托洛茨基預定从那里出发。在火車开往彼罗沃的时刻，莫斯科車站上挤滿了工人。

“聚集在彼罗沃車站的工人有一万人。当国家政治保卫局发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們撤回了命令，把托洛茨基出发的日期推迟到十八日。聚集的工人不相信托洛茨基不在車上，他們在路軌上站了四个小时，不让火車开行。当他們最后被說服，确信托洛茨基那天不走的时候，他們涌向托洛茨基的房子，要看看发生了什么事。这时国家政治保卫局在托洛茨基的房子周圍設下了埋伏，逮捕了四十七个人。

“第二天，一月十七日，規定动身日期的前一天，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务来到托洛茨基的住处，拿着立刻出发的命令。托洛茨基拒絕走，他說，給他規定的日期是十八日，因此他还没有准备好，他还没有收拾他的书，等等。

“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务們威胁用强力把他帶走，但是他坚持不动。他們拿起他的外衣，开始强迫他穿上。他的妻子试图和某人通話，他們粗暴地把她从電話机那里拖开。托洛茨基的儿子企图保护他父亲，和一个特务拳斗起来，后来被打倒了。

“最后他們全体动手把托洛茨基拖出他的住处，放在一辆汽車上，高速开向离莫斯科四十里的法烏斯托沃車站。

“他被放在列車上的一个隔間里，有兵士看守着。他在路上病了。在薩馬拉，他的病情严重，他們把他从列車上帶下来，找来几个医生。这是我們知道的全部情况。这是真实的經過情形。

“被监禁在莫斯科的反对派同志們的处境是可怕的。妇女同刑事罪犯和妓女同住一个牢房，男人同投机犯和盜窃犯同住。他們不准接見任何人。他們的伙食很坏，并且不准从外面送东西进来。有人或許会直接牺牲于这种监禁制度，这不是不可能的。

“由于政府更深地陷入反对派預先警告过的經濟困难，他們力图把这些困难归咎于反对派。照这种样子，他們誣构一場以死刑結束的起訴还会很久嗎？”

附录六

俄国反对派給共产国际的呼吁书

“我們——本呼吁书的签名者，由于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的決議而被从苏联共产党的队伍中开除，决定向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呼吁，并对这个決議提出抗議。但是現在，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命令之下，我們这些布尔什維克党的老干部正在被流放到苏联的遙远地区去，而沒有人向我們宣布任何罪状，这样做的唯一目的是为了打断我們同莫斯科和其他工人階級中心、同第六次代表大会之間的联系。因此，我們认为有必要在我們被迫动身去苏联遙远地区的前夜，向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提出这项申訴，并且請求他們把它轉发給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这次以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行政命令放逐党的老干部，不过是目前震动苏联共产党的整个一連串事件中的一个新环节。这些事件在若干年时期內将有巨大的历史意义。目前的分歧在国际革命运动的历史上是重

要无比的。这是保持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所取得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从各方面看来，俄国共产党内的斗争是在背着共产国际，不让它参加，甚至不让它得知的情况下进行的。反对派的以我们时代根本问题为内容的最重要文件，共产国际是不知道的。在每一个重大事件上，各国共产党总是被置于既成事实之前。他们在已经作好的决议上签字。我们认为，这样一种情况是产生于俄国共产党内和共产国际内的根本错误的制度。在提交给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一项由斯米尔加，穆拉洛夫，拉科夫斯基和拉狄克诸同志签名的声明里，我们表示，服从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并且愿意停止派别活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被开除了，而且正在被流放，因为我们不放弃自己的意见。我们已经声明过，我们现在重申，我们不能放弃我们在政纲和提纲里阐述过的自己的意见，因为事件的整个过程正在证明它们的正确性。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应当在列宁时代那样准备：出版一切有关目前争论问题的最重要文件；制止对那些仅仅因为行使党员权利而有罪的共产党人所进行的迫害；在代表大会前的讨论中，把苏联共产党内状况和党所执行的政治路线问题全面提出来。

“有争论的问题是不能用加强警察恐怖来解决的。恐怖如果以正确的政治路线为基础和用以促使反革命集团的瓦解，是能够起巨大的、肯定的作用的。我们作为布尔什维克是充分理解革命恐怖的作用的。过去我们对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曾经实行过革命恐怖；将来对于无产阶级的敌人，我们一刻也不会想到要放弃革命恐怖。但是，我们记得很清楚，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那些政党所实行的恐怖是毫无威力的。归根结蒂，问题决定于政治路线的正确性。放逐我们这些十月革命的战士和列宁的战友，这件事明显地证明了，国内正在发生倒退的阶级运动，和因此而引起的政治上倾向机会主义的明显证据。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坚定地相信，苏维埃政权仍旧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仍然有可能通过决定性地改变政治路线的办法，通过改正已经造成的

錯誤的辦法，而且不需要一次新的革命騷動，從而整頓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制度。這種可能性可以變成現實性，如果共產國際堅決干預俄國共產黨的話。我們向所有的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呼喚，迫切要求他們在黨的群眾真正參加之下，按這些問題的目前狀態來判斷這些問題。列寧遺囑從來沒有像此刻這樣更加顯示它的預言性。沒有人知道歷史事件的过程需要多少時間來改正已經造成的錯誤。我們正在為了一次毫無意義的流放而受到暴力對待，拋棄我們在黨內和蘇維埃裏面的職務。但是在這樣做時，我們一分鐘也不懷疑，我們每一個人將在將來不僅是對黨有用的，而且在即將到來的偉大鬥爭中，將要重新在黨的队伍中占居他的地位。

“我們向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提出恢復我們黨籍的問題。

簽名者 托洛茨基，拉科夫斯基，拉狄克，斯米爾加，伊·尼·斯米爾諾夫，瓦連廷諾夫，謝烈布利雅柯夫，普列奧布拉任斯基，馬利奧達，埃爾金，瓦加尼揚，伊慎科，聶文松，及其他一些老布爾什維克。”